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2

1 9 7 5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经济危机问题 ·

资产阶级经济学还会有“青春”吗？

——评所谓“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

..... 辛 初 (1)

变化中的经济学：经济学在恢复青春

..... [美]卡尔·M·马登 (5)

一个特大工业部门出了问题

——冲击着整个美国经济

.....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编辑部 (11)

会出现另一次大萧条吗？……[美]保罗·A·塞缪尔森 (17)

走向世界大混乱：我们面临世界性的经济

大萧条和战争吗？……[英]沃尔特·拉克尔 (21)

不要忘记谁是大萧条的最大受害者

..... [美]沃尔特·F·蒙代尔 (33)

老调新弹危机歌

——一首美国歌曲“兄弟，你有一毛钱吗？”……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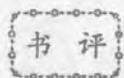
· 关于战争问题 ·

燕子低飞要下雨…… 柏 露 (48)

核战争成为“可以设想”的了

..... [美]迈克尔·T·克拉雷 (50)

- 如果战云在欧洲上空浮动的话……〔日〕小山内宏 (57)
- 苏修掀起军国主义教育的狂热(三则)…… (70)
- 奇袭珍珠港……〔法〕雷蒙·卡歇尔 (80)
- 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英〕B·H·里迭尔·哈尔特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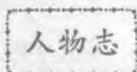


警惕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

——评《回忆与思考》……叶伯乐 (104)

· 中 东 问 题 ·

- 有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回顾和“总结”…… (111)
-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前前后后……〔美〕威廉·E·格里菲思 (113)
-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军事教益
……〔美〕劳伦斯·惠顿 米切尔·约翰逊 (125)
- 以色列有一支核威慑力量吗?……〔英〕《外事报道》 (136)
- 辩证发展的普遍规律……〔苏〕Φ·B·康斯坦丁诺夫等 (140)
- 实地考察“北方领土”问题……〔日〕井上清 (146)
- 苏联哲学汉学动态…… (160)



凯恩斯…… (42)

编 后 …… (164)

资产阶级经济学还会有“青春”吗？

——评所谓“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

辛 韧

正当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爆发新的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所谓经济学家，叫卡尔·M·马登的，抛出了一篇《变化中的经济学：经济学在恢复青春》的文章，想给破产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给腐朽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再来一次修修补补。这篇文章颠来倒去，东拉西扯，集中到一点，就是鼓吹要“为资本主义重下定义”。作者的定义是，当代的资本主义已成为“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

何谓“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作者说，过去的资本主义，人们的印象总是把它看成是实现价值、追求利润的东西，现在可不同了，由于科学的发展，生产的增长，出现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情况。这种情况“不出一百年”就会为“一场人满为患的大灾难创造好条件”。正是由于这种灾难，促使“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资本主义性质”。作者生怕人们不信，他紧接着举出了一系列例子：如什么为了减少噪音、减少对城市的污染，资产阶级政府阻止了超音速运输机的生产；为了“保护环境”，现在资本家决定厂址再不能象过去那样随心所欲，而是必须填写“环境影响”的陈述书，必须作出“工艺估价”，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和社会的制约，

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作者说，现在的资本主义已变成“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所谓“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能够替资产阶级经济学“恢复青春”吗？殷鉴未远：本世纪初，就有过一些马登的先驱们“重新”替垂死的资本主义下过定义，定名为“谋求福利”的资本主义。这帮子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样样都好，只是分配有点不公平，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分配适当加以调节，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吃人主义，而成了福利主义了。这样不但资产阶级经济学能够“恢复青春”，而且资本主义制度也可以“万古长存”了。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奇谈怪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福利就是劳动人民的苦难，绝无普遍福利可言。恩格斯说得好：在阶级社会里，“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谋求福利”的资本主义破产以后，在本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又乞灵于给资本主义重下定义，他们说，正是由于“缺乏一个适当的名词，使得美国在争取人心的世界斗争中陷入困难的境地”。他们幻想创造一个好听的名词，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于是，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刊登广告，广泛征求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定义，终于“征”出了一个“人民资本主义”的新名词，并发表了一篇所谓《资本家宣言》，说什么“人民资本主义”是“同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东西，是最近三十年来形成的一种完全新型的资本主义”。各种为垄断资本主义唱赞歌的辩护士们纷纷麇集在“人民资本主义”的破旗下大肆鼓噪：资本主义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吃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已变成“人民自己的”了，社会主义革命已完全“没有必要了”，资本主义可以“长存”了。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谋求福利”的资本主义也好，

“人民资本主义”也好，都不能阻止历史潮流奔腾向前，而且早已被汹涌的历史潮流席卷以去了。今天又冒出一个所谓“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不过是沉渣泛起而已！

科学的发展，能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吗？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应该是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了罢？如果按马登的论调，那就应该是最最人道主义的了。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别了，司徒雷登》）事实就是如此。在今天的美国，哪里有什么“人道主义”，有的只是“狗道主义”、“猫道主义”：一边是叭儿狗穿大衣坐飞机，一边是贫民窟里的儿童啼饥号寒。据报道，美国贫民中现在捞吃狗食、猫粮的，所在都有。旧中国有一句形容入不敷出、处境维艰的话，叫做“寅吃卯粮”。今天在美国，广大劳动人民不但经常“寅吃卯粮”，而且已经发展到“人吃猫粮”了。

要说今天的某些资产阶级政府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环境的保护等订出了一些措施和限制，这也决不是搞什么“人道主义”，而仍然是搞资本主义，丝毫没有离开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这个目的。有些资产阶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这些措施，首先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斗争的结果，其次是环境污染之类，也会危害到资产阶级本身。再说，如果听任严重污染发展下去，把劳动力消灭了，又有谁来为资本家做工？这岂不是使剥削没有对象了吗？所以，不论哪个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这个措施，还是那个措施，充其量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对个别资本家采取的一些约束。这种情况，早已有之。十九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订立的工厂法，就曾对资本家使用童工等问题作过某些规定，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资本论》）。但这并不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子女讲慈悲、

发善心，而是资产阶级为了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他们榨取所采取的计策。

要说到给资本主义下定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作了科学的概括。资本主义“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论》）。当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又进一步指出它是垄断的、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是最确切的定义。不管资产阶级辩护士给资本主义这个骷髅上涂上什么油彩，“谋求福利”的资本主义也好，“人民资本主义”也好，“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也好，资本主义连同它的经济学已经日暮途穷，再也不可能有什么“青春”了。

无独有偶。美国出现了一个“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在苏联则出现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不过，美国资产阶级的学者总算还有那么一点求实精神，尽管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倒也并不全部遮掩资本主义的尾巴。苏修就很不老实，明明是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却偏要装作正人君子。一个是“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一个是“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两个名称，还不知究竟谁抄了谁的，反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本性是遮不住的，剥开画皮，冲去油彩，原来都是侵略、剥削成性的帝国主义。

列宁指出：“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这一类的脓疮。到头来，只能为资本主义制度殉葬。

变化中的经济学：经济学在恢复青春

〔美〕卡尔·M·马登^①

本文涉及思想领域里的革命和科学革命，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革命过程之中的。由于科学革命正在对经济学产生影响，可以认为“经济学在恢复青春”，因为科学革命似乎能广泛地把各种有关我们生活环境的观点注入经济学。

首先可以考虑一下科学革命的一些主要方面及其影响。按照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的说法，二十世纪十大科学成就是：(1)关于生命起源的化学的知识；(2)宇宙演化——从中子到人及其他；(3)相对论——狭义的和广义的；(4)微粒子科学——亚原子世界；(5)自动化和计算机(控制论)；(6)空间探索；(7)银河，类星体，宇宙膨胀；(8)医学成就——战胜了主要疾病；(9)分子生物学——病毒和DNA(去氧核糖核酸)；(10)对思维的探索。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方面也可以排出一张单子，列举类似的成就。这张单子上当然会包括国民收入分析，概率论和抽样，总体系分析，社会结构分析和其他成就。谁如果说社会科学没有作出任何重要的贡献，或者说社会科学没有对决策作出任何贡献，那只能说明他对社会科学的无知。

所以要列举这些成就，是要提醒人们，这些成就改变了宇

^① 作者是美国商会首席经济顾问、前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经济学家。

宙、地球、人类及其创造性作用在人们头脑中所构成的图景和映象，这一图景已同以前在哥白尼和牛顿时代所看到的图景大不相同了。图景这个词是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都是根据现实在我们自己头脑里的映象（即认为事物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出反应来进行活动的。二十世纪的科学革命改变了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改变了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映象，其深刻程度有如文艺复兴。

为资本主义重下定义

科学革命正在为资本主义重下定义。这个过程早在进行之中，并且还远远没有结束。跟上这种事态发展的经济理论家还不多，因为这涉及其他课题对经济学的“入侵”。经济学家们大都倾向于无视那些同他们的理论模式格格不入的社会和经济现实。

然而必须承认，例如按照自由市场的经典概念所描绘的经济学说就根本没有考虑到演化的观点。现代科学方面的革命最有力地说明：演化是普遍存在的，从中子一直到宇宙本身都是如此。经济理论却对整个这件事默不作声，毫无反应。这就是说，经济学并没有充分重视经济过程和经济阶段的演化，它甚至也不去展望经济发展未来的一些阶段。

不仅如此，在对付资源枯竭和公害问题上，经济理论尤其缺乏办法。公害，用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八九〇年所提出的及其在剑桥大学的同时代人物 A·C·皮古所进一步阐述的“外部因素”概念还可以得到解释。但是这种外部因素概念，即认为公害造成的社会成本并不是企业的成本，因而是“外部的”这种看法，直到一九五〇年 K·威廉·卡普的《私人企业的社会成

本》一书证实了工业界造成的一系列重要社会成本之前，一直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上。

至于资源枯竭，经济学家连想要谈谈这个问题都还无从着手。人们如果查一下截止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大学低年级教科书，可以发现对这个问题至多是略为一提而已。

与经济学家不同，我们许多最有学问的观察者的根本论点是，在新的知识的推动下，思想界的一场剧烈的革命正在进行之中。在这场革命中，公众正在修改老的价值观念，而单靠传统的经济学已不再能为合理的资源管理作出很好的指导了。正是由于公众对这个有争论的问题作出了反应，人们已在为资本主义重下定义。

总之，人们正在为资本主义重下定义，而主要却不是经济学家们在做这件事。对新的关于生活质量的关心产生于科学知识本身的广泛传播。是这种知识导致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现实的印象和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的看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公司有权管理经济资源的政治和社会合法地位，是由于假定它们能合理地分配资源，因此在合理性问题本身有争议时，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公司对策略、经营管理、市场和产品方面的决定。现在我们发现，工业废物和污染必然会跟随产品的生产而来，而没有废物和污染也就不可能有产品。事实是，废物和污染比产量增加得还要快。

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人们要求有一种新的社会契约。而这个契约的条款是会影响我们社会的一切主要制度的。由于工商界和公司社会上起着极大的作用，要求改善生活质量的呼声对工商界特别有影响。

(1) 环境和增长 担心环境污染已导致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价值抱有怀疑。许多学者认为,就目前的人口增长、资源消耗、环境恶化和工业发展的速度而言,不出一百年,要使世界上愈来愈多的人口能过象我们的工业社会那样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资将变得愈来愈少,从而为一场人满为患的大灾难创造好条件。这种担心已经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它扼杀了超音速运输机的生产,导致了要填写“环境影响”的陈述书,要作出“工艺估价”,改变了公用事业的组织结构,促使汽车工业成为一个严密管制下的工业,也迫使象钢铁业那样重要的行业要在它们的资本支出帐上划出百分之十五的费用为减少污染作出无报酬的投资。

所有这些措施都违反了严格的利润计算。超音速运输机之所以被扼杀,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对它的环境影响所作出的估计。政府工程项目,并无疑即将包括工业界私人企业,必须填写“环境影响”陈述书,就是为了迫使有关机构对这个问题作出客观的看法。现在已有法律规定要作出“工艺估价”,即要求对工艺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影响事先就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公司在引进新工艺时采取放任主义态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对这种种要求早已熟悉的公用事业现在专门由环境问题工作人员来作出关于厂址的决定,而不是象以往那样根据工程经济学来决定厂址。还有谁怀疑今天汽车工业不是在管制之下的呢?

(2) 公司的社会责任 的确,公司将成为既是社会的又是经济的组织。要求有一种“社会检查”的主张就是明证。万全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唐纳德·A·麦克诺顿已把关键的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指出:“不是上帝而是人民批准我们〔公司〕去履行职责的。”十九世纪时,人民要商品。公司生产这些商品,并发明了一套办法来衡量生产率。现在人民既要商品和劳务,也

要生活质量。这就要求公司变成社会组织。麦克诺顿说，发明新的衡量社会成果的方式完全是公司应尽之责。通过搞出衡量社会成果的指标、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等等，这件事正在进行着。

走向一种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

科学革命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种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的经济和社会学说。这种经济学说将不是面向消费的，而是面向资源的、面向环境的。而且，当前的能源危机也在把这样的一种经济理论强加给我们。突然，我们发现大公司劝我们以步代车、减低车速、保存燃料。人们也许会随便问起，如果这些建议是如此合理，为什么直到最近才听到这些说法呢？也就是说，今天“合理地分配资源”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是为了消费，还是为了保存资源呢？

人们可以想到，在这样一种旨在维持下去的社会中，公司将献身于那种可称之为“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们将致力于有限的而却是明确的社会和经济目标，搞出一些衡量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成本和利益的指标，使利润能分配到极为广大的股东手里（股东的人数将远远超过今天），并且在执行经营管理的委托事务时，它们更能反映股东的意图。人们可以想到，如果公司不那样做，另一种办法就是公司将受到愈来愈多的管制，政府的作用将变得大得多。

总之，我们的社会由于一场强有力的科学革命提供了关于宇宙、地球及其运行活动情况、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等方面的新知识，它正在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改变，随着人们已认识到并开始仔细衡量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正

在发生“经济学在恢复青春”这件事。其结果是人们正在为资本主义重下定义，对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社会的那种旧文化则提出怀疑，并转而致力于适应一种在自然环境中能保持平衡、能提供长期维持文明的前景的着眼于合理使用资源的经济。如果幻想诸如当前能源匮乏等痛苦的事态发展可能会消除今天新知识对我们的社会和世界所施加的强大影响，那将是愚蠢的。更为可能的是，当人们更清楚地抓住了今天能源和原料匮乏的根源时，他们大概会对那些不能理解财富的含意的追求物质享受论者和传统经济学家的旧价值观念提出更大的怀疑。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九月号美国《思潮》月刊 张仲礼译）

一个特大工业部门出了问题

——冲击着整个美国经济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编辑部

美国汽车工业的病情在加重，这一病症的影响正向全国迅速扩散。

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地区，没有一个主要工业将能免受其累。

新车的销售，在今年早些时候就已由于能源危机而不振，最近数周来更急剧下降。现在看来，一九七四年的美国新车销售量很可能比一九六三年以来汽车工业没有发生重大罢工事件的任何一年都要少。

创纪录的卖不出去的车辆存货堆满在库房和推销商的样品间里。装配工厂相继减产，或全部停闭，而且一停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已有约二十万工人被解雇，占汽车工业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有些人赋闲已近一年。

白领阶层(指一般的职员——译者)也被辞退。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在准备进一步裁减职员。

整个说来，底特律的阴暗气氛几乎没有松动。亨利·福特第二说，更糟糕的事情可能还在后头。抱有这种看法的并不限于他一个人。

会出现一次更严重的衰退吗？

正是汽车工业的这一派萧条气象，使政府内外的经济学家纷纷预言：行将发生一次比他们自己仅仅几个星期以前所预计的为期更长、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对于全国来说，底特律的不幸真是一个坏消息。汽车工业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也是影响面最广的工业部门。

主要的汽车制造公司虽然只有四家——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和美国汽车公司，全部以底特律地区为基地——但它们经营的工厂和有关设施却遍布三十六个州。在二十八个州的七十四个城市里都设有汽车装配工厂。

约有五万家公司向汽车制造公司供应原料、零件和劳务。其中两万家公司以生产汽车部件为其主要或唯一的业务活动。去年，这四大家汽车制造公司为它们所需要的原材料等物资付给供应厂商的货款总额超过三百四十亿美元。

因此，当汽车工业的业务每况愈下时，其冲击波迅速射向各个方面，是毋庸奇怪的了。

最近的减产，来得很突然，所以只是到现在才在供应厂商间发生反响。但这样的减产幅度，看来最终必将累及整个经济，造成的损害即使不是大到危急的程度，肯定也是够严重的。

汽车是零件的总和

汽车工业吃进原材料的胃口非常之大。一辆汽车有一万五千个以上的零件，需要长达七英里的金属丝和一吨以上的钢

材。

全国一半的收音机是安装在汽车内的。汽车工业每年需用的软塑料足以做一千两百万只沙发的面子。

美国工业所消费的橡胶有三分之二用于制造和装备汽车及卡车。因此，轮胎和橡胶公司开始感到了困难。

尤尼罗耶尔公司的底特律厂已经解雇了一千名工人。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已经要它五个工厂中的几千名雇员每周只工作四天。古特里奇公司宣布了解雇劳动力百分之二的计划。戴维森橡胶公司使它的一百五十名生产工人处于暂时解雇状态。

很大一部分橡胶用于制造轮胎。轮胎是要有车轮来装的，而每辆汽车需有五只车轮。因此，向四大汽车公司供应车轮的主要厂家凯尔西—海斯公司正在裁减其劳动力。

板玻璃是汽车上的重要项目——汽车工业耗用了全国板玻璃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利比—欧文斯—福特玻璃公司已经无限期地停止了一千两百名玻璃工人的工作。另一家供应板玻璃的主要厂家匹兹堡板玻璃公司已停闭了两个厂，一直要停到明年一月份。

少造一辆汽车意味着少使用约三十六磅的铜和五十八磅的锌。总计起来，汽车工业要用去全国工业锌的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和铜及铜合金的消费总量的十二分之一。在生产这些重要金属的基本工业中，工人的解雇与否主要取决于当前物资储备方面的需要，但是汽车工业对这些金属需求的下降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不利因素。

重要的例外

到目前为止看来只有一个主要工业部门没有受到汽车工业

减产影响的波及，这就是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在正常年份要用去全国钢材生产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为数在一千八百万吨以上。

但是，钢材供应原来就处于不足状态，汽车制造厂家甚至现在还遇到交货脱期之事。由于煤矿工人罢工，钢铁工业相应有所减产，这就使这方面的前景变得更复杂了。

每当汽车工业遭到困难，通常总是意味着汽车制造厂家减少对新机器和新工具的投资，而这笔投资支出本来是会流向许多工业部门，成为它们的收入来源的。

克莱斯勒公司和福特公司表示已暂定要削减明年度的资本支出。通用汽车公司则说，它仍然希望把资本支出维持在一九七四年的水平，即十四亿美元左右。

当汽车工业的协作部门被迫关闭工厂，裁减职工，削减它们自身的进货时，其经济后果有时要比汽车工厂本身停产所造成的更为严重。这是因为，汽车工业的劳动合同中都订有补充失业救济金的办法，而在协作部门中大多数工人是享受不到这一保护的。

最根本的影响

当汽车工业出了毛病时，全国经济生活几乎没有一个方面能长期不受影响。对于绝大多数的公民来说，汽车是生活的必需品。

去年，消费者在美国零售市场上所支出的每一个美元中，有二十美分用于各种方式的汽车购置。在购买耐用消费品包括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等等在内所支出的每一美元中，汽车一项就占了五十九美分。

汽车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如此必要，所以借债买汽车已习以

为常。今年九月，每一百美元的分期付款债务中用于购买汽车的就有三十四美元。

新车销售量的突然下降（现在比一年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是否表示美国人对汽车的爱慕消失了呢？经济学家们并不这样想。他们指出了与此有关的其他一些因素。

首先是价格问题。随着一九七五年型汽车的问世，新车价格平均上涨了四百二十五美元。由于总的经济前景已呈现停滞现象，因此有人认为车价的上涨促使许多潜在的汽车买户取消或者推迟了购车计划。

加之，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已经降低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食物、衣着及住房的支出已成为当务之急。即使是汽车也得排在后面了。

人们认为高昂的汽油价格（一年内上升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也是一个遏制购买汽车的因素，特别是一再有风声要急剧提高汽油税，而且如果汽油供应再度紧张，还有实施配给的危险。

解决汽车工业困难的办法已经在望吗？有经验的观察家认为并没有立即奏效的灵丹妙药。

十二月一日就任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托马斯·A·墨菲对采访记者说：

“我并不认为我国经济有什么根本性的毛病，可是，反映消费者信心的一些指标却表现出人们顾虑重重。我可以这样说，通货膨胀基本上已被克服。……目前唯一缺少的东西是消费者方面的信心。”

使

主张给一点喘息时间

密执安州参议员罗伯特·P·格里芬(共和党人)提出了另

一建议。他在对参议院同僚的演讲中说，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国会应当放松一下对汽车工业的管束——给它一点喘息时间”。

这位参议员认为，政府为了行车安全和排气控制而“规定要装在汽车上的各种形形色色东西”把新车售价抬高了七百美元。他继续说：

“除非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在这方面来一个刹车，否则到一九七七年时新的安全标准和新的规定将会使汽车价格因此而上涨一千二百美元。这还没有把通货膨胀造成的增价计算在内。

“国会一股劲儿地想把汽车变成一种万无一失、保险不出事故的坦克——既不会污染环境，又会‘调频’式播送音乐——结果，给普通的汽车工人带来了灾难，他不再有力量买汽车了——他不是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就是已经失业。”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王宏儒译）

会出现另一次大萧条吗？

〔美〕保罗·A·塞缪尔森^①

卡尔·马克思常常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历史往往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了闹剧。美国人民现在显然感到历史真是要重演了，但认为两次都是悲剧。

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报告表明，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美国人民认为我们正在走向经济萧条。这种恐惧并不是不了解情况的普通老百姓所独有的。今年六月，具有威望的伦敦《经济学家》就曾发表过一篇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论文，文章认为由于高昂的石油价格而引起的国际收支巨大赤字将使世界陷入经济萧条。就经济状况征求过我的意见的那些进行大量投资的企事业，现在把他们的流动资金投资于国库券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投资放在收益率可达百分之十一的我国最大而又最牢靠的银行存单上，而是放在收益率仅百分之七的国库券上，他们承认这是由于害怕风险之故。

害怕发生象三十年代那样的萧条，有充分的根据吗？我认为并不如此。但是这并不是人们具有可靠的、甚至是满怀信心的见解的一个问题。因此让我来查对一下那些能使大家对这个问题

^① 作者是美国经济学权威之一，一九五一年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长，一九六一年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为国际经济学会会长，一九七〇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兼联邦储备委员会顾问。——译者

作出合理判断的根据吧。

情况究竟如何

在接受盖洛普民意测验所抽样调查的人当中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能知道三十年代大萧条在国内外的真实情况：

第一，在美国及德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失业，而在德国就此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执政。

第二，在我国一万五千家各式各样的银行中，有好几千家破了产。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银行——这是在根据政府制

大量小牛被枪杀、活埋

——美国当前的经济
危机一景

（原载一九七四年
十一月十一日美国《新
闻周刊》）



订的一套新规章让最有清偿能力的银行重行复业之前所采取的
第一个步骤。

第三，在我们现在称之为衰退(我认为这一提法是正确的)
的当前经济情况下，以货币表现的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其年增长
率仍达百分之十。而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间，以货币
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

第四，今天我们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以
及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争论，在于今后十二个月中货币供应量的
增加应当是百分之七左右(我的意见是如此)还是百分之四点五
(这是许多货币学派人士的看法)。而在三十年代初期，按照一
切定义来说，货币供应量都是下降的。

我可以继续回顾下去，看看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国内外的
局面是何等严重，看看当时情况比我们今天在经历的还要严重
多少啊。但是这样做未必就能促使关心事态发展的人消除疑团，
他们担心目前的情况会发展成为空前恶化的境地。毕竟你还可以
有力地争辩说，一九二九年大灾难后的第一年即一九三〇年，
看来情况也并不太坏，然而我们现在知道那一年情况却是以后
严酷十年的预兆(十年中美国经济是在就业不足条件下度过的)。

但是，一九三〇年的衰退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恶化成为一
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大萧条——换句话说，是不是不可避
免地要陷入萧条状态而且要一直继续到全世界被拖入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血腥折磨后才结束呢？

过去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现在的想法不同
了。

历史是往事。如果希特勒不进攻俄国，如果拿破仑不滞留
下来和约瑟芬调情，你也无法就此证明事情的发展究竟会有什

么变化。但是，对一位比能讲古代故事的人更为高明的优秀历史家来说，他的才能应能使他从一切现有的资料中为每一事件设想出种种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别了胡佛主义

三十年代大萧条之所以并非是不可能的，今日之所以未必会发生那种萧条，其基本原因在于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是遵循正统的财政方针行事的。那时一旦情况恶化，当局就执行紧缩政策并且强制人民也照样行事。

全世界民粹民主政体已经尝够了智慧之树^①的苹果，这句话决不是什么空洞的陈词滥调。我们是生活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里，我们决不会再回到赫伯特·胡佛主义去了。^②

我看到前面有困难，但它不是一九三〇——一九三三年型的困难。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美国《新闻周刊》王宏儒译）

① 能使人分辨善恶的智慧之树，语出《圣经》。——译者

② 指不会再回到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所执行的紧缩政策去了。——译者

走向世界大混乱：我们面临 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吗？

〔英〕沃尔特·拉克尔^①

〔内容提要〕 这篇文章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作者认为，美国评论家佐尔扎发出的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的预言的最大错误是没有估计到“新的危机”的到来。

文章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概况，认为“一次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已不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在于这场大萧条将严重到什么程度，而它又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影响”。第二部分分析了印度和南亚的形势，认为南亚次大陆国家中，印度是最经不起经济危机冲击的国家。“密切注意印度事态发展的人士已得出结论，除了发生奇迹外，印度这个国家将会瓦解”。第三部分分析了中东和欧洲，指出苏联为了谋求在中东的统治地位，掠夺波斯湾的出海口，“它就不会有恢复那里和平环境的兴趣”。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走向政治统一和加强军事合作的局面逐渐在消失，这样，“一个软弱的欧洲就迟早会全部或部分地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第

^① 作者是伦敦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著有《争夺中东》、《欧洲的再生》、《中东和世界政治》等书。——译者

四部分是结论部分，作者认为经济闪电必将带来政治雷鸣。一九二九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掌权，现在的情况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多数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能否存在下去将成问题”。苏联将利用这次危机在欧洲、中东和南亚次大陆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国际局势将会出现“一连串政变和反政变，有的地区将长期处于混乱之中”。作者鼓吹及早装置避雷针，“一旦发生雷鸣，那时再想装避雷针，就嫌为时太晚了”。

两年前的一九七二年十月，维克托·佐尔扎曾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宣称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佐尔扎先生写道：让怀疑论者去嘲笑吧！十年之后他们是会信服的。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和解的时期，走向几代人的和平。中东冲突将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内解决，中东石油将促使大国坐下来谈判。佐尔扎先生解释说，这种救世主式的美景不是从固有的乐观情绪中产生出来的，却是“通过冷静地估计国际生活的事实，根据大国出于本身利益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合作的方式这一判断”而产生出来的。

这篇专栏文章的调子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情绪，尽管有点过份狂喜。说和平已经到来、战争已成过去这样的信息大体上也包含在一些西方政界领导人的演讲和写作中，这些人包括从尼克松和基辛格到维利·勃兰特。

佐尔扎先生的要等十年才能使怀疑论者信服的期限还只过了两年，或许有人会争辩说我们应该有点耐心。但是这两年过后的情况实在并不令人鼓舞。现在人们的情绪大大改变了，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缓和及苏联的意图要再想一想罢了。除了那些国际重大问题依旧存在——中苏之间可能的军事对

抗,缓和的走下坡路,美国和欧洲的缺乏合作——一系列新的危机又在形成之中。那些鼓吹黄金时代的人的最大错误或许在于他们认为国内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民的满足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恰恰就在这些方面发生了新的危机。而且,有很多理由能使人相信,这些危机还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从未经历过的一次国际大动荡的前奏曲。

正在迫近的经济危机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经济情况。这里我们发现,是否会有一次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已不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在于这场大萧条将严重到什么程度,而它又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影响而已。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三年间,美国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二点八,西欧是百分之四点三,日本是百分之四点八。一九七三年四月到一九七四年四月间,它们的年通货膨胀率已各为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二十四,目前则甚至更高了。即使是在西欧最为坚强的西德经济,今年通货膨胀率也将达百分之八左右。为了要对付通货膨胀,就要采取例如收缩通货和贬低币值等种种极不得人心的措施,而且这种措施也并不见效。近年来,“呆滞膨胀”或“萧条膨胀”,即经济呆滞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存在,已是一些国家经济上的特征。这导致了社会关系日益紧张(老的说法就是阶级斗争加剧),罢工大规模地在进行,总之是出现了种种严重的紧张局面。

各工业国受到影响的严重程度并不一样。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几乎达到英法两国总和的西德,一九七四年结束时将有相当大的贸易顺差。但大多数国家由于石油价格翻了四番,将无法

弥补它们的国际收支赤字。英、意、法、日贸易逆差的总和将为三百四十亿美元左右；它们已从美国银行界借款一百二十亿美元，这样它们还可以维持一年。但它们没有偿付借款的能力，而如果石油价格并不大大削减，它们要再借新债就非常困难了。也应该指出，是粮价和其他原料价格的上涨，早就在促使通货膨胀螺旋形上升了。

原料市场的繁荣导致第三世界的严重分裂，有的国家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巨富，而有的国家却简直一落千丈，达到了破产和挨饿的地步。由于自然界物资分布很不平均，人口稀少的国家最为得利，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则处境悲惨。石油生产国去年从工业国那里收进了六百六十亿美元，但这笔款子的半数以上归人口总数仅一千一百万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利比亚、阿布扎比和卡塔尔五个国家所有。具体地来比较，阿布扎比每人平均收入今年约为四万七千美元，而邻国也门却只有四十美元。又例如，只有四百万人口的赞比亚从铜的输出中赚了八亿美元，而邻国坦桑尼亚（人口一千三百万）和肯尼亚（人口一千万）的经济增长率却都是零。印度今年不得不为石油进口付出十三亿美元，占它拥有的外汇的半数。黑非洲的全部石油开支将达十亿美元，对多数非洲国家来说，这意味着要抵销它们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不等。

形势由于粮食危机而更为严重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现在世界谷物的储备量只能供二十七天消费之用，有三十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大灾难。一九七三年的粮食危机是由于美苏之间达成的谷物交易史上最大的一笔买卖（其后果是最具破坏性的）而造成的。一九七二年小麦价格每蒲式耳为美金一元四角；由于达成了这笔交易，由于接着而来的投机活动及其他因素，价格上涨为美金六元三角六分。到一九七四年六月，价格回

跌到美金三元四角，才避免了立即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危险。尽管如此，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前景仍极黯淡，而对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非洲和东南亚一些穷国来说，前景更是灾难性的。

即将来临的印度和南亚的危机

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加剧国内紧张状态。今天，富国和穷国，落后的和发达的，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然而，如果按照“经不起冲击的程度”排列起来，印度次大陆可占第一位。印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唯一的生活水平确实下降的大国，它又是过去十二个月里亚洲国家中消费价格上涨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一九七二年以来它的工业产量也在不断下降。在印度的五亿八千万居民中，有三分之二是文盲，近一亿的人是失业者，而另外一亿七千万则是半失业者。印度的文盲要比产业工人人数还多。极大部分人还象二千年前那样在农村中过活。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以及城市人口的几乎一半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中。至于诸如种姓制度（属于各种姓以外的没有权利的贱民，其人数则达一亿二千万人）和印度教的迷信束缚等根深蒂固的祸害，那已是尽人皆知，毋庸赘述的了。

六十年代时，印度宣扬说绿色革命将改变农村的面貌。然而不久，情况却是无地农民的人数迅速上升。然后仅在两年前那次有名的战胜巴基斯坦的战争之后，甘地夫人吹嘘说，印度即将自力更生地解决它的问题，印度将不再举外债，印度即将战胜贫困。但是形势却急转直下，那位继承了她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全部傲慢和自以为是的性格而极少继承她父亲的长处的甘地夫人不得不承认，一九七三年将是印度历史上最困难的年度。这句话倒是正确的。但一九七四年正在成为更为困难的一年，而

未来岁月的形势甚至还要坏。密切注意印度事态发展的人士已得出结论,除了发生奇迹外,印度这个国家将会瓦解,这或许将在一段军事独裁之后发生。

印度的崩溃对苏联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印度将期望从它的北方朋友和盟国那里获得援助。不言而喻,这样规模的援助(古巴的六十倍)对苏联经济来说是忍受不了的。更坏的是,这种援助不会带来相应的利益,因为莫斯科早已在印度享有着它要施加的政治影响,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军事基地。然而如果苏联拒绝帮助印度人,这又将自然而然地加强中国人在次大陆的影响,而苏联人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愿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苏联人会指望美国、伊朗和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向印度提供长期性的援助而同时维持和加强它自己在印度的地位。

原子弹也不大可能拯救印度。对这样一个穷国来说,原子弹的花费是惊人的。根据比较可靠的计算,要维持一小支高质量的核力量需要在十年的时间内每年有六十亿美元的预算。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将因此而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一位知名的印度议员声称,他的政府所表白的和平意图仅仅是块“遮羞布”而已,印度正在起步走向全球性大国的地位。这种说法缺乏真实性,在可见的将来,印度不会成为全球性的大国。但是事态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是确实存在着印度人输出他们这项新工业产品的危险。自从圣雄甘地及其不合作主义的那些日子以来,印度已走得很远了。人们不应该对现在印度领导人的克制心和责任感抱有任何幻想。面临着内部崩溃的局面,印度政府难道会犹豫不把核装置出卖给伊朗、科威特、卡塔尔或任何其他要这种东西的人吗?最低限度,难道它不会利用威胁要出卖核武器这一手来对大国,特别是美国,进行敲诈勒索,要求提供大规模援助吗?核装置不会解决印度的国内问题,不会替目前没有职

业的大学毕业生(占全部大学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找到职业,也不会替生活在每年三十美元的贫困线之下的一亿七千五百万印度人找到粮食。但是印度却满可以用核装置来作为防止彻底崩溃的一种最后的孤注一掷。

有些印度人很想再肢解巴基斯坦的剩余部分。有人议论要迫使巴基斯坦分成四个独立的小国:旁遮普、信德、俾路支斯坦和巴克同尼斯坦。印度人在支持俾路支斯坦人的起义,而阿富汗人则在西北边境省积极活动,并声称在巴基斯坦受压迫的帕坦人一直渴望着要同阿富汗边界那边生活愉快的同族兄弟团圆在一起。巴基斯坦方面则正在悄悄地依赖伊朗和有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把自己重新武装起来,希望如果印度崩溃,它将收回一些失去的东西。但巴基斯坦军队已丧失了自信心,国内也缺乏领导人才,占统治地位的人民党甚至比印度的国大党更处于瓦解的状态。伊朗国王已小心谨慎地作出了暗示,如果阿富汗(在俄国人支持下)施加压力要巴基斯坦北方几个省分离的话,他愿意向伊朗东部边界的这个穆斯林兄弟邦伸出援助之手。巴基斯坦人同时要受到印度和阿富汗的日益加剧的敌对活动,有那么一天,他们是会接受伊朗人的慷慨帮助的。

即将出现的中东和欧洲的混乱局面

苏联在阿以冲突中一向而且继续在扮演着一个反面角色。那种认为如果给俄国人一个当一下“诚实的捐客”的机会,他们将表现出责任心和作出建设性反应的这种想法,完全属于幻想的范畴。俄国愿意在中东就象在东欧一样保证有一种苏联式的和平,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只要它不成为那个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它就不会有恢复那里的和平环境的兴趣。为了加

强它的地位，它将支持伊拉克人和南也门人去反对沙特阿拉伯，也将支持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去反对以色列。当然它追求的最大目标既不是苏伊士，也不是戈兰，而是波斯湾。是不是象列宁设想的那样，通向巴黎和伦敦之路要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是还有争论余地的问题；而更能肯定的是，通向科威特和阿布扎比之路可以经过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俄国人一直悄悄地在这个地区加强他们的军事地位，他们也没有忽略那些小小的石油生产国，而科威特则是他们政治活动的焦点。

最后还有欧洲。意大利实际上已作出了退出共同市场的选择。英国业已削弱，即使接受它的重新进行谈判的要求，它至多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包袱。两年前就很明显，西欧走向政治统一的势头已归消失；那时就知道，不能期望西欧会走向进一步的军事合作。从一九七二年以来，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好几个国家都已不得不进一步削减国防支出。换句话说，两年前的危险是，欧洲将不再向它自己规定的目标迈进。今天，欧洲是在全线退却。

美国人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德国不愿担当领袖的角色。德国是西欧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现在也是政治上最稳定的国家，并且拥有一支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但是，一个由德国领导的欧洲，不管设计得如何小心谨慎，根据近代历史的经验来看，却完全没有可能性。而且德国也愈来愈不愿承担共同市场的开支。赫尔穆特·施密特接替维利·勃兰特时曾告诉朋友们说，他不再想继续“向那个破产了的团体进行投资”。或许这是一句一时冲动的轻率话，用不到过分认真对待，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情绪。西德在施密特领导下将同美国保持联系，而法国在吉斯卡尔·德斯坦领导下也将如此做，这部分是因为这些领导人在信念上都是大西洋主义者，部分是因为事态的发展正在促使他们

同大西洋联盟中的老大哥美国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法国同西德之间将会发展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在适当的时机也可能会恢复总的关税同盟精神。但就政治方面而言，欧洲已回到了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地位（只是物质生活水平较高些），内部分裂，也不能保卫自己。

但是，为什么要为一个中立的欧洲而担心呢？难道这不是在许多方面能解决旧大陆一系列问题的一个中肯的答案吗？麻烦在于要使中立可靠就要有力量保卫中立，而欧洲却做不到这一点。一个强有力的欧洲是可以中立的，而一个软弱的欧洲就迟早会全部或部分地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领导人是很了解这一切的。政治局委员波诺马连科（原文如此——译者）在今年纪念列宁诞辰的演讲中谈到了在一个或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即将发生革命的转变——没有理由可以假定他指的是美国。马尔采夫将军在《红星报》上发表的文章预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个环节“随时”会发生一场根本性的革命转变。他争辩说，为了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形势，苏联必须加强它的军事潜力。因此马尔采夫也看到了世界事务中出现着一个转折点，但是同有些西方观察家所理解的地球上一派和平气象很不一样。

在主要的欧洲国家中，西德还能混下去，但是正如维利·勃兰特在最近辞职之前曾说过的那样，西德将为民主制度的能否生存而担忧。英国也能混下去，它将完全为北爱尔兰问题所缠住。北海的财富似乎已是唾手可得，只要下定决心，到七十年代末就能充分利用这些油田。但是在今天英国的环境下，会不会下这个决心也是很不肯定的事。在这期间，英国的生活水平大概会下降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

至于法国，《新闻周刊》的一个记者在评论最近的选举结果时曾充满乐观情绪地说：这位法国的年轻新总统将能为法国做

一些如同肯尼迪为美国所做的那样的事——“使国家再次成为一个有魅力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朝气的、充满新思想新办法的国家”。可叹的是，只隔了几个月，吉斯卡尔·德斯坦就得为他的政府的生存而进行挣扎，而在这场斗争中，却不再有什么魅力可言了。如果蓬皮杜晚死六个月，非常可能他根本就不会当上总统，因为到了今年秋天，法国就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全部影响。要应付紧急情况就得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由于这个国家正严重分裂着，骚乱和大规模罢工将日益加剧。吉斯卡尔具有绅士风度，是一个胜任的财政部长和一个满不差的足球运动员，但是要在今后的岁月里治理法国，所需要的却不仅仅是搞好公众关系和掌握经济专门知识而已。

三巨头和世界危机

从最近一系列的事态发展来看，昨天会作出关于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的预言，关于新的和平、繁荣、缓和以及伟大的共同努力的时代即将到来的预言，这是令人感到诧异的。人类面临的问题，用中国旧时的说法，就是“天下大乱”。世界各国可以坐下来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友好气氛、利他主义、自我牺牲的精神下决心处理这些问题。所有这一切也不是不可能，当然这样就会阻止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更可能的是，各国将依然如故，我行我素，追求各自的利益。

西欧部分或全面地崩溃，这对苏联来说只会是有利而无弊的，而南亚的崩溃却肯定并不符合它的利益。反过来看，欧洲的稳定与否对美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而印度次大陆发生一场大危机的话，不论结局如何，对美国的利益却影响不大。

期望联合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在现阶段会采取有效措施来战胜世界性通货膨胀、解决原料问题和对付穷国面临的紧急情况，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想法。这些组织充其量将作出一系列恳切的表态，而别无所能了。在危机时期，政府的当然倾向是根据民族利己主义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总之是推行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过去的全部经验表明，这种措施是行不通的；唯一可预料的结果将是世界贸易迅速下降而许多国家的实际收入将进一步下降。而且这一次将比三十年代初期甚至更难达成协议和采取一致行动。这是因为上次的世界经济危机主要只涉及工业化国家，而即将来临的危机还涉及原料生产国和重要的消费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上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中欧的登台掌权。当然，正如我们告诉一年级学生的那样，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是，同即将来临的局面相比，回过头来看时，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看来还是人类历史上一段安静的、和平的、比较愉快的时期。现在的情况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多数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能否存在下去将成问题，而现在还存在的自由国家本来也已不多了。

至于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在对付危机方面都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而中国则简直不会受到危机的影响）。美国人象大多数人一样，总是认为自己的问题最麻烦，但比起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来看，这些问题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有水门事件、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内问题，美国是强大的。它不需要靠别人帮忙，它的经济还不会崩溃，它也还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的利益。当然，基辛格先生肩上的责任是不值得羡慕的，继承他的人的责任也不会轻。美国的外交政策目前是一个时候处理一个危机，不久它将不得不同时对付好几个。到那时，当人们想到在过去的日子里，国务卿居然能离开华盛顿五个星期，穿梭来往于两个外国

之间，试图解决一个仅仅属于地区性的争端，他们将感到奇怪，并有不胜今昔之叹。

苏联对付危机的地位也很有利。它将试图在欧洲、中东，也可能在南亚，扩大它的势力范围。将又有几个国家变成共产主义的国家，但这并不必然会加强苏联阵营的团结。总的政治趋势是转向带有民族民粹主义色彩的独裁政权。会有一连串的改变和反政变，有的地区将长期处于混乱之中。

新的国际制度将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我们还是处在一场世界危机的第一阶段中，显然，要猜测这场危机将持续多久而以后的新秩序又将是什么样的，那是过早了些。或许这场危机没有我们所担心的那样严重，而其政治影响也并不很深远。或许看来是解决不了的问题终于会由于人们的努力和才能得以迎刃而解。或许本文所叙述的事态发展将在多少年后而不是几个月后发生。人们注意到，在经济暴风雨中，闪电和雷鸣的间歇时间往往较长。还应该指出，经济闪电和政治雷鸣之间又有一段间歇时间。但是，一旦发生雷鸣，那时再想装避雷针，就嫌为时太晚了。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九月号美国《思潮》月刊 张仲礼译）

不要忘记谁是大萧条的最大受害者

〔美〕沃尔特·F·蒙代尔

编者按：沃尔特·F·蒙代尔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曾一度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他在文章中一再强调经济问题是当前西方世界的主要安全问题，他警告苏联不要忘记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最大受害者”是谁，不要在这场危机中趁火打劫。

经济问题是当前世界政治领袖们关心的中心问题，它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事务的议事日程上居首位。以往二十五年中的主要国际安全问题，如战略核武器竞赛，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欧洲大规模武装起来的同盟之间的抗衡，以及大国卷入地区冲突的威胁等问题仍旧存在，但这些问题正在被国际经济运转脱离控制的危险所遮盖，相比之下要黯然失色。如果这个危险竟然发生，那么对于国际稳定，对于西方民主政体的继续存在，对于国家安全本身，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威胁了。

去年六月间，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级会议上已明白地说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并不是军事性的。他说，其成员国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所“包含的危险，不论怎么说都不会过分。通货膨胀和必然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对西方社会的基础发出了最大的威胁。”

正如通货膨胀现已成为国内最最迫切的问题，国际经济政

策对我们当前是居首位的外部挑战。

多年来，我们对传统的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所给予的优先地位，现在必须给予国际经济问题了。如果我们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与随之而发生的安全问题相比，现存的安全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经济问题，由于其本身的重要性已成为当前的紧急问题，这一点，现在我们对此都应该是明白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家第一次严肃地谈到经济大萧条。编辑们和经济分析家们，从《商业日报》到《新共和》周刊，都在指出经济崩溃的危险信号。

欧洲和日本的形势只有更糟。八月间，通货膨胀率在英国为百分之十八，在意大利为百分之二十以上，在法国为百分之十五到十六，而在日本约为百分之二十五。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英国和意大利正在下降，甚至在拥有欧洲最健全的经济的西德和在过去曾有奇迹般的增长率的日本，仅增长了百分之二。高昂的利率已使投资到处窒息，而失业在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都不祥地增加着。

大多数穷国的前景更为黯淡。今年为了应付粮食和能源价格的增加而需要的追加援助并没有实现。今年歉收的秋季和预计今秋较低的北美收成，可能正在为广泛的饥馑和粮食缺乏打下基础。

当展望国际经济局势的时候，挫败的情绪又助长了恐惧的心理，因为这些问题绝不是单个国家所能控制的。由于经济越来越互相依赖，这些问题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依靠全面的和系统的国际努力才能处理它们。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属于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国家成为独立国家，但是还没有发挥它们的经济力量或政治力量。东西方之间的竞争，以及与西方的传统关系，为第三世界保证了一定

数量的发展援助。经过一段时期后,共产主义国家变得更強了,并开始更多地和西方与第三世界进行贸易,而后者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是处理货币事务的二十人委员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参預了国际经济制度的管理。

在七十年代开始时,我们美国和西方工业化世界的其余国家,包括日本,显然控制着我们自己的经济安全。相互依赖似乎只是有限的。实际上国际经济就是指西方世界的经济。我们并不在任何重要方面有依赖共产主义世界的经济行为。我们对第三世界的需求仍大部分由我们来控制,尽管他们的代表们叫嚷要求更大的平等。

情况在过去四年中显著地改变了。西方的国际经济制度不再是绝缘的了。第三世界和共产主义国家分别通过卡特尔的石油标价和大量购买谷物,戏剧性地显示了瓦解西方国际经济制度的能力。

此外,就是在今年,一个“第四世界”从第三世界里沉淀出来了。它的成员是那些缺乏主要资源或经济力量的国家。这一组的国家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占世界人口很大部分的地方更为有依赖性,更为遭受剥夺,也是更为觉察到这一情况的。这个第四世界的一些不惜铤而走险的国家现在可能弄到核武器,只能更增加了悲剧的前景。

世界上的经济力量有了新分布情况,我们必须学会应付它。但是,这种改变了的经济方程式的突然出现,并不只是苏联购买谷物和石油危机的结果。那些事态发展的冲击作用是与西方国际经济制度内部已在进行的长期性变化成正比的。

问题是怎样把与共产主义国家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结合进世界经济中去。解决这个问题要有耐心和长期的努力。我们需要找出一些办法,一方面处理不公平标价和倾销问题,另一方面

应付在供应不足形势下难于预测的大规模的干涉行为。前者将是困难的，因为共产党人对于价格和它在他们经济中的作用的概念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后者也将是困难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看不到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开始，可以要求苏联在缓和世界粮食局势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至少要能同意把一切有关的农业情报提供给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也不应事先不发出一声警告就跳进市场购进大量粮食。并且苏联应该直接参加一切能够拟订的关于供应肥料和世界粮食储备的活动。

苏联按其潜力来说，可以提供比它今天要大得多的经济援助。去年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仅达六亿二千二百万美元，而它提供的军事援助估计为十七亿美元。发展较差的国家既处在这样绝望的境地，应该说服苏联更改它的对外援助的优先次序。

最后，必须使苏联了解在东西方的政治竞争中需要克制，也有其经济的一面。苏联力图使阿拉伯人继续削减他们的石油生产和禁运，这些，对于西方的安全利益是与苏联给予十月战争的军事支持（和明显的鼓励）同样带有威胁性的。

当然，要说服苏联认识到它在这些地区进行合作有其长远利益是困难的，我们对之不应存有幻想。

然而，苏联有改进国内情况的希望——这些希望对于苏联领导集团的权力地位是极关重要的——取决于它与工业化世界的经济联系的发展，以及实际上从那里取得的经济援助。况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苏联成为来自大萧条的一连串政治和安全后果的最大的受害者。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范围的萧条，苏联也将受到损害。

因之，更为负责地参加到世界经济合作中去，应该是符合苏

联的利益的。的确，西方现在将这样的合作作为缓和的中心考验和试金石是有理由的。西方的信贷和和平的非战略性贸易，应该和共产主义国家方面承担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起拟订一个合理的经济行为法规联系起来，并且使其努力参加对发展中国家新的援助。

(摘译自《越出缓和：走向国际经济安全》，一九七四年十月号美国《外交季刊》 卫宝瑛译)

书 刊 介 绍

《明天的战略》

本书是美国资产阶级军事评论家汉森·鲍德温广泛论述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军事战略的著作。作者搜集了不少苏美两霸以及有关国家军事部署等方面的材料，分析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教训”，估计了本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世界形势，提出了美国今后的总战略。本书已于1974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老调新弹危机歌

——一首美国歌曲“兄弟，你有一毛钱吗？”

编者按：在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美国人哈波尔和高尼合写了一首歌曲“兄弟，你有一毛钱吗？”这支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大美国人民在经济危机中身受失业和饥寒交迫的痛苦；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危机深恶痛绝的感情。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腐朽，经济危机日益频繁、日益加深。近年来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又象风暴一样出现了。这支三十年代歌曲的作者之一哈波尔回忆往事，对照现实，不寒而慄，于是借用老调，填写新词，把这首歌曲重新发表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纽约时报》星期增刊上；并把三十年代的老词同时发表，以资对照。作者还准备在纽约百老汇剧场举办的“我有一歌”节目中演出。他希望听众们和着钢琴或吉他同他一起歌唱。

从哈波尔改写的歌词中可以看到，四十年后的资本主义世界比过去更腐朽和更反动了。美国不仅大量出现通货膨胀、吸毒和犯罪；还在越南、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美国劳动人民家里那点生活资料，哪一件不是靠贷款取得的呢？但是哈波尔不能认识美国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对三十年代罗斯福

推行的“新政”还留有所留恋；他也看不清美国人民应当走的革命道路，而只能唱出：“兄弟，你能不能借给我一条上吊的绳索？”这样的哀歌。尽管如此，哈波尔的这首歌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人民已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现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迅速产生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风暴难道不正是起着唤醒美国劳动群众这样的作用吗？

Anthem for a New Depression

Horace Holman

lyrics

By the way, the music is written in the key of G major and the time signature is 2/4. The tempo is marked "Moderato".

Verse 1:
 I'm not a ghost, but my shadow
 hangs on the wall of my home.
 I'm not a ghost, but my shadow
 hangs on the wall of my home.

Verse 2:
 I'm not a ghost, but my shadow
 hangs on the wall of my home.
 I'm not a ghost, but my shadow
 hangs on the wall of my h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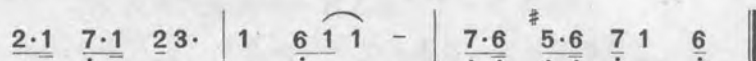
Bridge:
 I'm not a ghost, but my shadow
 hangs on the wall of my home.
 I'm not a ghost, but my shadow
 hangs on the wall of my home.

Verse 3:
 I'm not a ghost, but my shadow
 hangs on the wall of my home.
 I'm not a ghost, but my shadow
 hangs on the wall of my home.

一九七四年的新歌



从前遇上危机，有一毛钱，就算你有运气，



现在通货膨胀，又加吸毒犯罪，你有一块钱吗？兄弟！

合唱：

从前乘地下交通，
住房处处裂缝，
然而灵魂还未断送。
现在虽然有住房、汽车，
但是，银行老板，你肯不肯借给我一笔贷款？

一旦戴上钢盔，
我们欢呼山姆大叔万岁，
硬要不愿打仗的孩子穿上军装。
五千亿美元，
倾泻在越南战场，
我就是付钱的笨蛋……

从前有了罗斯福，
感谢上帝，
生活还有希望和意义。
现在摆脱不了尼克松，
阿格纽—福特，
兄弟，你能不能借给我一条上吊的绳索？

三十年代的老调

从前我修筑铁路，
使火车开动，——
让它同时间赛跑。
从前我修筑铁路，
现在已经完工，——
兄弟，你有一毛钱吗？

合唱：

一旦穿上军装，
天啊，真漂亮，
富于美国人的高傲。
五十万人送命疆场，
我这打鼓的小兵也跟着上。

从前我建造大厦，
高耸入云中，——
砖头、铆钉和石灰。
从前我建造高楼，
现在已经完工，——
兄弟，你有一毛钱吗？

喂，你可记得，
人们叫我亚尔，
亚尔就是我。
喂，你可记得，
我和你是好弟兄，
兄弟，你有一毛钱吗？

(洪茂斌译)

凯恩斯

凯恩斯(Keynes, John Maynard, 一八八三——一九四六), 英国经济学家。一八八三年六月五日出生于英国剑桥。在剑桥大学受“古典经济学”传统教育。在从事行政职务和研究印度货币问题以后, 于一九一五年任职英国财政部。凡尔赛和约谈判期间任该部的首席代表。他为了写《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 辞去代表职务; 在这本书中, 他提出德国没有能力按和约规定的赔款数额支付赔款, 并预言和约所定各款将对世界经济发生不良的影响。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 他担任《民族》杂志社长和政府的财政与工业委员会委员期间(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 他把自己的想法继续和实际政策密切相结合。凯恩斯男爵被认为是正统派经济学的主要批评家。在他的著作里, 经济学作为维护现状的叙述性科学的成分较少, 而更多的是作为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 以达到远大的目的, 如取得最高额的国民收入、充分就业和国际货币稳定等。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九三六年) 试图说明: 不能单靠自动调节的机械作用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 而必须靠有意识地鼓励资本商品的生产, 采取低利贷款政策和公共投资, 并通过减少储蓄来刺激消费。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任财政部长谘询委员会的委员和英格兰银行董事。他主张用强制储蓄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 并建议(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 发行国际货币和成立世界银行来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凯恩斯

男爵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死于苏塞克斯郡的费耳。

著作：《印度通货和财政》(一九一三年)

《概率论》(一九二一年)

《货币改革论》(一九二三年)

《自由放任的终结》(一九二六年)

《货币论》(一九三〇年)

《劝说集》(一九三一年)

《传记论丛》(一九三三年)

(译自《英国大百科全书》一九五七年版，第13卷，

第357—358页)

凯恩斯这位“最有天才、最富刺激性的现代经济学家”，是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董事兼司库，《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皇家经济学会的秘书，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和英国财政部的财政顾问。一九四一年五月，英国财政大臣伍德派他到美国同华盛顿当局商谈有关租借法案的实施和其它有关问题。

他给美国带来了一个警告：如果德国胜利，我们的经济生活就要遭到破坏，他还提出关于防止通货膨胀的忠告。凯恩斯的话在华盛顿是受到重视的，因为他在那里的影响多年来一直是很强的。早在一九三三年，据说他的“唧筒引水”政府计划曾在罗斯福那里得到销路(有些人一直称他是“新政在经济方面的教父”)。从那时起，他的信徒们就在指导政府支出方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也是英国筹措战费计划的拟定者，这个计划对于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支出计划都有影响。

这个计划首先在一九三九年以两篇文章刊载于伦敦《泰晤士报》，而在一九四〇年修订后以书的形式(《如何筹措战费》)出

版。这部著作的基本原理是：在战争时期缺乏通常由市民消费的商品。这种情况再加上大量生产军用品，就引起了对所有商品的迫切需求，以致造成物价猛涨和通货膨胀的后果。凯恩斯建议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不要大量花钱，应实行通货收缩政策。

按照他的计划，使所有有收入的人都把收入降低到最低限度，超过这个限度的一切所得，政府应从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强制储蓄”，把它作为黄金积累起来。等到战争结束后，以便能够通过偿还这些资金，避免或者限制战后物价的暴跌。积累起来的资金应该用于特别急需，而在战后开征资本税加以偿还。在征收这些资金的同时，政府应对所有的人配给低价的主要消费品，并对低收入的那些阶层的人发给家庭补贴。

当这个计划最初提出时，英国抱着怀疑的态度。工党反对它所包含的强迫成分，保守党并不认为“强制储蓄”的清偿能够完善地做到，其他团体认为它是对于英国人的爱国主义的一种侮辱。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通货膨胀的危险越来越明显，大多数人开始同意《旁观者》的判断：“这是一个避免通货膨胀灾难的妥当、合理的计划。”一九四一年四月，这种强制储蓄的建议以及凯恩斯的最不激进的一些建议被采纳到英国的新而庞大的预算里了。

凯恩斯本人着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他的计划的目的是不仅是解决英国的财政问题，而是“从战争的危机中抢救出确实的社会进步”。他说：“一般家庭现金补贴的发放、在工人阶级控制下工人财富的积累、廉价分配必需品，以及在战后征收资本税这些措施，加到一起，体现一种比我们近来所曾达到过的任何进展都要大的经济平等。”这种概念和凯恩斯对经济事务所抱的一般态度的那些含义有许多相同之处，是和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而且他的关于经济政策的想法，据说“对工人运动比任何其他个人的

想法的影响都大”。可是凯恩斯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工党党员。尽管凯恩斯对放任主义不断进行批判，尽管他对和平与战时债务有自己的理论，对金本位有他自己的态度，他却一直和自由党合作，有时还写些嘲笑工党的文章。

他父亲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和他类似。约翰·纳维耳·凯恩斯也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经济学家，在剑桥大学的教职员中和行政上早就有名。凯恩斯本人也从他父亲和母亲佛罗伦斯·艾达·(布朗)凯恩斯那里继承了非国教徒的那种反抗精神。他祖父，约翰·凯恩斯是个有名的非国教徒；他的外祖父约翰·布朗博士在贝德福特的班扬教堂里传教，并且是独立教会的伟大历史学家之一。

凯恩斯本人生于英国剑桥，在伊顿学院读书，据说那里的学生惯于把他称为“大鼻子”（他现在仍然面容清癯，鼻子有些过长）。他由伊顿学院又进了剑桥的皇家学院。在那里他是第十二名大学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并是剑桥联合学会的会长。他在一九〇五年以最高荣誉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立刻就进了印度事务处，过了两年，才回到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直到现在，不过他不时地还接受政府的任命。

这种任命一次是在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他出任印度财政与通货皇家委员会委员；另一次是在一九一五年，在英国财政部工作四年，这四年里有二年任第一秘书。凯恩斯以这种身份被派为巴黎和会财务处代表，以及在协约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上作英国财政大臣的代表。一九一九年，他厌恶地退出了和会，他认为人们只是在播种着危险的种子，这将会引起新战争。以后不久，他就发表了他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九一九年），这部著作一直被称为“所发表的最重要的对凡尔赛和约的研究著作”。

从那时起，凯恩斯所写的和在许多次讲学和演讲中所发表的任何东西几乎都对其他经济学家和许多非经济学家发生重要影响。他不久就被认为是对正统经济学派整个传统的挑战。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凯恩斯呼吁建立广泛的信贷基础，并且抨击金本位制是“野蛮遗迹”。他还在讲学中，在为经济杂志撰写的许多论文中，在讲演中和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任财政与工业委员会委员职务的时候，极力主张“对我们的社会制度进行逐步改造，以便使每个人能有维持过得去的消费水平的收入”。在不景气的那些年代里，他论断不景气的原因是由于严重的通货收缩所造成的群众购买力的低落，并且建议（这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建议的享有国际荣誉的经济学家）政府让货币大量出笼，以恢复正常情况和重新把工业生产恢复起来。英国政府基本上没有理睬这些话，而美国政府却接受了他的意见，实行了其中许多办法。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九三六年）中发表了他的关于一种变通的货币政策和扩大社会公用事业开支的许多观点，这部著作至少为某一方面人士称赞为“自从马克思《资本论》以来最重要的经济著作，如果认为只有古典经济学才可以作比较的话，那就是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以来最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不久，凯恩斯对政府支出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同于曾经影响新政的那种态度。他相信，政府刺激企业经济活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它应该专门致力于一个相反的政策，即有意识地使威胁经济繁荣情况的那些力量和缓下来。他说，这就意味着停止公共工程，增加税收，减少贷款。在当时，他的政治观点是，英国对德国应作一些让步。他说：“捷克斯洛伐克至少应该和德国进行磋商，谋求苏台德区日耳曼族问题的合理解决，即使这意味着波希米亚边界的调整。”他还建

议英国作出这样的安排，让所有愿意从德国迁徙出境的犹太人出境。从一九四一年七月以来，作为财政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是筹措战争与平时时期经费计划的制订者的凯恩斯，今天在竭尽全力地阻止他曾经一度想采用怀柔政策对待的德国。

他“身材高大，但是背驼得厉害，面色苍白，头发十分稀疏”，在生活上偶尔和在经济学上同样地不落陈套。一九二五年，他使两大洲的很大一部分人大吃一惊：他和一个著名的俄国舞蹈家洛波科娃结婚。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他对于芭蕾舞、搜集艺术作品一向有兴趣。他时常使英国财政部的官员们陷于混乱。有一次，当他想在一个严肃的正式文件里使用一句土话时，塞缪尔劝告他说：“英国语言里没有这样一个字。”凯恩斯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想把英国语言扩大一些。”

（摘译自美国《当代名人传》1941年6月，第43—45页）

燕子低飞要下雨

柏 露

在最近的国际舞台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的面面人物风尘仆仆，飞来飞去，不断地访问、会谈、签约、碰杯。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据他们自己说，这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国外的有些人士也信以为真，经他们一吹，好象当前国际局势真的“缓和”了。

事情果真是那样吗？我国农民有句谚语说：燕子低飞要下雨。勃列日涅夫这些“燕子”们，不停地飞来飞去，究竟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呢？我们从国外大批军事论文中，摘译了一组文章，也许可以从中看出一点这些“燕子”们飞来飞去的真实使命。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在中东的战场上硝烟未熄，战火有一触即发之势；整个欧洲，两霸的大兵严阵对峙；苏修在国内，不断掀起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的狂热；面对北极熊威胁的一些日本人士忧心忡忡；核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议论甚嚣尘上，等等。文章中的这些观点，反映出美苏两霸的争夺是当代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

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另一方面为“缓和”而到处奔波，这不是矛盾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比苏修叛徒集团显得坦率。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之愿意同苏联谈

判一个稳定的和平结构，是以美国在战略武器上继续保持优势为前提条件的”。基辛格的这句话，不是把勃列日涅夫的缓和骗局扯得粉碎了吗！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为了掠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谈判还是为了掠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存在爆发战争的土壤。

这里的一组文章，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写的。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资产阶级的，因而在文章中充满着渲染战争恐怖、唯武器论等唯心主义毒素；对于产生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根源，他们当然更看不到了。所有这些都，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识别和批判。不过，这些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代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国际局势并没有什么缓和。两霸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他们正张着血盆大口，总想吃人！

在大雨之前，气压过低，燕子就从窝里出来，低飞寻食。我国农民正是通过长期观察，认识到这是要下雨了。因而预作准备。今天，勃列日涅夫之流到处转游，这种情况说明，他们已越来越内外交困，坐立不安了。因此纷纷出笼，四处乱飞。这是值得警惕的。周恩来总理在我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核战争成为“可以设想”的了

〔美〕迈克尔·T·克拉雷

〔内容提要〕 这篇文章分析了美国的一种最新的“防务理论”，即所谓“打击对方武力”的核战略。作者认为，这种战略同过去杜勒斯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核战略比较起来，不是减轻而是增加了“热核大屠杀的危险”。并且指出，“拥有核武器，除了有其纯粹军事上的作用外”，还能“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带来好处”，而核武器的谈判，总是以“战略武器上继续保持优势为前提条件的”。作者在分析美苏核军备竞赛之后得出结论说：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几乎注定”“将以失败告终”。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宣布了美国防务政策上的一大转变。人们对这次宣布没有象杜勒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发表“大规模报复”演说时那样大吹大擂，可是，其意义的重大却是不相上下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所依据的假定是，只要美国保有一支不可摧毁的“第二次打击”力量，能够在自己遭到攻击时进行报复，一举炸平敌人的城市和工厂，国家的安全就有了保证；而施莱辛格新提出的“打击对方武力”论，却主张我们至少要有一支部分的“第一次打击”力量，可以在将来的超级大国对抗中摧毁敌人的导弹发射井和其他报复系统。施莱辛格认

为，现在敌我双方拥有武器的威力都足以在今后的战争中彼此“粉碎”对方的城市而有余，总统在面临苏联挑衅的那种假设情况下可能会不敢下令采取这样一个“自杀性”的行动，因此，有必要寻求一些更为“可行”的选择方案。

虽然有些战略家称道这种新武器系统，把它说成是代替“大规模报复”的“合乎人道”的战略，但许多专家却相信，施莱辛格提出的主张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将来的战争演变成为热核大屠杀的危险。他们的理由是，由于这种新战略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中间”步骤，可以不必立即倾全力打击对方的城市，这就使先发制人的核攻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实用、更为可取了。因为，如果双方都拥有一支“打击对方武力”的力量，只有首先发动攻击的一方才能确保它自己用于“第二次打击”的报复力量安然无事。

一九七四年以前，美国的战略一直是建筑在“确保摧毁”原则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说，要维持这样一支报复力量，它必须能经得起敌人的第一次打击而保存下来，然后它能够进而反击，使敌人的工业和城市遭到无法忍受的损失（在第一届尼克松政府期间，这一原则有时也表述为“保持充足的战略威力”）。既然双方都已具备了这样一支力量，核武器竞赛就稳定在一种双方“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亦即邱吉尔所说的“恐怖均势”在今天情况下的翻版。二十多年来，人们之所以不敢贸然发动核战争者，正是由于这一均势状态。

在美国方面，目前用以维持这种“相互确保摧毁”状态的战略核力量是一个由（1）有人驾驶的轰炸机、（2）地面发射的导弹和（3）潜艇发射的导弹共同组成的“三合一”武器系统，其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作为不依赖于其他两部分，自成一支可靠的“第二次打击”力量而设计的。战略武器部署上的这种“多余重复”，

是为了提供一个保险因素，以防苏联今后的技术进步可能危及美国一个或两个报复系统的有效性。

其实，虽然没有一个科学家或了解情况的一般公民会否认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工艺都将继续发展，但大家从不怀疑至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美国的导弹潜艇舰队是能够在苏联发动的第一次打击下保全下来的，从而也就能够作为一支报复力量给予俄国腹地以无法忍受的损失。国防部的某些官员争辩说，如果苏联花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作全力以赴的科学研究，也许会在十年左右发展出一种先进的反潜艇战系统，给美国的导弹潜艇带来某种威胁。可是谁也不会认为，这样一个系统竟有可能同时侦察出所有四十一艘北极星潜艇的确切位置并悉数予以歼灭。而正如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小赫伯特·斯科维尔博士所指出的，“即使美国全境已遭摧毁，但只要剩下一艘导弹潜艇，就能够向苏联各工业中心发射一百六十枚核弹头，这是俄国人所经受不起的。”因此，如果美国建立战略武器库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确保摧毁”，那末只要有一支导弹潜艇舰队就可以提供充分的威慑力量而绰绰有余了，其他核武器系统的部署一定是另有其他考虑。

军事战略家和外交政策分析家很久以来就已认识到，拥有核武器，除了有其纯粹军事上的作用外，在外交和政治方面也会带来某些好处。在他们看来，在国际关系上，一个拥有“较多”战略武器的超级大国总是要比拥有“较少”战略武器的对方操有更大的主动权，不论这种“较多”实际上对威慑力量多么不相干。例如，很多人都把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莫斯科的“退却”归功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总的优势。

二次大战以来的大部分时期中，不论用哪种标准来衡量，美国都一直是拥有“较多”武器的一方——它有着更多的轰炸机，

更多的导弹，更多的核弹头。这一事实很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能有这么大的信心，敢于在海外承担这么多的防务义务（美国目下已向七十五个以上的外国承担义务，答应在发生战争时至少给予某种程度的帮助），并把美国的武装部队投入国外的战斗任务。可是到了一九六八年，美国的核优势开始消失，结果它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也就成了问题，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是第一次。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在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的整个时期中，俄国倾入了大量资金来扩大它的战略导弹库。苏联的步伐是很令人瞩目的：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美国本来保持着近乎四比一的优势；一九六七年时，这一优势缩小为二比一；而到了一九六九年，优势已下降为均势，当时双方各有约一千零五十个发射装置；一九七〇年以来，苏联在洲际导弹发射装置的数目上（虽然不是弹头数目上），已明显地占了优势；而且（美国）国防部的分析家们相信，要不是这一扩军势头由于第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被制止的话，到一九七五年时苏联在这方面的数量领先将会达到二对一的比例。

苏联的扩充导弹，虽然从来没有危及美国的威慑力量，但确乎威胁到了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支配地位，因而被认为是对美国总的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

战略优势的这些政治含义，在国务卿基辛格看来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从不讳言，美国之愿意同苏联谈判一个“稳定的和平结构”，是以美国在战略武器上继续保持优势为前提条件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下决心要提高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地位，以便能利用这样造成的核优势所带来的主动权。这一决心具体体现为两大行动：（1）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作为这一阶段谈判之顶点达成了一九七二年的限制战略

武器协定；(2)发展新的进攻性战略武器，以求取得一支“打击对方武力”的力量。

当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签字时，尼克松总统把它吹嘘成为“人类不必再长此生活在核战争阴影下的具体证据”。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协定中所订的内容与其说是基于什么裁军与和平的愿望，还不如说是决定于美国所追求的外交和军事目标的需要。

虽然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某些批评者（特别是华盛顿州参议员杰克逊）认为临时协定允许苏联拥有较多的导弹发射装置，就是让苏联占得了“优势”，但是，大多数军事分析家都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即第一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改善了美国的战略地位，因为它制止苏联导弹力量的增长，而对美国的一些关键性的武器现代化计划，如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和三叉戟导弹潜艇等都未加限制。这一估价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托马斯·穆勒的证实，他在一九七三年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显然是我们为减慢苏联战略扩军势头而作出的努力中的一个重大步骤”。穆勒承认，苏联在发射装置的数目和导弹的“投掷重量”（即装载弹头的载重量）方面占有优势，但他接着说：“在总的战略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其他重要方面，例如在导弹的准确性方面，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方面，在潜艇的灭音性能方面，在侦测潜艇的‘声纳’技术方面，以及在轰炸机的数目和载重量方面等，美国都仍然有着很大的优势。”苏联最近试验多弹头导弹，也不会立即影响到上面这一估计的正确性；照施莱辛格的说法，莫斯科不大可能在一九八〇年之前把一支可以用于实战的多弹头导弹力量部署就绪。

“打击对方武力”的这一新防务理论，是从下面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均势状态只给人以虚假的安全，因

为，侵略的一方可能正是鉴于全面核大战“不堪设想”的这一特点，认为有隙可乘而发动一次有限的核攻势，它可能觉得，如果只使用它武器库的一小部分，只打击军事目标，那未受害的对方由于怕全面规模的“第二次打击”毁灭其城市，是不会实行报复的。施莱辛格认为，要防止这样的有限袭击，我们自己就必须拥有一支能够发动这种袭击的力量。一月十日他对海外作家协会讲话时说：“为了谋求力量的均衡，我们不能让苏联单方面取得一种‘打击对方武力’的选择而我们自己却没有。我们必须使双方在战略力量上保持对称的平衡。”

施莱辛格在后来的几次讲话中说明，这一新战略将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个阶段已经在进行了——某些美国的洲际导弹正在作“重新瞄准”，从原来的民事目标移向苏联的导弹发射场和其他战略系统。第二个阶段预定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几年内实施，那时美国将部署新型的战略武器，专门设计来打击诸如地下导弹发射井、地下指挥中心等“加硬了的”军事目标。

在施莱辛格心目中，一支针对“硬目标”的打击力量可以用下列三个基本办法来实现：第一，改进导弹的准确性，务使其能保证直接命中（这样就能摧毁发射装置，不论其保护工事多么坚固）；第二，提高导弹的爆炸威力，使其在准确程度即使较低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摧毁；第三，增加飞向目标的弹头数，务使能压倒对方的导弹防御设施。现在看来，在所有这三个方面，美国都是在孜孜以求。据各种军事杂志透露，五角大楼将采取下列步骤中的全部或大部来建成一支“打击对方武力”的力量：

(1) 民兵式洲际导弹将装上新的核弹头，其爆炸威力要比现有的弹头大得多。

(2) 某些洲际导弹将配备以一种“可操纵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种运载工具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后能够改变航向，以避

开敌方的“反导弹”导弹并增进命中准确性。

(3) 所有的民兵式和三叉戟式导弹都将装上“星体惯性导航系统”和其他改进设施,使其达到所需要的准确程度。(潜在水面下的潜艇是无法完全有把握地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因此不可能使用现有的这种导弹来达到“打击对方武力”的目的;但如果弹头装上了“星体惯性导航系统”,就能够在飞出地球大气层后利用星体进行“定向”以校正它的弹道。)

(4) 已经开始研制一种可以由普通潜水艇或巨型飞机发射的、装有核弹头的“飞航式导弹”,这种导弹事实上是一种无人驾驶的喷气飞机,能够以极低的弹道飞行一千到一千五百英里,因为弹道低,在标准型的反导弹雷达上简直是看不见的。

(5) 空军将研究发展一些可动式洲际导弹,这些导弹将能够时常移动,使敌方侦察卫星无法确定其位置。

(6) 海军将开始研制一种小型快速潜艇,这种潜艇用低噪音的“独角鲸”式反应堆作为动力,将装载三叉戟式导弹,不过装载的数量要比体型较大的三叉戟潜艇少一些。

政府的一些官员坚持说这些计划大都还在构想阶段,一旦美国和苏联能够在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达成一项新的武器协定,这些计划就可以完全作废;可是,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会谈不能达成协议,这些计划就能够加速进行。

苏联的防务计划制定者们必然也和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是要为“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的。因此,美国新战略计划的宣布,肯定将促使苏联也扩充它自己的战略力量。这样,反过来也就“证明”计划中的美国扩军是有道理的了。所有这一切,几乎就注定了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以失败告终,其结果无疑地是又一轮严重耗费而又危险的核军备竞赛。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美国《民族》周刊 蒋士驹译)

如果战云在欧洲上空浮动的话

〔日〕小山内宏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日本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书（该书即将全文译出，内部发行）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作者根据有关军事方面的资料，分析了苏美两霸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争霸战略，设想了欧洲如果爆发核战争的情景，有一定参考价值。作者在文中渲染核战争恐怖，对苏修在欧洲的勃勃野心缺乏分析，都不足取。

一、苏联极度警惕

剑与盾的北约军

“……战后，世界上的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英、法及西德帝国主义者，公然缔结了准备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犯罪性条约。……”

“……在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军事理论家们编造了一套构成制订战争计划的基础并包括了各种可能性的战略观念。

“……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公然采用所谓‘剑与盾’的战略。按照这个战略，美国的战略空军和核武器是‘剑’，

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西欧各国的战术空军和地面部队则起‘盾’的作用。

“从军事方面的大量事例来判断，帝国主义集团的军事首脑们正在研究和制订统一的战略，甚至可能想要制订一种对社会主义各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统一的战略计划。

“……报上发表了有关西德军队的‘DEKO-II’军事计划的部分情报，其中包含着要对东德、捷克、波兰以及匈牙利进行闪电式进攻的计划。用陆军的一个集团军从南面进攻东德，以便将它和捷克及波兰分开来，在数天内取下东德。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是北约组织于一九五九年举行的名叫‘通道’的演习中制订的。将陆军的另一个集团军插入捷克和奥地利之间，把捷克和波兰分割开来以包围捷克攻入匈牙利。西德的海军从北面发动进攻。以上是西德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们的一项极其危险的计划。……”（索科洛夫斯基著《苏联的军事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恨

苏联保持着戒备。

这位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一八九七年生，曾历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联陆海军总参谋长等职）及其幕僚们的见解，表明了苏联是害怕“西方的突然袭击”的。

因此，苏联把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放在本国及东欧，即西线的防御上，以对付西方的军事力量。

作为西方军事力量的北约军到底是不是正在策划进攻苏联呢？

但是，总之苏联人是害怕战争的。

这是因为，德国以及苏联国内是第二次大战的主要战场，它们在物质方面的损失和人员方面的牺牲之大，是西欧其他国家

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对战争的警惕性和恐惧感之大也是其他国家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因此，即使会使人民的生活多少受到一些损失，苏联也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努力使其成为一种“抑制”战争的力量。为了要防患于未然，甚至进而提出要进行一场“预防性战争”的战略。

有人认为，正是这种进行预防性战争的战略招来了匈牙利事件，导致了对捷克的进攻。但是，且不说我们第三者的看法如何，由于苏联人有如上所述的那种警惕心，他们自己认为，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一场如进攻捷克那种短时期的预防性战争类型的仗是可以的。

不能置之不顾的捷克事件

假设捷克落入西方的手中。



设想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自由主义阵营时的形势图

对于苏联的军事当局来说，不会有比这更大的“威胁”了。这就象在苏联的西方防线的正中插入了一把利剑一样，不仅会使漫长而又规模巨大的防线在这里被拦腰切断，而且将会使形如利剑的捷克国土以其锐利的剑锋直逼苏联本土。

可以设想，从苏联来讲，那是无法坐视这种危险的情况产生的。况且捷克的杜布切克政权提出要实行自由化和独立自主路线，并正在加快向西方靠拢的步伐。这是苏联的“警惕心”所不能允许的。

和东欧的军队（华沙条约的军队）一起侵入捷克的苏联军队，后来还留驻在捷克，布防在西德边境，以巩固西边的防线。这样一来，苏联在捷克以及东德、波兰、匈牙利等国共部署了大约三十个师（约五十万人）的兵力，以防备来自西方的进攻。

在一九六六年又进行了代号为“十月的风暴”和“第聂伯河”的两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检阅使用柔软反应战略时军事力量的充实情况。这种战略是从美国军队那里学来的。特别是“十月的风暴”演习，重点放在常规武器的战斗，并在这之后使用核武器。这一演习的目标在于摸索如何保卫捷克和西德边境的办法。这次大规模的演习证实了这样一点：如能在捷克边境坚守七十二小时，就可以动员大军和核武器以粉碎西方的任何进攻。

二、北约军对苏军的战略

为了全歼苏军

一九六九年一月，美国在捷克、西德边境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这是一次代号为“利福尔伽 1 号”的演习，其内容是：从美国本土将一万五千人的大军紧急空运到西德，用在当地美军基地早已准备好的坦克、装甲车、自动炮以及军用车辆，立即组成一支装甲师部队，迅速开往西德边境，以迎击从捷克侵入的苏联军队。

正如苏联方面害怕来自西方的进攻一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各国也都警惕其对手“苏联对西欧的进攻”，并正在准备对付这种进攻的战略和军事力量。

本来，美国的世界战略是以欧洲为重点的，对苏战略是其主要着眼点。

一九五四年，北约军举行了一次核战争演习。这是一次以美军动用核武器而告结束的演习，在五天的战斗里，美军用了九枚原子弹，消灭了苏联军队。

在第二年（一九五五年）六月，又举行了一次名叫“白纸”的军事演习，有北约组织的十一个国家参加。这是一次设想在五天内使用三百三十五枚原子弹的演习。

另外，从同年秋天到年末，美军又举行了其内容为假设苏军侵入西德而加以包围、歼灭的军事演习。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里，除了核武器之外，还使用了具有剧毒的化学武器及各种细菌武器，在地面部队方面，动用了共有十四万人组成的拥有最新装备的装甲部队。据说，通过这次演习知道，要全歼苏联的大部队需要由空军投掷二百十六枚原子弹，由陆军用原子炮发射五十九枚原子炮弹。

以挑衅诱发战争

博任上校及温希坦少校等人于一九五五年发表过一份关于北约军的对苏战略的材料。其内容如下：

(1) 通过计谋使苏联方面开第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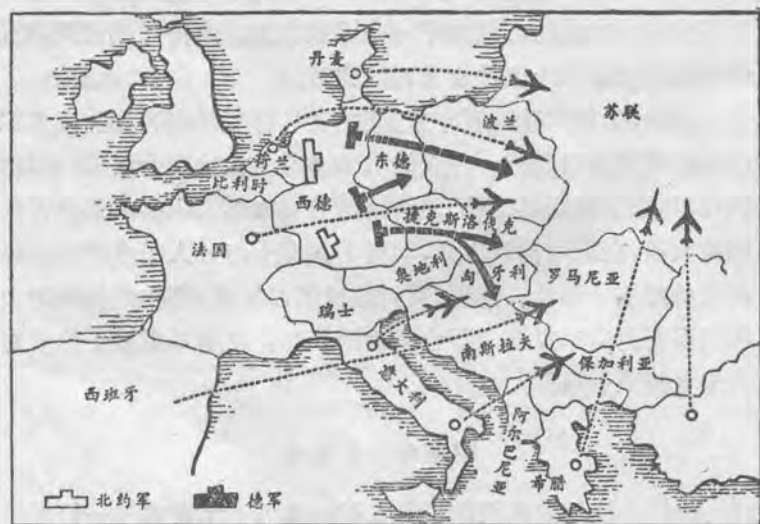
(2) 以四个装甲师为主力的十五万西德军队，用反击的形式攻入东欧，解放东欧各国。

(3) 用一万五千门重炮及反坦克炮在东欧构筑前进阵地，以阻止苏军对西线的反击。

(4) 将北约组织的军队作为后备队部署在西德军队的后面。

(5) 将美军的六个师部署在北约军的后面，并配备三十六门二八〇毫米原子炮、“诚实约翰”式战术核导弹以及“斗牛士”式电子导航有翼导弹。这支军队摆开阵势，准备一举歼灭为进行反击而蜂拥而来的大批苏联军队。

(6) 另外，让能载核弹的飞机进入待机状态，如果苏联军队来袭，就从空中进行核攻击加以歼灭。



北约军的对苏作战展开图

美国及北约组织在对战略进行研究之后，不得不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常规战争的情况下，要阻止强大的苏联军队对欧洲的进攻是极其困难的。

北约军司令部花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分析了欧洲的对苏战争军事演习的材料，并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北约军总司令格兰桑及美国的三军联合参谋总部根据这份研究报告，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战况进行了设想，并提出了一项新的战略。其内容如下：

(1) 修改一九五三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市举行的北约组织作战理事会上通过的计划，立即出动九千架战术用核歼击机。而原来的计划规定在开战后九十天内动员一百个师的地面部队以及空军的一万一千架飞机。

(2) 这是因为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开战后短时间里所用核武器的数量将决定战争的形势。

(3) 但是，由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会想避免打一场全面核战争，因此它将成为一场常规武器和战术核武器同时使用的有限核战争。

根据上述战略，美国在一九五五年以后全力以赴地研制战术用的中小型核武器，并极力使其能用于实战；同时改编原有的陆军师使其更小型化、更机动化以适应核战争的需要；提高战术空军对局部地区进行核攻击的作战能力等等，从而大大加强了对付欧洲战争所需的新的军事力量。

洛雷黎的岩壁^①也将被炸得粉碎

在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由于“柔软反应战术”的采用，美国陆

^① 位于德国来因河的右岸，原文的意思是“妖精岩”。

军从根本上改组了师的编制，以便同时能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但是在欧洲的战略，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用战术核武器打击并歼灭如潮水般涌进西欧的苏联军队。这种战略将使战争变得更为复杂。

例如，甚至已经制订了这样的作战计划：当苏军越过西德边境侵入的时候，首先用布设在边境线上的核地雷给以打击，然后用空军和炮兵对突破地雷区而继续进击的苏军进行战术核打击，以挫伤其兵力；当苏军迫近来因河时，就炸掉来因河和美因河上的桥梁及水库堤坝，用洪水来阻挡苏军的进击。据说，美因河上的五处桥梁，巴伐利亚的四十处地方，以及多瑙河、来因河上的重要桥梁等已经列入了爆破的计划，连有名的洛雷黎的岩壁也要被炸得粉碎。

然后包围受到阻挡而不能前进的苏军，同时使用核导弹和化学武器给它最后的致命的一击。以上就是北约组织方面制订的一份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给了苏军重大打击之后就转入反攻。这是用装甲师和直升飞机空运师进行的快速机动作战。反攻的第一天就攻占柏林，第二天拿下奥得河口的什切青，第三天攻克波兰华沙，从而控制东欧。接着进军苏联本土进行决战，在二、三星期内击溃苏军以结束战争。

三、把整个欧洲作为战场的 绝密的作战计划

绝密的作战计划“10-1”

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无论进攻或防御，北约军的对苏战

略实际上都有难于实行之处。

这是因为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已经强大到接近美国的水平，万一在欧洲，那怕是以有限的形式使用核武器而使苏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的话，那末，苏联为了报复将会动用战略核武器，这样就无法保证不使战争升级为全面核战争。

因此，很明显的是，虽然在最坏的情况之下，即在必须保卫西欧的紧急关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核武器，但是已经准备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根据这份计划，将在尽可能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歼灭苏联军队。

美国国防部和在西德海德贝格的美军司令部表面上都否认有这个计划，但这是一份由德国特种部队的一位少将发表的作战计划，它的代号是“10-1”。它是“支援欧洲作战机动部队司令部”（COMSOTFE）制订的绝密的作战计划。这可以说是一项适应新的时代的特殊战略。

下面，讲一下作战计划“10-1”的主要内容。

首先，这个计划规定：

(1) 设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情况如下：通过一场有限战争或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东欧及苏联的军队在短时间内控制和占领了欧洲中部或西部的一部分领土，战争由此开始，美国立即进入反击战的体制。

(2) 于是，美军和北约军在一起开始一场常规战争形式的反击战。为了支援这一反击战，同时就开展了“非正规战争”。这种“非正规战争”（U.W.）乃是“10-1”作战计划的核心。“非正规战争”是一场在各地居民协助下进行的游击战争，它首先是以特殊的游击战争的形式开始的。

(3) 为此，要派美军的特种部队潜入苏军的占领地区，

进行爆破重要设施、鼓动并拉拢居民、策划居民的叛乱等活动。同时，煽动敌人的散兵游勇“怠战，脱逃”并把他们拉到自己的游击战方面来。

(4) 担任此项作战任务的特种部队，是一支在美国军官指挥下的、由原苏联、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人员组成的部队。由于它是由即使潜入苏军内部也很不容易被发觉的人员组成的，因此这支部队在苏联占领区能展开充分的活动。

(5) 为了进行反击战，特种部队将在整个欧洲的二十三个国家里建立一百零一处据点。这就是：在东欧境内，计有东德六处，波兰八处，捷克斯洛伐克六处，匈牙利两处，罗马尼亚六处，阿尔巴尼亚两处，保加利亚三处，苏联二十处等；在西欧境内，计有挪威四处，法国九处，意大利五处，希腊两处，土耳其三处，西德四处，卢森堡一处，荷兰一处，比利时一处，丹麦一处等。这样，这场反击战将在敌我双方占领的地区内同样展开。此外，这种据点还计划在南斯拉夫建立三处，芬兰三处，奥地利四处，瑞典五处，瑞士两处等。这是一种强硬的战略，也就是说，要是作战上有需要，连中立国家也要利用的。

上述“10-1”作战计划根据情况的紧急程度，把各据点分成两组：

第一组是必须立即开始作战行动的地方；

第二组则是此后依次进入战斗的据点。

同时，在作为苏军主要进攻目标的西德境内，属于第一组的据点设有四处之多。

核武器和生物化学武器同时使用

特种部队用“非正规战争”形式从后方和内部进攻苏军，歼灭苏军的有生力量，使战争走向美军可以不必动用核武器的局面。按照计划，在六个月内，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游击队将从第一个月的一万四千人增长到第六个月的十四万二千五百人，这就会使苏军处处遇到麻烦。

这里暴露了“10-1”秘密作战计划的一项内容。

原来，这些在“10-1”“非正规战争”中作战的游击队将使用一种特殊的武器。这是一种特殊的“核武器”。比起“原子弹”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爆炸力很低的特殊的核炸药，它用定时装置等起爆，等它爆炸的时候，游击队早已转移到安全地区了。除了这种特殊的核武器外，还将使用各种炸药，这将使苏军日夜为游击队的破坏活动所困扰。

另外，在“非正规战争”中还准备使用可怕的“生物化学武器”。

使用这种武器会使苏军产生原因不明的伤亡，同时也会把农作物枯死以使苏军无法利用。虽然用这类生物化学武器确实可以给苏军以很大的打击，但是，不管是核炸药也好，这种生物化学武器也好，都不能不给当地居民带来灾害。总之，在进行对苏战争的时候，欧洲的居民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火中去，从而遭受极大的牺牲。而且在诸如“10-1”作战计划所规定的那种特殊战争中，估计苏军将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处决一般的市民和农民以进行报复，因而可以预料，这将成为一场很悲惨的战争。

况且，这个“10-1”计划还规定，如果用“非正规战争”不能给苏军以打击的话，可以根据在欧洲的美军司令部的决断，使用正

规的“核武器”。

这样，整个欧洲将变成“有限核战争”的战场，战术核武器将会在这里爆炸。而一场特殊的游击战争也将同时展开，欧洲的这个土地会在转瞬之间变成一片废墟。

根据前述在欧洲举行的核战争演习情况也可以推定，仅在西德领土上就会用大约三百枚战术核武器。这虽说是一场有限核战争，而其造成的伤亡将会是相当大的。（引自平凡社出版的《核战略和军事科学》一书，据林克也氏的计算）

西德的面积为二十四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五千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约为二百人，假设所用的战术核武器的平均威力是四万至五万吨级（比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大一倍多），以此计算，则估计将死亡六百万人，加上重



两个阵营的军事力量对比

伤的人在内,死伤将超过一千万人。

另外,三百枚核弹的污染地区虽是三万平方公里,而其放射能的污染在一个月里将扩大到一百万平方公里,这就相当于西德、荷兰、丹麦、法国面积的总和,为此,在几个月内将有一亿五千万人(约占欧洲人口的一半)成为原子病患者,从而使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大。

预料:如果欧洲爆发战争,其前景将如上述。

(摘译自〔日〕小山内宏著:《第三次世界大战》 上
海外国语学院日阿语系日语翻译组译)

苏修掀起军国主义教育的狂热

编者按：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在国内加紧镇压苏联劳动人民，在国外加紧进行侵略和扩张，打起所谓“保卫祖国”和“军事爱国主义”的旗号，不断地在全国掀起军国主义教育的狂热，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法西斯的大军营。

勃列日涅夫之流同当年的德、意、日法西斯一样，不但对军队进行强迫的军国主义教育，更把军国主义教育列为毒化苏联青少年的“基本课程”。苏修《普及兵役法令》明文规定：苏联青年学生的初等军事训练从九年级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不及格的学生，法令规定不发给毕业证书。除了这种军事基本课程外，苏修当局还规定学校里的任何一门课，都必须同军国主义教育结合。甚至在一些专业技术学校里，也规定必须建造打靶场，强迫学生学会使用各种冲锋枪等武器。这种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教育，只有在当年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中才能看到。无怪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报纸也叹息即使象大搞扩军备战的美帝国主义，也远远不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紧毒化苏联人民和青少年，还下令所有的宣传工具(报刊、电台、电视、电影和出版物等等)进行所谓“直观宣传”，妄图用老沙皇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俄帝国的所谓“光荣业迹”，不断煽动军

国主义的狂热。

下面三篇摘自苏联书刊的译文透露了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青少年中掀起军国主义教育狂热的一些情况，很值得人们警惕。列宁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工业衰退，农业下降，通货膨胀，商品奇缺，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了加强镇压苏联人民，为了从对外侵略和扩张中摆脱困境，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但是，这是一条死路。它救不了苏修叛徒集团必然覆灭的命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正在向他们招手。

青年大学生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苏〕A·И·丘菲亚金

由于军事事业的革命、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任务，对青年人的普通教育、技术和军事训练以及道德政治和体育锻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思想上、心理上和体质上都经过锻炼并在军事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能在战斗环境复杂的条件下，表现出自己的意志和完成他所面临的任务。

高等学校培养预备役军官、未来的分队指挥员、普通战士和军士的教育者、苏联武装力量中共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由于通过了新的《普及兵役法令》，高等学校对苏联青年的军事爱国

主义教育就成为特别迫切的任务。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届第三次会议通过的这个法令，在高校受过训练的预备役军官，可能在和平时期被征入军队服现役二至三年。从这一点出发，他们不仅应当准备在战时到军队服役，而且也应当准备在和平时期到军队服役。

大学生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任务

宣传列宁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原理，解释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关于提高警惕性和加强国家国防能力的措施，是对青年大学生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任务。

苏联人的爱国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同忠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友爱团结的思想以及同对祖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的无比仇恨是不可分割的。

军事爱国主义的形式和方法

通过教师生动的语言所实现的对学生的直接影响的形式，是最有效的形式。这些形式有讲演、谈话、讲故事、做报告、发言、号召、辩论会、个别谈话。

同时，不能轻视通过报纸、电影、电视、文学、戏剧、音乐、造型艺术、博物馆、直观宣传工具等进行间接影响的作用。

在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中也运用着共产主义教育中所公认的方法，但也考虑到这种教育的特殊性，它的目的和任务。这些方法是：说服、教师的个人榜样、练习、表扬和强制手段。

强制手段在教育那些责任感较差的年轻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方面

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教育，是在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的主要环节。这种教育从高校大学生进校的第一天到在校的最后一天以及在一切课上都要进行。

社会经济与人文科学各教研室在课业进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的可能性，比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各教研室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各教研室通过学科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例如，在讲授现代技术课堂上，教师可向大学生讲述苏联科学的空前的突飞猛进，讲述其成就的社会原因和结果。在课上一定要强调关于专家和工程师对我国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所承担的公民责任的思想。

在各课上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方法可能是不同的。以列宁格勒苏维埃命名的工学院的一个教研室的教师们的经验是有意义的。列宁格勒的报纸《接班人》关于这点在一九七一年举了这样的例子：在讲解乙炔及其衍生物（法沃尔斯基院士广泛研究的化合物）的课堂上，教师顺便讲到，法沃尔斯基的男低音很好，青年时期别人曾邀请他到轻歌剧团做演员，这是一种诱人的邀请。当时轻歌剧团很需要法沃尔斯基，但是他没有去。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对发展祖国的化学有着巨大的意义，所以他就研究乙炔及其衍生物，并对它献出了全部精力。

这样的“插话”占时间不多，但是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高校公民国防课的教学大纲中规定，基本上结合高校的专业（专业化）学习防御大量杀伤武器的方法。但是，也有一系列

共同的题目,这些题目不仅应该用来学习本专业,而且也应该用来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国内的许多高校里都有军事教研室。军事训练课的第一天是从导论课开始,这一讲的目的是对大学生进行学习军训课的入门教学。在这一讲中阐述苏联宪法中关于公民保卫祖国的光荣义务的基本规定,揭示军官在武装力量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通过了新的《普及兵役法令》,在导论课中必须向大学生阐述这一法令的基本条令,首先是阐述关于征召预备役军官在和平时服现役的条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大学生教学和教育的新要求。

苏联武装力量党的政治工作课在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指挥员与教员们必需的品质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门课主要研究对军人进行政治与军事教育的基本问题。

战争和军事艺术史课在高校各学科的总体中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

由于战术训练是与战斗的组织和进行直接相联系的,所以在战术训练中,一方面能广泛地利用苏联武装力量的过去与现在的英雄事例,对大学生进行军事爱国主义的教育;另一方面能在所进行的课业上广泛地利用各种战斗环境的具体条件。

专业的军事技术训练课为培养大学生对自己的军事专业的热爱和崇敬,对自己的军种与构成其武器的军事技术的热爱和崇敬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高校工作的经验表明,几乎每一堂课都能用来进行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报刊是对青年进行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的久经检验的有效工具。

运用直观宣传工具能够有效地宣传俄罗斯与苏联军队过去的英雄事迹。

布置关于华沙条约组织参加国的陈列台，陈列关于各兄弟国家军队的联合演习，关于同盟国的武装力量的政治机构的协同行动的材料。

《帝国主义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的》陈列台的大量资料说明了武装侵略者在苏联国土上所犯下的血腥罪行，与在和平建设年代帝国主义者的破坏活动；也说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满洲应声虫如何侵犯中东铁路；……还说明了美帝国主义在一九六八年于捷克境内的破坏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大多数高校中，都大量放映有关军事爱国主义内容的纪录片与艺术片。近来列宁格勒大学给大学生放映了《胜利者》、《英雄的五十年》、《我们是这样服役的》、《中尉，祝你一路顺风！》、《列宁格勒的功勋》、《英雄们永垂不朽》、《难忘的九百天》、《莫斯科属于我们》、《伟大的伏尔加战役》、《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父辈的路》、《向祖国宣誓》等等影片。

(摘译自苏联 A·И·丘菲亚金著一九七三年出版的《青年大学生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一书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

改进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苏联《国民教育》编辑部

对青年学生实施初等军事训练已有六年了。自一九七

二——一九七三学年开始，全部普通中学一律实施初等军事训练。教师集体中新增了一支军事指导员队伍。受过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的预备役军官，在生活、战斗和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员，成为学校军事指导员的基本群众。

上学年，学校和国民教育机关在青年一代初等军事训练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取得了丰富而有益的新经验。

在这次视察的第二阶段进程中，青少年爱国者进行约三千次军事演习，七千多次沿着苏联人民取得战斗和劳动荣誉的地方行军；重新开放了八百多个陈列馆和战斗荣誉室，建立了数千个国防小组，二百多个射击靶场，培训了一万二千名获得准备卫国证章的人；十万名学生达到了新的劳卫制标准。

这一巨大工作在全苏视察总结的决议中得到了应有的评价；数百所学校获得了荣誉奖状。

对青年一代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不允许死板公式，陈规旧套和形式主义。这是一件有生气的创造性工作。

例如，列宁格勒第一五九中学课外和校外教育工作的组织者米哈伊洛夫指出，许多有益的事已成为传统。

这里，通常在胜利日前夕所进行的沿着具有战斗荣誉的地方行军已定为制度。

在米哈伊洛夫看来，高年级学生学习驾驶汽车，对训练青年人执行战斗勤务，起着不小的作用。

托卡连科介绍了卡尔贝舍夫青少年爱国者学校的工作经验，这所学校是由卡麦申市教育局与市共青团联合倡议设立的。该校学生是由卡麦申市数十所中学里的学生中抽调来的。在抽调时，遵照候选人自愿参加和中学校长与共青团委同意的原则。大体上这些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是优秀的，并愿意终生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役。为期二年约三百课时的教育计划包括政治、列

队和体育等方面的训练，以及军事地形测绘并学习防御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方法。

第一学年末进行初等军事训练基础的升级考查，以及军事上各种实用的体育项目标准考试。第二学年末举行毕业考试，对考试及格者隆重地授以证明书。该校三届毕业生中有六十三名后来成为军事学校的学员，立志以军官为职业。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第十二期苏联《国民教育》杂志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

建立初等军事训练用的标准基地

乌克兰黑色冶金工业部干部和
学校管理局初等军事训练视察员、
退伍少将格·阿·卡斯特罗明

只有具备良好的教学物质基地，首先是露天的实践教学基地，才能够正确地组织初等军事训练的的教学和教育过程，并在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经验证明，室外军训能够提高年轻人的兴趣，室外军训的效果正在明显地提高。

我们黑色冶金工业部所属的各类技校，普遍地建立了初等军事训练基地——障碍区、射击场、小口径步枪靶场、瞄准和准备射击的教学场地、掷手榴弹的场地，以及学习和研究连队哨兵与值日兵职责的场所(还有军事教学专室，国防与军事技术训练的教室)。

一九七一与一九七二学年乌克兰黑色冶金工业部颁布的观摩竞赛条令是发展初等军事训练教学物质基地的有力的促进因素。

阿尔条莫夫斯克技校、荣获红旗劳动勋章的聂德伯罗特罗夫斯克技校、日丹诺夫工业技校、克列明楚格矿业技校、克里沃罗格矿业技校、矿业电机技校和矿业自动装置技校、马尔干涅茨矿业技校都建立了初等军事训练所必需的全套设备。

这些技校特别注意学员的射击训练。冶金工业部制定并批准了建造十八个射击场的三年规划。

制定实用军事多项竞赛条例是为了培养学生掌握各种熟练技巧和战斗技能。条例包括初等军事训练大纲规定的各种方法和动作。

部属所有技校举行了各种竞赛。竞赛过程中，学生在障碍区完成越过障碍的各种练习时，表现出了意志、勇敢、灵巧和速度。他们越过“沟壑”，跳过三米宽的壕沟，掷手榴弹并在沟壑里打击“敌人”。

越过障碍区时，先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拆、装冲锋枪，最后，竞赛者穿戴各种特别的防护用具。

各个技校的军事教学专室里装置电动化的地形模型是非常有用的。这种模型能够非常引人入胜地处理战术、射击训练和地形测绘方面的“军事战略”。

教学中广泛采用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各种电影。目前，部属技校有十六部初等军事训练题材的教学影片。《战斗中战士的动作》、《射击训练》、《哨兵的职责》、《越过障碍区》等影片特别普及。

一九七二年七月召开的全苏初等军事训练会议指出，建立必要的教学物质基地，并合理地运用这些基地能够帮助技校在

初等军事训练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第二期苏联《中等专业教育》

杂志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

书 刊 介 绍

《鲍尔斯回忆录》

本书是美国前副国务卿、驻印度大使鲍尔斯所写的回忆录《恪守诺言：我任公职的年代(1941—1969年)》一书的节译，叙述了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期间美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决策过程，谈到美国的侵越战争、中美关系、美印关系、印巴关系、美苏争霸，以及美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本书已于1974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奇袭珍珠港

〔法〕雷蒙·卡歇尔①

编者按：这则短文形象地记录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经过。日本发动突然袭击，美军犹在梦中。这个事件，至今仍引人注目。

这次航海是极其艰难的。倾泻在甲板上的巨浪把水兵卷到海里去了。这是严寒与浓雾中的北方航路。太平洋上全无船踪。只有一次遇见一艘小轮船，它是日本的船只。

航空母舰分成两路纵队前进。它们以巡洋舰阿武隈、旧式战列舰比睿和雾岛为先导，两艘驱逐舰在它们左边，三艘潜水艇在它们右边。在外侧两翼的是一等巡洋舰利根和筑摩。在前面，七艘驱逐舰排成横列队形；八艘油船跟在后头。为了节约燃料的消耗，还由于有油船的缘故，舰队的速度是很慢的。

六艘航空母舰中，赤城和加贺是用战列舰改造成的。飞龙和苍龙为一万七千吨，翔鹤和瑞鹤有两万六千吨，后两艘是最先进的航空母舰。飞机有战斗机、水平轰炸机、俯冲轰炸机、鱼雷飞机，共计四百二十三架。这是曾经跨海进击的空军当中一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航空兵部队。

① 作者是法国的新闻记者。

先于航空母舰，已有一支拥有二十七艘大型潜水艇的部队开往夏威夷附近。其中五艘是可以装载、放出全长十五米的特种袖珍潜水艇。后者可以发射两枚小型鱼雷和乘坐两名水兵，目的是钻过港口的防潜网到达抛锚处。为了获得乘上这种自杀潜水艇的荣誉，年轻的士官们进行了一番竞争。

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特混舰队，十一月二十六日离开了千岛群岛的集结地点。与此同时，日美谈判在华盛顿继续进行。科德尔·赫尔提出了日本似乎无法接受的条件，但是谈判没有破裂，美国把这看做是好迹象。那些条件是：自中国、印度支那撤军，取消三国同盟，承认蒋介石政府等等。美国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日本对菲律宾方面的战争准备。然而，没想到和解的希望已经完全消失了。

给南云中将的命令中，包含了批准他可于横渡太平洋时下令攻击这一条。而且还规定：如在“Y日”^①两天以前被敌人发现，马上返航；如在“Y日”和“Y日”前两天之间被发现，则由他自己决定如何处理。可是，南云中将却充满着严重的悲观情绪，每天晚上在赤城舰的司令室里踱来踱去。

十二月一日。舰队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到了等待已久的批准电报：“攀登新高山”。这意味着日本决心对美作战、正式决定攻击珍珠港。同时它也意味着日本开动了整个战争机器。

意图占领香港的日本军队正逼近香港。进攻新加坡的部队也开始乘船。然而，只有这一支南云中将的部队没有陆军的士兵。

十二月二日，南云向全体官兵说明了除对军事飞行员之外都未讲过的此番航海的目的。整个舰队沉浸在欣喜若狂的兴奋

① 预定攻击日。

中。

可是，舰队的日常工作照常进行。只有飞行员借下围棋或象棋来打发时间，或者是写留给后代的语气紧张的遗书。

源田实中佐和第一批突击队指挥官渊田美津雄中佐收到两份由檀香山拍来的间谍情报：一个是好消息，说是珍珠港还不曾设置气球阻塞网和防潜网；一个是坏消息，说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列克星顿号、萨拉托加号都不在珍珠港。渊田中佐对于这些最重要的目标不在当地感到失望，考虑过停止进攻。不过，深谋远虑的南云司令，却认为在珍珠港的八艘战列舰是敌方海军的主要战斗力量。航行仍然继续下去。

夏威夷时间是七日早晨，舰队到达攻击位置。它位于北纬二十六度、西经一百五十八度，即瓦胡岛以北两百八十公里的地方。早晨六时，第一批飞机飞离母舰——天色仍然昏暗，军舰剧烈地前后颠簸。但这些动作却以在练习时不曾见过的短时间进行完毕。空勤人员洗过澡，换了内衣，在飞行帽上系了武士的领结——一条布带，向飞行甲板上的神坛作了祷告。

编队将机头朝向目标的那一瞬间，太阳升起来了。赤城的桅杆上飘扬着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东乡元帅在对马海峡攻击俄国舰队时挂过的Z旗。

这是夏威夷群岛的中心——瓦胡岛……瓦伊纳埃和库劳两座山脉之间是一个草木葱茏的山谷，其中有檀香山和怀基基海滩。离檀香山十五公里的珍珠港，很象布勒斯特^①。一进入宽三百五十米的狭窄的港湾，可以望见在海湾当中有个福特岛。那里的水深勉强可容大型军舰与轮船驶入。那些大型舰船在福

① 在布列塔尼半岛尖端的法国军港，那里有各种同海军有关的设施。

特岛沿岸被称为“军舰大街”的南面水路上抛锚。船坞、修理工厂、医院、被人叫做油池群的太平洋舰队的一批燃料贮藏池等等，设立在有这个“军舰大街”的福特岛对岸的瓦胡岛上。兵营和希卡姆机场(当时空军还没有独立)分布在港口附近。惠勒机场在瓦胡岛的中央，另外四个机场建设在该岛的周围。美军对如此巨大的军事设施，却完全未加戒备，没有设置特殊的伪装。

然而，虽然瓦胡岛四周被海包围，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对珍珠港的进攻是不可能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美国)海军部长威廉·诺克斯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友^①写过如下的一段话：

“同日本的战争，极有可能是由对珍珠港的舰队或基地的突然袭击而开始。……它的危险，以可能发生的顺序来说，大概是轰炸、用空投鱼雷猛攻、地面扰乱、军舰炮轰……”

两个月以后，夏威夷海军基地司令贝林格将军和同基地航空兵司令马丁将军，把预测十二月七日事件的书面材料概括为如下的内容：

“在宣战之前，清晨，由航空兵进行攻击。大约使用六艘航空母舰。潜水艇也会参加。”

之后，四月一日，海军作战部长加上了如下的话：

“迄今的事例表明，轴心国通常是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开战。要紧的是不在这种日子里放松警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上升，星期天的早晨开始了……

^① 指当时美国陆军部长亨利·路易斯·史汀生。

这个星期天尤其有应该戒备的理由。华盛顿知道，递交赫尔照会^①对于非常骄傲的日本来说，等于是打了他一记耳光。罗斯福和军方首脑掌握着写在表示绝密的紫色纸张上的东乡茂德外务大臣打给野村吉三郎、来栖三郎两个大使的密码电报：

“兄等已作出超越凡人之努力。而合众国竟向我国提出屈辱之建议。谈判就此结束。但应避免给与对方以此种印象。可告以正等待本国政府指示，……”

假如想起日本进行奇袭的传统——对旅顺的进攻^②等等，那么，这种措辞所意味的一切就不言而喻了。

不过，美国已经感到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赫尔照会是促使日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二十六日夜间，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向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海军上将发出了以如下一句话开头的命令：

“请把这封电报看做是进行战争的警告。”

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也向夏威夷地面部队司令沃尔特·C·肖特中将发出了相同的警告：

“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敌对行动……”

作为准备对日战争(WPC4G作战命令)的防御部署的“虹”计划付诸实行了。金梅尔与肖特奉命采取他们认为需要的措施，诸如进行侦察和警戒等等。但是，他们同时奉命不得引起市民的疑虑。可以说这是自相矛盾的命令。

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特混舰队作好了攻击准备。到达目的地有六天的航程。另一方面，夏威夷当局有充分时间在整个

①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通知日本包括应自中国、印度支那撤兵等十个条款的文件。

② 日俄战争时，通告宣战前的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驻旅顺港的俄国舰队。

夏威夷群岛布置好防御态势。他们的战争潜力也是足够的。计有：战列舰九艘、航空母舰三艘、大型巡洋舰十二艘、小型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六十七艘、潜水艇二十七艘；两个步兵师，兵员四万三千名；岸上与舰上的高射炮一千零十七门；飞机两百二十七架，其中战斗机为一百五十二架。后来马歇尔元帅这样讲道：“我们把珍珠港看做是充分装备了起来的基地。我们没有担忧……”

然而夏威夷当局却不认为夏威夷是在第一线。第一线是菲律宾吧？那当然是对的。是关岛、威克岛吗？那也可能是的。夏威夷怎么样？那简直是荒唐！就是这么一种思想情况。听见美国情报机关说找不到两艘日本航空母舰的行踪时，金梅尔竟然说了这样的俏皮话：“这大概就是说他们绕过了钻石角^①，而我们还不知道吧……”

基地的生活丝毫未变。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航空母舰所以不在，不过是因为企业号驶赴威克岛、列克星顿号开往中途岛，各自运交飞机去了，萨拉托加号进了圣迭戈^②的船坞。日常勤务继续进行。不过只加上如下的一些规定：陆军应戒备扰乱活动（在夏威夷群岛有大约十万名日裔人民）；海军如在湾内发现可疑的潜水艇，不予警告立即击沉……

没有设置防潜网，据说是为了怕妨碍军舰轮船的航行。也没有升起气球阻塞网，理由是所谓不使一般市民感到疑虑。新设置的雷达，因为操作未臻熟练，没有充分应用，只在下午四时至翌晨七时加以使用。飞机巡逻被限定于西边与南边的几个地方。严肃而勤勉的金梅尔，作为一个海军军人有很高的声誉，越

① 檀香山的一个岬角。

②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沿海城市。——译者

过了比他资格更老的三十二个人，受命指挥太平洋舰队和美国海军舰队；可是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训练部属，象下令大规模警戒那样的事情会成为教育训练的障碍。

从十二月六日到七日那一夜晚的情况，业已在书籍和影片中反复加以描写。天堂似的和平，舒适的街道，在檀香山的异国情调的马路上行走着的一群群水兵和士兵，军官俱乐部里的欢宴、跳舞，男女之间的情话绵绵……

严肃的金梅尔跳下了旗舰宾夕法尼亚号，住进麦克帕拉高地的一幢平房里，一周一度的饮酒完毕之后，于十点钟上了床。虽然联邦调查局通知他，日本总领事烧了文件，檀香山的日文报纸同东京之间通过可疑的电话，而金梅尔却完全没有不安的预感。第二天早晨他同肖特将军约好碰头，这也只是为了打高尔夫球。时光在流逝。马路、基地、舰队都在睡觉。海上是平稳而明亮的。

三时四十分，布雷舰康德号的预备役中尉麦克雷发现了模糊的航迹和潜望镜。他向担任巡逻指挥的驱逐舰沃德号呼叫：“潜行中的潜水艇！向西驶进，速度九涅！”

然而沃德号的潜艇探知器却没有反应。因此，这个报告就被撇在一旁，认为一定是康德号的预备役军人搞错了。

六时三十分，天亮了。一架巡逻机飞离福特岛。沃德号驶近港口。拖轮安塔勒斯号发现水底下有一艘小型潜水艇。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巡逻机也发觉了，扔下烟幕弹。沃德号的奥特布里奇上尉登时开炮，连续发出一排深水炸弹。敌艇象颗小石子沉了下去。日本的五艘特种袖珍潜水艇中的头一艘沉没了。

往北五十公里，在瓦胡岛的突出尖端，罗卡德和埃利奥特两个中士正要把雷达室的门关闭，因为值勤时间已毕。只是因为，来接他们去吃早饭的车子还没有来，所以他们还没有关掉雷

达。突然，荧光屏上出现了一堆闪闪发光的斑点，他们跳了起来。这时是七点零两分。到了七时二十分，惊恐不已的这两个人决定挂电话给基地：“自北向东三度，二百二十一公里的地方有大批飞机！”

值班的军官泰勒中尉答道：“把这件事儿给忘了吧！”

这一句话，成为奇袭珍珠港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言辞之一。

正当这一刹那，云彩消散了，渊田中佐俯瞰着瓦胡岛的青翠的群山。

他指挥下的突击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架飞机。用以粉碎敌人的迎击、用机枪扫射机场的战斗机四十三架；用以破坏福特岛和希卡姆、惠勒两个机场的俯冲轰炸机五十一架；用以攻击排列在“军舰大街”上的军舰、轮船的鱼雷飞机四十架和水平轰炸机四十九架。他们奉命为了不浪费一颗炸弹、准确地瞄准，根据需要尽量接近目标，不考虑到危险。东京认为，倘若这次作战成功的话，即使损失两艘航空母舰和一半飞机也没关系。

突击队在瓦胡岛上空自右向左前进。珍珠港就在那里。它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中，显得平静而安谧。没有瞧见航空母舰。然而七艘战列舰在“军舰大街”的预计的位置上。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在水路的对面的早船坞里。还没有发射一发炮弹使天空混浊起来。岸上，舰上，没有一个走动的人。渊田发出了表示奇袭成功的预定的信号：“虎！虎！虎！”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上述微弱的信号，被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广岛湾内的旗舰长门号接收到了。在这回冒险的进攻中，这是上报给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头一个消息。山本海军上将高兴得脸都发红了。

在死火山麦克帕拉的山腰里，另一位海军上将目瞪口呆地望着涂着血红太阳标志的飞机在他所指挥的舰队上空盘旋。倒

霉的金梅尔为了要去高尔夫球场而在换衣服的时候，他的副官墨非少校在电话中用有点怀疑的口气向他报告，沃德击沉了一艘小型潜水艇。金梅尔回答说自己就要到基地去。在等候司机时，剧烈的爆炸气浪，使他撞在柱子上。同马里兰并舷停泊的俄克拉荷马舰上，升起一根巨大的火柱。爆炸声接连作响，红烟团滚滚升腾，警报器呜呜吼叫。激动的航空军官驾驶的车子载着金梅尔，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司令部。现在的金梅尔已经不过是一场粉碎了他一生的灾难的无能为力的证人罢了。若使炸弹的碎片擦过他的胸膛，他也会象在滑铁卢^①战场上的内尔^②元帅那样说道：“索性能够刺杀我倒好了！”但是，假如日本的将军陷于他那种处境的话，准定是不允许自己活下去的。

突击队完成了任务，就分成几群返航。渊田中佐扔下自己的炸弹后，等待着嶋崎重和少佐指挥的由一百六十七架飞机组成的第二批突击队。第二批于八时四十分到达卡胡库角，随后散开队形，于八时五十四分开始攻击。第二批的攻击比第一批更为困难。第一批时的安谧的寂静，如今变为一片地狱。深红的烟团腾空而起，外加发生一个接一个的爆炸，从而遮盖了目标。高射炮也有一部分组成了火网。纵然如此，不包含鱼雷飞机的第二批，也取得了不亚于第一批的战果，然后消失于北面方向。渊田中佐最后一次在这个岛的上空盘旋。机场全都裹在火焰之中，“军舰大街”则呈现一派奇异景象。加利福尼亚号已经倾覆沉没，大白遮篷搭拉在后甲板上，若干面各种颜色的信号旗在一根绳索的末梢飘扬。在受伤的马里兰号的旁边，完全倾覆了的俄克拉荷马号露出仿佛一条庞大鲸鱼的龙骨。有钢骨

① 比利时的一个村落。——译者

② 米歇尔·内尔(一七六九——一八一五)是法国拿破仑军队的一名元帅。

桅杆特征的田纳西号和西弗吉尼亚号看起来好象是纠缠在一起。在外侧的西弗吉尼亚号给鱼雷捅了一个大洞，而田纳西号仿佛是得到了它的掩护。露出船舱、在猛烈燃烧着的亚利桑那号，不过是一堆丑陋的钢铁。两艘驱逐舰各处一方。在早船坞里，宾夕法尼亚号的甲板在喷火。在那一排船末尾的战列舰内华达号曾经试图逃脱，却遭到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在即将沉没的状态下向港口方向漂去。巡洋舰、驱逐舰和其它舰艇，正在沉没、燃烧着的、爆炸着的不计其数，无法一一看清。抛锚处本身因为流失的燃料而笼罩着烈火。与此相反，容易成为目标的油池群和海军工厂的车间，却毫无损伤。

渊田中佐飞返赤城号时，大部分飞机已经降落在母舰的甲板上了。损失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它不过是预计的五分之一，约三十架飞机。空勤人员们还想再一度出击。渊田中佐力图说服南云中将：地面设施中还遗留着应加以破坏的东西，也许还能够发现目的物名单上所没有的航空母舰。然而南云满足于预期以上的成功，已经发出了舰队驶向日本的命令。渊田中佐的愤慨也无济于事。舰队加大了速度。迷失方向的两架轰炸机在呼叫，要求告诉他们舰队所在的位置，可是，虽然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舰队的电波却坚决不吭气儿。这两架轰炸机耗完了汽油，一面发出“万岁，万岁，万岁！”的电报，一面消失在大海之中。

在日本，奇袭珍珠港的成功引起了狂热的兴奋。突击部队的归来唤起了极其热烈的爱国情绪。天皇为了同平民渊田中佐见面，采取了打破宫廷惯例的措施。在八千万国民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只有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是清醒的。他要人们注意：航空母舰不在珍珠港；破坏了的战列舰都是陈旧的；美国的战争潜力仍然是巨大的；绝望的战斗简直已经排上了日程等等。

珍珠港的雷声惊醒了沉睡着的巨人。美国发出了充满愤怒

的喊声。“婊子养的日本鬼子！”罗斯福臭骂着敌人，“必须永远记住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他宣告了判处日本死刑。本来美国实际上投入战争恐怕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由于袭击珍珠港的炸弹，顷刻之间举国一致，迅猛地以激流汹涌澎湃之势冲进战争去了。

(摘译自日本小学馆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第二卷 丁日初译)

书 刊 介 绍

《俄国觊觎海洋》

本书阐述了苏联在破冰船、海军、商船及渔船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它扩张海上霸权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政治影响。书中也谈到了苏美争夺海上霸权的情况。作者是英国新闻记者戴维·费尔霍尔。本书已于1974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英] B·H·里迭尔·哈尔特

编者按：本文是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的结论部分(摘要)。作者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分析了战争前夕希特勒德国同苏联、英国、法国等的关系，分析了战争期间交战各方的战略活动。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抹煞了帝国主义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区别，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所谓“不必要的战争”。“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读完全篇，有一点给人们以启发，这就是象希特勒那样的反动派，都是一批反革命的蠢驴。他们老是犯致命的错误。尽管他们气势汹汹，但是从战略上看，从本质上看，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革命人民是完全可以打败他们的。

以打开俄国进入欧洲心脏道路而结束的这场不幸的冲突，曾被邱吉尔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不必要的战争”。在力求避免这场战争和遏制希特勒的做法上，英法政策的基本弱点就在缺乏对战略因素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们便在对他们最不利的时刻投入战争，并因此助长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本来可以避免的灾

难。英国的幸存，似乎是一个奇迹，其实是希特勒犯了历来侵略成性的独裁者所反复犯的错误。

生死攸关的战前阶段

回顾起来，很清楚，对双方来说，那最早的致命一步，是德国人于一九三六年再度进入莱茵区。对希特勒来说，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双重的战略优势——既掩护了鲁尔这一德国的主要工业区，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侵入法国的跳板。

为什么这一行动没有被遏制呢？其主要原因是法国和英国都急于避免有导致战争可能的任何可怕的武装冲突。

在希特勒一九三八年的活动中，他再一次从政治因素中取得了战略优势：德国和奥地利人民的希望统一；捷克人对待苏台德区德国人的态度方面引起了德国人的强烈不满；并且在西方各国中，又出现了一种认为德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做法都是合乎正义的看法。

但是，希特勒在三月份的入侵奥地利，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南部侧翼再无险可守了。捷克斯洛伐克对他说来，是他向东方扩张计划中的一个障碍。九月份，利用战争威胁得来的慕尼黑协定，不但使他得以收复苏台德区，而且还使捷克斯洛伐克陷入了战略上的瘫痪。

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便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从而包围了波兰的侧翼。这是希特勒一系列“不流血”策略中的最后一着。

当时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就在取得俄国的支持（俄国是能给予波兰直接援助的唯一国家），只有如此，才可以遏制希特勒的野心。但是，尽管形势危急，英国政府的行动还是疲疲遑遑、

三心两意的。除了英国人的犹豫不决外，波兰政府和东欧的其它小国都反对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这些国家忧心忡忡，把俄国的援助和侵略等同起来。

希特勒对于因英国支持波兰而产生的新局面，有着很奇怪的反应。英国的剧烈反击和把军火生产增加一倍的措施，使他震惊。但他把英国人看作头脑冷静和有理性的，他相信他们除非能得到俄国的支持，否则，决不会为了波兰而轻易投入战争。因此，他收敛着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和恐惧，竭力争取与俄国和解并促使它克制。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木马比张伯伦的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后果却是致命的。

八月二十三日，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并签订了条约。此项条约还附有一项秘密协议，即德国和俄国将瓜分波兰。

此项条约把战争肯定下来了。希特勒的一系列快速侵略行动闹得人心惶惶。

就这样，欧洲的文明列车驶进了一条又长又黑暗的地道，足足在六个困顿不堪的年头以后，它才从这个地道里钻出来。即使在那当口，胜利的灿烂阳光也仍然是一幅幻景。

大战的第一阶段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星期五，德国军队侵入了波兰。星期日，三号，英国政府对德宣战，履行了它早期给波兰提出的保证。六小时以后，法国政府更加无可奈何地步了英国的后尘。

在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波兰沦陷。在九个月以内，西欧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泛滥成灾的战争洪水所淹没。

波兰当初能够坚持得更久一些吗？法国和英国能比使波兰免遭德国压力方面做更多的事情吗？从武装部队的表面数字来

看,对两个问题的答案,仿佛都是“可以”。

就一九三九年的战争来说,德国军队是远没有作好准备的。波兰和法国的兵力(包括三十五个后备师在内)总共相当于一百五十个师,而其中有一些是要担任法国的海外勤务的;它们所要对付的德国人一共也不过九十八个师,而其中的三十六个师还是未经训练的。在德国人留下来防守西部边界的四十个师中,只有四个是训练良好并装备齐全的现役师。但是希特勒的战略已将法国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要用快速进攻战才能减轻波兰所受到的压力,这对法国的军队来说,是做不到的。它的陈旧的动员体制,在增补兵源方面是缓慢的,它的反攻计划所依赖的大量重炮,到动员期结束后的第十六天才准备就绪,但到那时,波兰军队的抵抗却在土崩瓦解了。

由于战略地位关系,波兰被弄得困难重重——这个国家象摆在德国两颚间的“舌头”,加上它把大部分兵力摆在舌尖附近,所以波兰的战略部署就更糟。此外,这些部队在装备上是过时的。而且,他们居然把希望寄托在数量庞大的骑兵上,殊不知骑兵对付德国坦克是毫无办法的。

德国人在这时候只有六个装甲师和四个机械化师能投入战斗,但是由于古德利安将军的努力和希特勒的支持,在采用高速度机械化战争的新的设想方面,他们把功夫做到了家,其他部队是望尘莫及的。这种类型的战争和行军速度是二十多年前英国先驱者们所开创的。德国人还发展了一支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大的空军,波兰和法国都是空军奇缺的国家,就连支持和掩护他们部队的空军也没有。

就这样,波兰目击了德国新的闪电战术的第一次胜利示威,而那时波兰的西方盟国却还在作常规战争的准备工作。九月十七日,红军越过了波兰的东部边界,这背后一击决定了波兰的厄

运，因为波兰几乎没有剩余部队来抵抗这第二次的入侵了。

波兰迅速沦陷，接着是为期六个月的休战——人们被表面的平静迷惑了。在西方国家里，领导人和公众都把时间泡在拼凑进攻德国侧翼的异想天开的计划中。

事实上，要法国和英国单独建立战败德国所需要的兵力，是没有希望了。当此德国和俄国在他们共同的边界上彼此对峙之际，他们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两个彼此猜忌的伙计之间发生摩擦，从而将希特勒的那股爆炸的武力从西方引向东方。这件事发生在一年以后，如果西方盟国不那么急躁的话（民主国家就是这样），可能早就发生了。

他们那些进攻德国侧翼的高谈阔论和恐吓性的语言，促使了希特勒来一个先发制人的袭击。他的第一个打击是占领挪威。从被缴获的希特勒的那些会议记录表明，直到一九四〇年初他还在考虑“维持对德国有利的挪威中立”，但到二月份，他却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人打算在那里登陆，而我则需要抢在他们前头。”四月九日，一小股德国侵略军在那里登陆，并占领了重要的港口，而当时的挪威人却望眼欲穿地期待着英国海军驶进挪威领海来。

五月十日，希特勒的第二个打击，是落在法国和低地国身上。早在头一年秋天，在他打败波兰，向盟国提出讲和遭到拒绝时，他就着手准备这一次行动。曼施泰因提出的新计划是对盟军搞突然袭击，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因为当盟军向比利时推进迎击在荷兰的德军时，德国的大量坦克部队（七个装甲师）沿着多山地和多森林的阿登地区扑面而来，盟军最高指挥部还认为坦克车无法在这条路上通过。德军渡过马斯河时，只遇到微弱的抵抗，他们在这里突破了盟军防线的薄弱环节，然后向西横扫，直达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沿岸，切断了他们的运输

线。这样，在德国大量步兵投入战斗前就解决了问题。英国部队好容易从敦刻尔克渡海逃跑。比利时人和大部分法国人被迫投降。这种结局是无法弥补的。在敦刻尔克事件后的一星期，当德国人向南进袭时，法国部队竟无力抵抗了。

然而，这一震撼世界的灾难原是容易阻挡的。装甲部队的冲击，早可以在他们到达英伦海峡以前，用同样兵种的部队加以集中反击就可以遏止了。但是，尽管拥有比敌人更多和更好的坦克的法国人，却按照一九一八年的老框框，把它们分成许多小股排列着。

如果法国不是匆匆忙忙地开进比利时，而使这战略要地如此空虚的话，如果早就把后备军调到那里的话，德国装甲部队在马斯河上的袭击可以及早制止的。但是，法国统帅部不仅以为阿登山地坦克车通不过，而且还认为对马斯河的任何袭击只会象一九一八年那样是零星的，就是德国人到达这里后，他们还需要作一个星期左右的准备工作。这样，法国人有足够时间调来后备部队。但是，这次德国装甲部队在五月十三日上午到达，在当天下午就强渡马斯河了。“坦克时间”的行动步伐，打垮了过时的“缓慢动作。”

可是，这种闪电战的步伐之所以可能采用，就是因为盟国领导人还没有掌握新技术。因而，也就不知如何对付。德国装甲部队的袭击是能够在它到达马斯河前挡住的。即使没有地雷，这种袭击也能制止——轻而易举地把砍下的树木置于通向马斯河的长满着树木的路上就行了。清除这些树木所化的时间，对德国人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法国沦陷以后，一般舆论倾向大都归咎于法国人的士气不振，并认为它的沦陷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本末倒置的”说法。法国士气的低落，仅仅出现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以

后——而这种失败是容易防止的。到一九四二年，所有的部队都学会了如何制止闪电战的进攻——但是如果在战前就学会了的话，那情况就改观了。

战争的第二阶段

英国现在成了纳粹德国仅存的劲敌。但它是在敌人两千哩海岸线威胁性包围之中，处于军事上难以防守的危险境地。

它的军队在刚刚抵达敦刻尔克的时候，逃过了全军被俘的厄运，这是由于希特勒下了一道颠三倒四的命令的缘故。

尽管大部分英军得以平安撤退，但他们损失了大部分武器。在归来的十六个师中的幸存者被改编后，仅有一个装备完整的可供国防用的师，舰队则被安置在最北边德国空军不能到达的地区。如果德国人在法国沦陷后的那个月的任何时候登陆英国的话，英国简直很难顶住他们。

但是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头头们并没有作好入侵英国的准备，甚至没有拟定过紧接着战败法国后这个显然重要的计划。他让这千载难逢的一个月在期待着英国会同意讲和的心情中过去。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清醒过来以后，德国的准备工作还是不认真的。当德国空军不能把皇家空军赶出“英国战争”的天空时，陆军和海军头头们事实上是高兴的，他们便因此可以推迟侵犯英国了。最奇怪的是，希特勒本人也准备把这件事作为推迟进攻的借口。

希特勒的私人谈话纪录中表明，他对摧毁不列颠和大英帝国有厌倦情绪，他认为英国是世界上的一个稳定因素，并始终抱着拉它入伙的愿望。而除了这种厌倦情绪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冲动。希特勒又在向东方打主意了。这就成了英国得以保全的

决定因素。

如果希特勒集中力量击溃英国的话，那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尽管他错过了侵略并征服英国的良机，但是他仍然可以扼杀它的。他可利用空军和潜水艇的压力使它逐渐饿死并导致最后的崩溃。

话得说回来，当德国东陲俄军压境，本土已受威胁时，希特勒感到不能冒把力量集中在海军和空军方面的危险。因此，他认为确保德国后方安全的唯一办法乃是进攻和击败俄国。他对俄国的意图格外猜疑，因为长期以来，他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

他也确信，英国将同意修好，一旦它对俄国参预战争不再有什么指望的话。的确，在他的想象中，如果不是俄国挑唆它继续作战的话，英国早就言和了，七月二十一日，当希特勒主持讨论仓促起草的入侵英国计划的第一次会议上，他暴露了思想方面的转变，他说：“斯大林和英国勾勾搭搭，使英国继续作战，想把我们捆住，他的打算是争取时间和攫取他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一旦和平来临，他就得不到这些东西了。”从这里，他进而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注意力一定得转到对付俄国的问题上。”

侵俄计划马上被制定，虽说直到一九四一年初他才作出最后决定。入侵是在六月二十二日发动的——这个日期刚好是拿破仑侵俄日期的前一天。装甲部队很快就打垮了仓促应战的苏维埃军队，并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长驱直入俄境四百五十哩——已到达往莫斯科全程的四分之三。但是德国人始终没有能够到达那里。

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呢？秋天的雨和雪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是更基本的原因是，德国人错误地估计了斯大林能从俄

国内部动员的后备力量。他们估计会遇到俄国两百个师，而到八月中旬就可以把它们全部歼灭。但这时战场上又出现了一百六十个师。当这些师被歼灭时，秋天已来临了。当德国人在泥泞的道路上向莫斯科推进时，他们又发现新的部队挡住了去路。另一个基本因素是，尽管苏维埃革命后取得了巨大的技术上的进步，然而原始性的东西在俄国一直还保留着。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士兵和人民具有非凡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表现在它的道路的原始状态。如果它的道路系统发达达到西方的水平，那它肯定会象法国一样，很快地沦陷。话得说回来，即使它的道路情况如此，如果按照古德利安当初的主张（他的意见被希特勒和老一辈的陆军头头们所驳回），装甲部队不去等待步兵，在夏天就赶到莫斯科，那末，入侵还是可能成功的。

俄国的冬天，对德军来说，确实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和摧残。然而，即使在一九四二年，希特勒仍然完全有夺取胜利的机会，因为当时红军的装备严重不足，而斯大林由于早期的惨重败北，他对红军的领导权已动摇了。希特勒发动了新攻势，势不可挡地直扑高加索油田的边缘地区（俄国的军事机器是靠高加索油田供应的）。但是希特勒却把他的兵力分散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两地。因此，反使部队在进攻斯大林格勒时受到严酷的遏止。在攻占“斯大林格勒”的反复、顽强作战中，他的部队疲乏不堪而又被这场由他挑起的战役弄得难以脱身。当冬天来临时，他严禁任何人撤退，而当俄国新建立的部队在那年稍晚些时出现在战场上时，他又使他的攻城部队陷入被围困和被俘的劫运了。

斯大林格勒的惨败给德国人留下的漫长战线，远非他们的残部所能防守。撤退才是唯一的出路，将军们都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希特勒固执己见，拒不同意。他对一切劝告充耳不闻，顽固

地坚持“不撤退”。但这句口头禅不足以抵挡潮流，只不过弄到每一次惨败后被迫退却罢了。由于耽搁太久希特勒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希特勒的兵力越来越遭受到战略上过于铺开的影响，拿破仑就是这样毁灭的。兵源短缺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因为在一九四〇年战争已扩大到地中海。当时，墨索里尼想乘法国沦陷和英国虚弱之际投入战争捞一票的缘故。这倒给英国在海军力量能够发挥作用的地区提供了一次反攻的机会。邱吉尔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英国在埃及的机械化部队，虽说规模不大，但很快就粉碎了意大利在北非的落后部队，此外，还征服了意大利的东非领地。它本来可以向黎波里进军，但却停顿下来，因为有一支英军要在希腊登陆。后者是一个仓促的、没有准备好的行动，被德国人轻而易举地打退了。但是意大利在北非的败局，迫使希特勒往那儿派遣了由隆美尔指挥的德国增援部队。由于希特勒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俄国，因此，派往北非的部队仅够支持意大利人，而无力攫取地中海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门户——苏伊士运河、马耳他和直布罗陀海峡。

这样做的结果，仅仅是使德国的兵力更为紧张，这也就抵销了隆美尔在这次反冲击的胜利，只不过使北非的清剿工作推迟了两年而已。现在德国部队已经沿着地中海两岸和整个西欧的海岸线展开，同时，他还要维持他们在俄国内地长得可怕的战线。

由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的参战，德国这种因兵力分散而必然遭致的惨重后果被推迟了，但战争却延长了。说到底，日本的参战，对希特勒最后的命运是不利的，因为它迫使美国这个庞然大物投入了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击沉美国太平洋舰队，它的暂时效果是，使日本在西南太平洋（马来亚、缅甸、菲律宾和

荷属东印度)取代了盟国的地位。但是,在这种快速的扩张中,他们的手伸得太长。要保留这些战利品,远非他们的能力所及。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它的工业力量是有限的。

战争的第三阶段

一旦美国的力量得到发挥,俄国在艰苦抗战中发挥了它的力量,轴心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败局已定,因为他们的军事潜力加在一起,也比盟国的要小得多。唯一有待确定的是,战事还要继续多久,战争如何结束。当侵略者在退居守势的时候,他们最大的指望莫过于拖延时间等待着“巨人们”变得厌倦或发生争吵,从而取得较有利的和谈条件。但是,这种长期战争的策略有赖于战线的缩短。轴心国家的领导人却没有一个能忍受自动退却的“耻辱”,于是,只好死守着每一个阵地直到崩溃为止。

在战争的这个第三阶段,并没有真正的转折点,有的只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潮流。

这个潮流在俄国和太平洋显得更其迅猛,因为在这些地区,一种不断增长的力量优势,与调度兵力的广阔的回旋余地结合在一起。在南欧和西欧,这个潮流受到较多的阻碍,因为回旋余地受到较多的限制的缘故。

一九四三年七月,英国和美国部队首次重返欧洲并不困难,因为在当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忙于从海道把他们的大量部队开赴突尼斯,企图在那里建立一个桥头堡,以封锁盟军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集中进军。德、意部队既要把突尼斯变成诱敌深入的陷阱,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的防务便空虚了。但是,当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并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向意大利推进时,他们在

这个狭窄而多山的半岛上的进军便显得艰难而缓慢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为了强渡英伦海峡而在英国建立起来的主要盟国部队，在诺曼底登陆了。在这个地方，成功是肯定的，只稍在岸上牢固地建立起一个足够大的桥头堡，供他们密集部队栖身之用，以摧毁敌人的封锁线就可以了。等到他们一打开缺口，整个幅员广阔的法国就可成为他们调兵遣将、纵横驰骋的大好地盘了，因为这些部队都是机械化的，而大部分的德国部队却没有机械化。

这样一来，德军的防御最后被注定要崩溃了，除非他们能在最初几天里使来犯者无法登陆。然而事实上由于盟国空军（在这个战场上，盟国空军对德国空军居三十比一的优势）的毁灭性威力，使他们装甲部队的后备力量迟迟不能上来，这对他们形成了致命的打击。

即使诺曼底的反攻在海滩上被打退，盟国现在用来直接轰炸德国的强大空军优势，也肯定会使德国崩溃。在远东，情况也相同，由于空军的强大优势，完全用不着原子弹，日本的崩溃已肯定下来了。

既然潮流转了过来，在盟国道路上，留下的就是它们自己设置的障碍，即他们的领导人所提出的目光短浅的“无条件投降”。这倒给希特勒帮了大忙，使他能继续控制德国人民。对日本的主战派也如此。如果盟国领导人足够聪明，在他们的和平条件上提供某种保证，那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控制早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很久就会完蛋了。三年以前，参与在德国蔓延很广的反纳粹运动的代表们，曾把他们推翻希特勒统治的计划和许多准备参加这一暴动的陆军军士的名字，通知了盟国领导人。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希望能得到盟国和平条款的某些保证。但是，在当时和以后，盟国没有给他们以任何指示或保证，因此对他们来说，

在一次“暴动”中想得到支持，当然是困难的了。

这样，这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就不必要地延长了，上百万人作了不必要的牺牲，而最后胜利仅仅产生了新的威胁和笼罩着对另一次战争的恐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用不必要的延长，来追求敌人的“无条件投降”，证明仅仅对斯大林有利——为共产主义统治中欧打开了方便之门。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

警惕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

——评《回忆与思考》

叶 伯 乐

《回忆与思考》是朱可夫写的一本回忆录。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粉墨登场以后，为了掩饰自己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面目，采取了一系列极其阴险狡诈的两面手法。由一些苏军高级将领出面，纷纷发表文章，写回忆录，在斯大林问题上作出某些不同于赫鲁晓夫的评价，就是这种两面手法之一。朱可夫的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一九六九年出版的。

《回忆与思考》(简称《回忆》，下同)是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全书共二十一章，叙述了作者的童年时代、十月革命以前、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经历，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卫国战争为主要内容。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作者先后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和列宁格勒等方面军的司令员，并作为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多次被派往前线，组织过一些重要战役。书中从第九章到第二十一章，着重叙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前准备、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活动，以及若干重要战役的组织、指挥等情况。作者自称：“从卫国战争开始，一直到最后”，他“都在苏军最高统帅部工作”。本书是他“对自己亲眼所见、亲身参加过的事件”作出

的“分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和分析这本书提供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些重要资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战备，准备抗击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有一定的意义。

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进行的卫国战争，是当代规模巨大的一次反侵略战争。作者在《回忆》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战争开始前我们做了些什么？国家有没有准备？”赫鲁晓夫一伙正是抓住这个题目，煽风点火，大做其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章，用来攻击斯大林，向苏联人民脸上抹黑。这本书提供的材料是，当时苏联党和政府，“考虑到已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行动的性质”，提出“摆在军队面前的尖锐而繁重的任务是：今天要学会明天在战斗中需要的东西”。这个“明天在战斗中需要的东西”，就是斯大林指出的：“我们国家一方面始终不渝地执行维护和平的政策，同时又极力加强了我们的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准备。”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苏军各个部队“根据战争的要求来改进军队的战斗训练和教育工作”，“在接近实战条件下训练军队”，还“考虑到突然性的因素……经常保持战斗准备。”

在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为加强国防做了大量的工作。作者“根据准确的档案材料”，提供了下列数字：“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时，整个工业年产量虽然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三，但是国防工业的年产量则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大工厂转为生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工生产。”并“加速发展东部地区工业，建立机器制造、石油加工和化学等部门的第二套企业”。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军得到了十八万多支机枪和自动步枪，一万三千多辆坦克，九万多门各种火炮，一万七千多架作战飞机。作者说：“党和

政府在巩固国防方面采取了何等重大的措施，也可用我军数量来说明，这个期间我军数量增长一点八倍。”

从这些材料来看，在战争爆发之前，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是有一定的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战争爆发后，尽管苏联工业遭受巨大的困难，在四年战争期间仍然继续生产了九十九万门大炮，十多万辆坦克和十三万多架作战飞机。“党和人民为巩固国防做出了特殊的努力，付出了全部的人力和物力。”可是，赫鲁晓夫在那臭名昭著的“秘密报告”中，竟然信口雌黄，污蔑斯大林“在基本方面都没有准备。甚至沙皇在一九一四年与德国开战时供应的步枪，比我们在希特勒入侵时所有的还要多一些。”这除了赤裸裸地暴露出他极端仇视斯大林、仇视苏联人民的叛徒面目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既然苏联党和政府作了战争准备，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发动对苏战争以后的不到三周时间内，德寇竟能长驱直入，进入苏联境内五、六百公里呢？朱可夫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他说：“我不止一次地思索过战争最初几天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是：“对于敌人一下子把它预先展开在各条重要战略方向上的全部兵力，投入这样大规模的突然进攻，也就是对于此次进攻的性质，我们是没有完全预料到的”，“没有估计到敌人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的计划”。

为什么没有预料到、估计到呢？朱可夫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驱使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它们全副武装跑上了战争的舞台，企图用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当时，法西斯德国是世界上的一股最大祸水。英美帝国主义一心想把这股祸水东引，怂恿德寇侵犯苏联，以便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为了粉碎这一罪恶计

划，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把这股祸水暂时挡了回去。苏联认识到“条约不能使苏联避免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但能够赢得时间巩固国防”。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以“声东”来掩盖“击西”。它象一头凶狠的野兽，东突西豕，先后掠夺了几乎整个欧洲的领土。但是，这并不是说希特勒不想“击东”，他一上台就曾叫嚷“把我们的视线转向东方”，“决心向东突进”。不过，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大国，这块骨头很硬，一下子要啃它，又啃不动，力不从心，只得等待时机罢了。就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在大规模准备进犯苏联了。在帝国主义眼里，什么“互不侵犯条约”，什么“和平条约”，统统是骗人的。一面把和平经念得震天响，一面又加紧磨刀霍霍，这就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两面手法。

果然，一九四一年，当德寇征服西欧大陆、围困英伦三岛的时候，希特勒认为东侵苏联的时机来到了。于是，六月二十二日凌晨，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发动了对苏联的突然袭击。

希特勒搞的这一套突然袭击的阴谋，部署是相当周密的。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他就亲自制订了秘密的“巴巴罗萨计划”，妄图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并确定了主要的进攻路线。为了保密，这个计划只印了九份。从这时开始，“德国不断向东普鲁士、波兰、罗马尼亚调动军队先后达一百二十个师。”为了掩饰突然袭击的诡计，希特勒还制造了种种假象，放出许多烟幕。例如把军队的东移，说成是“为了隐蔽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而采取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佯动”，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大量出版英国地图”，“散布空降英国的消息”，又暂时“中止了经常那种对苏联的攻击”，“德军统帅部是在最后时刻而且就在边境线上实施集中的，它的坦克部队配置在很远的地方，直到六月二十一日夜

间才进入出发地域。”希特勒为了麻痹对方，使突然袭击一举奏效，精心策划了如此之多的花招，这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在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发动不义战争，都把突然袭击当作自己的“法宝”。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反动派总是脱离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只能把侵略的赌注寄托在突然袭击上面。有鉴于此，对于革命人民来说，警惕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就十分重要。

毛主席在总结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经验教训时教导我们：“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当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显然，在卫国战争前夜，苏联最高统帅部虽然一般地估计到了希特勒必然要发动对苏战争，但恰恰对希特勒必然要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缺乏足够的估计。

从《回忆》一书所叙述的苏联卫国战争前夜和初期的情况来看，斯大林是估计到希特勒会进攻苏联的，因而采取了许多加强国防的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大都是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这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些准备，很难设想经过四年的大规模的战争，苏联卫国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希特勒突然袭击的精神准备，也就是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进行备战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在这一方面恰恰是做得不够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

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只有首先在政治上、思想上动员群众，同时也在军事上武装群众才有可能及时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在备战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不断加强战备观念，牢固树立人民战争的思想，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回忆》这本书对苏联在战争初期失利的原由，不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由于作者自己的世界观是“唯武器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缘故。作者说：“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军队在丧失掉大部分武器以后，很快就失去抵抗力，简单地说就是溃不成军。谁也无法把武器本身的作用同军队士气的意义确切地区别开来。”这就是朱可夫对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失利原由的答案。作者显然不能理解：“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论持久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而尽管作者在书中间或提及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业绩，但在“唯武器论”的笼罩下，也就失去其应有的光辉了。

当前，世界形势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坐在火山顶上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内外交困，矛盾重重，陷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闹得世界到处不得安宁，不断增大了战争危险。他们之间，正象《红楼梦》里所说的：“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尤其阴险狡诈，它一面高唱国际局势“缓和”的滥调，妄图麻痹世界人民；一面加紧穷兵黩武，扩军备战，到处伸手，四面扩张，有着更大的危险性。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今天，苏修妄图重施当年希特勒“声东击西”的故伎，把战略的重点放在欧

洲，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拚命争夺，同时，向中东、地中海、印度洋，以及凡是它能够扩张的地方扩张。而西方国家却总想推动苏修东进，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在苏修看来，中国是一块肥肉。在它认为啃得动的时候又何尝不想啃！

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加强团结，从精神和物质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警惕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准备它打常规战争，也准备它打原子战争，准备它从陆上来，也准备它从海上来、空中来。“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如果今天苏修的好汉们，还想步希特勒的后尘，要弄突然袭击的伎俩，那末，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近八亿人民，“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自取灭亡！

有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回顾和“总结”

编者按：一九七三年十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西方有人称之为“赎罪日战争”），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至今仍然按照他们各自的需要，不断地为这次战争作出回顾和“总结”。这一期摘译的几篇文章，就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第四次中东战争，在阿拉伯人民这一方说来，是一场冲破美苏两霸强加给阿拉伯人民以“不战不和”局面的正义战争；就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方说来，是一场受到两霸支持的侵略战争。阿拉伯人民给予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也就在实际上给予了两霸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两霸痛定思痛，心有余悸，才感到有必要对这次战争进行回顾和“总结”，以便进一步策划阴谋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在中东发动侵略战争，在中东进行更大规模的争夺。现在在中东上空，战争的雷声又轰轰作响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下面几篇文章的作者，资产阶级立场是很明显的。他们对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人民这一方，是有所歪曲和否定的，但是，他们提供的某些材料，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说，英国《外事报道》透露：“以色列已经拥有能发射核弹头的导弹”，以色列花了十三个月

的时间总结了上次战争的教训，重新组织了常规武装力量，使人们听到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磨刀霍霍的杀声。美国作者格里菲思得出的结论是：“这次小规模的对抗暴露出，苏美缓和是一个多么不稳定的竞争和合作的混合物”；有的则认为：“两个超级大国这样地卷入，即使在冷战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美苏两霸炮制出来的所谓“缓和”这个当代的神话。这对那些相信这个神话的人未始不是一种教益。

这几位资产阶级作者，这一次总算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阿拉伯人民的力量。他们说，尽管以色列占有“军事优势”，但是，阿拉伯人民同“一九六七年那一次战争相比，思想上发动得更好”。他们相信“苏联也好，美国也好，都不会迫使以色列从被占领的地区撤走。”他们“感到这是为（收复）自己的领土而斗争”，因而就能团结一致，勇往直前，同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轻而易举地就越过苏伊士运河”，突破了所谓不可逾越的巴列夫防线，粉碎了以色列人是“不可征服”的神话，具有“历史的重要性”，“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他们得出这个结论，当然是感到痛苦的，但也反映了美苏两霸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当然还会蠢蠢欲动、兴风作浪，但是得到全世界人民支持的阿拉伯人民团结战斗、丢掉幻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必定能够给予侵略者以更加沉重的打击。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阿拉伯人民！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前前后后

〔美〕威廉·E·格里菲思^①

一九七三年十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中东政治中的最大的分水岭。在前后四次战争中，这是以色列第一次未能对阿拉伯赢得压倒的军事胜利，从而遭到了政治上的失败，而阿拉伯则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此外，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在战争期间开始利用石油作为反对美国的政治武器。这一情况和螺旋形上升的石油价格（这也是战争所促进的）大大加剧了能源危机。最后，所有这些发展的结果，是使美国的中东政策离开了原先那种近乎全面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战争的前奏：阿拉伯方面的重新组合

在旧伊斯兰阿拉伯帝国那饱受挫折的政治传统中（在历史上阿拉伯人一向认为应对异教徒占优势），勇敢——不论是行动上的还是口头上的——之成为主要政治美德由来已久。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既未使阿拉伯世界现代化，也未使它强大起来。相反，正由于它的现代化过于缓慢，由于以色列在政治、

^① 作者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环球杂志》编辑部成员之一，美国兰德公司的顾问。

经济和技术发展上都比它高出很多，因而在军事上占着优势，它沮丧之余，思想变得激进化起来。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以前，它屡次被以色列打败，以色列人是被它认为低等的犹太人，而支持以色列的又是被它看作是继承英法殖民者衣钵的美国，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它的愤懑心情。

因此，很多阿拉伯人变得亲苏起来，有些成为激进的左翼分子。随后是，他们在一九六七年的全面战败，纳赛尔的接着去世，苏联的不愿同他们一起对以色列作战以免危及它同华盛顿日益增长的缓和，以及苏联对阿拉伯人心理方面的处理失当，这一切都把阿拉伯世界推向右转（直到一九七三年战争前夕，都在把他们推向反对莫斯科），并一反过去纳赛尔对沙特阿拉伯的敌意，实现了埃及—沙特阿拉伯联盟。

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以前，阿拉伯人几乎无人相信他们不久就能打败以色列，因为他们认为，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人材和技术现代化方面的差距在继续扩大，以色列愈来愈领先。（战争的结果表明，他们低估了他们自己。）他们大多数人仍然不现实地想要以色列国家消失。但是萨达特和埃及大部分的上层政治人物认识到，这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不现实的。因而他们的目的是以色列撤出占领区，如果可能，通过军事胜利来做到这一点，否则，以继续供应阿拉伯石油作为交换条件，要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其撤退。

埃及是不是仍然想摧毁以色列，这是较次要的，重要的是它是否认为它能够这样做。也不能象大多数以色列人似乎设想的那样，认为阿拉伯人的不断要求“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就意味着他们觉得有可能摧毁以色列。巴勒斯坦突击队是希望摧毁以色列的，但他们在一九七〇年几乎被约旦侯赛因国王所扑灭。但即使这样，他们搞的劫持暗杀活动和以色列的报复还是

给阿拉伯人的愤懑怒火增添了燃料。

一九七一年的中东休战，加强了苏美缓和，苏联人的被驱逐出埃及——这一系列事态发展拆除了中东危机在超级大国关系上引起爆炸的雷管。在一九七三年以前，苏联一直宁愿中东处于不战不和状态，因为战则危及缓和，和则会大大降低苏联那张中东王牌——即阿拉伯人的需要大量武器援助——的价值。华盛顿是希望取得某种解决办法的，但因为美国国内有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压力，不愿意强迫以色列接受它。

一九七三年以前的一段时期中，在阿拉伯方面进行着一次重大的政治重新组合，这是由于一九六七年以色列的打败埃及、纳赛尔之死、也门战争的结束、阿拉伯世界的转向右倾、苏美缓和以及沙特阿拉伯日益增长的石油财富和势力所引起的。萨达特同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者纳赛尔很不一样，是一个埃及传统主义者，他清洗了亲苏的阿里·萨布里集团，把苏联军事人员驱逐出埃及，同保守的费萨尔国王结盟并接受其资助，在国内转向右倾，并试图重新取得美国的支持来反对以色列的无限期占领西奈，虽然在这最后一点上并未收到成效。他又利用沙特的金钱和支持，来反抗激进右翼分子卡扎菲为利比亚与埃及合并所施加的压力，并使埃及能够较少依赖苏联的军火援助，同时他还希望沙特将会运用石油制裁的武器来削弱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使他从中得到好处。费萨尔国王第一次有了足够的石油收入，使他能够没有什么顾虑地使用石油武器。他不必再害怕埃及的敌意，因而对美国的需要减少了；他用石油武器，还可能有助于抑制卡扎菲，使沙特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也有助于把以色列人驱逐出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对于他来说，这后一点不仅是一项政治义务，还关系到他对伊斯兰教和家族的神圣职责。

战争的前奏：以色列摆出帝国架势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以色列的统治阶层大多相信，要保障以色列的安全，除保持武力优势外，别无其它途径。以色列从不信任联合国；而且自从一九六七年纳赛尔口头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华盛顿并未迅速作出军事反应以来，它也不再信任美国。它决心要成为它自己命运的主人，并且日益深信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九六七年的战争刚结束时，以色列可能是愿意放弃它所占据的大部分领土来换取一纸和约的。但是，虽弱而不妥协的阿拉伯人拒不同意。

此后，以色列使用了极小然而残暴的武力，加上快速的经济发展，轻而易举地“绥靖”和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萨达特把苏联人赶出了埃及。美国几乎全面地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因此获得了很先进的武器系统。它那新的军事工业集团在迅速地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它的经济既受到外国（大都是犹太人）投资的支援，又利用着占领地区的阿拉伯劳动力，显得很繁荣。用不着多长时间就可以制成一颗原子弹。领土扩张主义的右倾思潮开始得势。以色列又回到了“制造既成事实”这一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把更多的以色列移民定居在被占领的土地上。一九七三年九月联合政府当局决定建立三十六个新的移民居留地。在第四次战争以前，以色列的政治上层分子大都深信它的地位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耶路撒冷认为，只有那日益逼近的能源危机可能危及以色列的地位。

战争的前奏：苏联影响的下降

一九七三年战争前的两年内，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下降了，这有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包括埃及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的失败，纳赛尔之死以及萨达特的清洗亲苏的阿里·萨布里集团。第二个原因是苏联顾问的被赶出埃及，而这又是由于莫斯科拒绝提供萨达特所要求的某些武器，由于苏联军官对他们的埃及同僚采取傲慢自大的态度，也由于萨达特感到克里姆林宫宁愿同美国搞缓和而不愿全面支持埃及，尤其是在他看到尼克松对北越布雷和轰炸而苏联并不采取行动以后，更加强了他的这一看法。这又产生了第三个原因，即萨达特不断集中注意力于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因为这是能够迫使以色列退出被占领地区的唯一强国。埃及的新盟国沙特阿拉伯同美国有着传统的亲密关系，萨达特认为美国目前由于日益依赖阿拉伯的石油而可能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第四个原因是，伊朗国王对他认为是苏联唆使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佐法尔的反伊朗运动日益担心。第五个原因是战争前夕苏联同叙利亚之间友好热情的衰退，这部分是由于叙利亚—约旦和叙利亚—沙特关系趋于缓和的结果。甚至伊拉克也流露出对莫斯科感到不快的某些迹象，并表示愿意同西方至少在经济上改善关系。

战争的前奏：阿拉伯作出进攻的决定

第四次战争前的中东重新组合为阿拉伯的进攻奠定了基础。沙特阿拉伯已经朝着充当阿拉伯世界领导角色的方向迈进，而象卡扎菲那样的右翼激进派和伊拉克人那样的左翼激进

派，则都处于软弱而孤立的地位。埃及同沙特联合在一起并得到它的财政支持，它们两国都带头缓和阿拉伯内部的关系，包括叙利亚和约旦在内。阿拉伯使用石油武器的可能性本来就在日益增加，而一次以阿战争显然将使这种可能性早日成为现实。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及和叙利亚决定发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战争。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愿再容忍以色列占领他们的领土；是因为他们相信，苏联也好，美国也好，都不会迫使以色列从被占领的地区撤走，而且如果他们不及早攻击，以色列人很快就会把这些地区真正“吞并消化”掉。他们还相信，他们业已改进了军备和部队训练，不大可能遭到完全的失败。他们觉得，单靠石油武器还不一定就能对美国施加足够大或足够快的压力，使其背弃以色列；而且，如果不经一场战争，单靠石油武器就做到这一点，那就会肯定沙特的至高无上地位和他们对利雅得的依赖。相反，一场新的战争，只要他们不完全战败，将会恢复他们的尊严，提高他们的威望，并将由于他们的而不是沙特的主动而造成非使用石油武器不可的形势。

萨达特也许还担心，如果他不发动进攻，将会发生军事政变。他估计，他的部队在战争开始时能够跨过苏伊士运河，而在以色列把他的部队赶回运河这边以前就将实现停火。但是，根本的一点是，萨达特深信——这也正是他政治策略的高明之处——虽然以色列曾从苏美紧张中得到过更多的好处，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将会使埃及得到好处，而以色列则只会受到损失。他正确地估计到，苏联人将不得不重新给他提供武器，而美国将会设法不使埃及再次遭到象一九六七年那样的完全失败，事后还很可能会迫使以色列同阿拉伯进行谈判，并迫使其作出让步，以便维持东西方间的缓和和保持阿拉伯的石油供应。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人曾唆使阿拉伯人进攻，但他们大

概是在进攻开始前不久就得到了通知的。他们可能认为，试图阻止进攻，或者拒绝补充阿拉伯损失的武器，将摧毁他们在阿拉伯世界已经下降的影响，而以色列人也可能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样，苏联人和他们的阿拉伯朋友将挽回他们在一九六七年所丧失的某些威信。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支持将会鼓励阿拉伯人对美国使用石油武器，美国同西欧和日本人的关系将因此受到损害。同时，他们相信，由于苏美缓和，他们将能够同华盛顿合作，使战争在阿拉伯人遭到完全失败或缓和遭到破坏前就停下来。

美国象以色列一样，既没有预计到战争，也没有预计到阿拉伯方面在最初阶段的胜利。的确，尼克松政府由于受到国内亲以色列派的压力，也由于看不到一九六七年停火的不稳定性，放弃了它在一九六九年后曾经作出过的企图迫使以色列人着手解决问题的努力，改而采取了事实上默许以色列无限期保持它于一九六七年征服的土地的态度。

战争的过程

阿拉伯发动突然袭击，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占了以色列的便宜，在开始阶段获得了没有料想到的成功。以色列大大低估了阿拉伯已经增强了的决心、纪律和军事效率。阿拉伯配备有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特别是萨姆-6地对空导弹和新的反坦克武器，这些武器用来对付以色列的飞机和坦克证明很有效。而且，同一九六七年时相比，他们在思想上也发动得更好，因为他们感到，他们不是在为巴勒斯坦而是为他们自己的领土而战斗。

埃及人轻而易举地就越过了苏伊士运河，但没有向西奈山口推进，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怕离开了导弹的掩护范围，会把自己

暴露在以色列的轰炸之下。叙利亚人最初占领了戈兰高地的大部分地区。战争期间阿拉伯人的调子是温和的：他们说，他们的目标是收复失地而不是毁灭以色列。阿拉伯世界给予埃及和叙利亚的支持，包括军事上的以及用限制石油生产的办法所提供的支持，都比一九六七年要多。约旦在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犹豫以后，派遣了一支小部队前往叙利亚作战，但是以色列—约旦的一九六七年停火线仍然是平静的。

以色列动员后，以与一九六七年同样顽强和出色的精神投入了战斗。他们很快就把叙军赶回到戈兰高地的这边，一直赶到大马士革炮火的射程之内。通过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坦克战后，他们冲过苏伊士运河的中段，占领了运河以西相当大一片埃及领土。虽然他们没有能在强加的停火前摧毁埃及部队，但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他们很快就会做到这点。可是，以军在十七天中就战死了近二千五百人——一九六七年的三倍——这对伤亡极为敏感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十月二十二日实现首次停火时，埃军仍然呆在运河东岸的部分地区。

在苏联认识到要是再不停火以色列将会摧毁埃军后，停火就实现了。美国也需要停火，是因为以色列只赢得部分胜利，华盛顿希望，这将使以色列更愿意进行谈判；另外，美国想保持苏美缓和，避免苏联战斗部队重新进入埃及。埃及急需停火以避免灾难。以色列则由于美国的压力而勉强同意。

然而，停火马上就遭到破坏，运河西岸的以军截断了埃及第三军团的后路。这导致了苏美之间一场短暂而剧烈的对抗。莫斯科决心迫使以色列放弃这些新的战果，接受了萨达特关于组成苏美联合部队以保证停火的建议，而华盛顿则拒绝了这一建议。莫斯科故意大张声势地准备向埃及派遣空运部队（假如必要的话，由苏联单方面派遣），以此来向华盛顿表示它的决心。莫

斯科也许还认为，尼克松国内的麻烦将使他较易在苏联的压力下就范。

接着，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处于戒备状态，以此来表示他的决心（可能也是为了想减轻些他国内的困境）。苏美妥协的结果是建立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由于美国的坚持）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部队亦即美国和苏联的部队不参加，同时（由于苏联人的坚持）命令以色列回到十月二十二日首次停火生效时的阵地，目的是解救被截断后路的埃及人，并为美苏联合赞助下立即进行以阿谈判作好准备。

富有讽刺意味的、而且也是对将来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妥协的结果主要地不是使萨达特更加亲苏，而是使他相信华盛顿已经恢复了更为公正的立场，因为自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美国迫使以色列人（而且也只有美国能做到这点）采取违反他们意愿的军事行动——即允许埃及第三军团得到解救。萨达特感到他的策略已开始取得成功：利用苏联人和石油武器来对付华盛顿，利用华盛顿来反对以色列人，是有好处的。

战争的结局和后果

战争的政治结果并不反映军事结果。在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正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它本来是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的。然而，这次战争在心理上完全改变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从而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状态。他们不再由于迷信以色列的不可战胜而感到低人一等了。只有当你想到阿拉伯人那崇尚勇敢的传统多少世纪以来所蒙受的屈辱，你才能理解这一心理改变的历史重要性。

埃及的地位大大得到了改善。萨达特的战略就这样证明是

正确的；虽然从军事上讲，他打了败仗，但是在大多数阿拉伯人看来，他并没有被战败。他打开了阿以僵局；也是他促成了把石油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来使用的局面。约旦在这次战争中军事上没有被触及，但由于它名义上也参加了，它发现它的威信得以大致保全无损，而它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没有比以前更坏，不过它在美国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则由于华盛顿和开罗关系的改善而多少有所削弱。

以色列的地位恶化了。阿拉伯人不再相信以色列人是不可征服的了。以色列过去认为阿拉伯人不可能掌握复杂的现代化军事技术，不可能进行突然袭击的那种想法也不再能保持下去了。它在国际上处境更加孤立，因此在军事上更加依赖美国，而美国的政策则正在从原来的几乎全面支持以色列转向在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采取平衡的立场。

至于两个超级大国，很多人原来以为苏美缓和将由于这次战争而放慢速度、甚至遭到破坏的那种估计，已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它们在给交战双方重新提供大量武器，尽管停火后它们之间有过短暂的对抗，但是美国和苏联还是能够就一项联合停火决议达成协议，随后又就联合国紧急部队达成协议，这就表明它们双方都决心不让中东危机影响东西方缓和。然而，这次小规模的对抗暴露出，苏美缓和是一个多么不稳定的竞争和合作的混合物。举例来说，莫斯科的向阿拉伯人重新供应武器，加强了美国国内象亨利·杰克逊参议员这样一些人的地位，他们以此和苏联拒绝允许犹太人自由出境作为反对增加苏美贸易的理由。战前，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本来在下降，现由于它给阿军补充了武器并为促成停火施加了压力，这一趋势完全改变了。当美国受到阿拉伯石油限制生产和禁运的影响并因而导致盟国间的紧张关系和经济问题时，莫斯科也从中得到了好处。

美国同它的西欧盟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战争期间有了发展。大多数设有美国基地的欧洲国家拒绝让华盛顿利用这些基地向以色列运送武器，这一则是由于这些国家对阿拉伯石油的极度依赖超过了它们对继续得到美国对苏威慑力量的保护的需 要，再则也是由于它们不同意美国的那种几乎全面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美国不得不利用第六舰队的航空母舰作为向以色列补充作战飞机的加油站，因此，公开对北约盟国表示愤慨。另一方面，美国因为上述情况，又由于时间紧迫，它在开始重新供应以色列武器和后来在尼克松使美军在世界范围处于戒备状态以前，都没有预先告知它的盟国或者同它们进行磋商。其结果是出现了盟国间的危机。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一方面在石油分配上优待英、法、后来还有日本等这些亲阿拉伯国家；另一方面，则禁止向美国和荷兰输出石油，从而加剧了盟国之间的这一危机。当美国及其盟国相互拆台时，苏联静悄悄地坐在一边，从中渔利。

美国与盟国间的紧张关系，随着美国赞助下临时协议和脱离接触协议的签订，阿拉伯供应给西欧和日本的石油的增加而开始缓和了。伤痕依然存在。在西欧残存着的反美情绪以及在美国残存着的反西欧情绪使得尼克松的“欧洲年”成了一句空话；使得在欧洲保持美国驻军实力的可能性有所缩小；使得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间贸易谈判取得成功的前景有所减弱；使得苏联人成为唯一的获胜者。虽然莫斯科所得到的总的好处依然存在，但它在中东对美国的优势却是短暂的。战争结果并没有在埃及恢复苏联的大规模军事人员。而且，临时协议和脱离接触协议的签订，使得美国至少在目前成了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唯一调解人，并看来很有可能放松石油的生产限制和禁运。这一点在重要性上可能超过下列事实：即一旦苏伊士运河开放，苏联将能够增加它在波斯湾和印度洋上游弋的海军舰只。不管怎

样，美国已经在计划把迪戈加西亚岛发展成为海军基地来抵销苏联的海军存在了。

(摘译自《第四次中东战争、能源危机与美国政策》，一九七四年冬季号美国《环球杂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陈洁茹、赵绍棣、罗康雄译)

书 刊 介 绍

《勃列日涅夫言论》

一九六四年，正当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一部难得的反面教材《赫鲁晓夫言论》的时候，苏修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赫鲁晓夫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勃列日涅夫上台了。

勃列日涅夫从一九六四年十月上台到一九七三年年底止，公开发表的言论、讲话以及书信、电报等有一百多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鉴于过去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当权十一年中所发表的公开言论汇编出版，现在又有了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弃之可惜，因而也把他的言论汇编成册，以《勃列日涅夫言论》为书名，分为九集予以出版（第二、三、四、五集已在一九七四年出书）。按照计划，今后还将继续收集他的言论出版。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完全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更加狡猾。这套《勃列日涅夫言论》，也比其他修正主义谬论伪装得更加巧妙，更有欺骗性。然而，读者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细心阅读本书，是不难发现他在革命词藻掩盖下的反革命本质的。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无非就是贴着“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标签的社会帝国主义，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

(朱文娥)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军事教益

〔美〕劳伦斯·惠顿 米切尔·约翰逊^①

空军的使用显然受到了新的限制，步兵重新得到了历史上原有的重要性。有关局部战争的整个学说现在必须重新加以鉴定。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最近爆发的那次战争被世界新闻界生动地描述为近代史上小国之间所进行的一次最为激烈的有限战争。埃及防空设施之精密完善是前所未有的；坦克战规模之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双方似乎都下了同样的决心要达到自己的战争目标。自从上次阿拉伯人战败以来的五年中，双方在装备水平、部队熟练程度、军官指挥能力以及后勤供给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创造革新。因此，在赎罪日战争中所使用的装备和战术对今后所有的军事行动必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最大的教益可能是必须不断保持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警惕性，以保证常备不懈和避免遭到战术偷袭。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侦察到并汇报了阿拉伯人作战的准备程度。埃及前线是在每年一度的秋季演习这个幌子下部署了部队的。从九月底直到十月六日上午，军事征候表明，迫在眉睫的战争可能性已日益增大：

^① 惠顿博士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兼德国研究班主任，是《德国的东方政策——联邦共和国与华沙条约国家的关系》一书的作者。约翰逊是该大学的研究生。

越来越多的部队处于戒备待命状态，作战飞机待命出击，预备役动员起来了，补充装备运到前方了，苏联人的家属撤走了，等等。在叙利亚前线，沿着以色列边界并未进行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机械化旅从约旦边界向以色列边界调动并未引起安曼的任何反响，这暗示着政策已有重大改变。的确如此，就在这同时，约旦开始将部队北调，从约旦河流域掩护叙利亚的前线。十月一日叙利亚防空系统开始处于戒备状态，十月二日叙利亚预备役动员起来了。

尽管已有这些和许多别的征兆，阿拉伯人还是成功地进行了高度的战术偷袭；在以色列，只有前沿正规卫戍部队处于戒备状态，直到十月六日才下了低调子的动员令。用梅厄夫人的话来说，在最初两天里，以色列几乎输掉了整个战争；以色列领导人没有作出及时动员起来以避免在两条战线遭受严重挫折的政治决策。以色列防务方针始终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的，即保持一支最低限额的常备军，而以受过高度训练并能迅速动员起来的预备役作为后盾。然而，尽管它全民动员的能力是非常杰出的，可是当对方部队大规模向前沿阵地调动时，以色列防务部队也还是需要得到充分的情报，以明了对方的意图。为了保证能得到充分的情报，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具有传奇般能力的情报机构。可是情报专家们和政界头面人物都低估了开战的前景，因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国际局势已发生了有利的变化。

六月战争后，以色列的政治战略是非常一致的，并灵巧地进行运用的。苏联以各种方式反复进行干涉，旨在表明它承担保证阿拉伯达到军事均衡地位的义务，并遏制以军的进攻，直到双方在战场上的力量均势能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为止。这样，表面上阿拉伯取得了军事上有抉择自由的保证，从而勾销了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军事胜利中所获得的政治成果。以色列明显地

受到这些抑制后，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只有当阿拉伯的政治势力缩小到他们的扩军活动变得不起作用时，以色列才愿意同阿拉伯谈判。也就是说，以色列要强迫阿拉伯在政治上紧紧地受到约束，使之没有行动自由，就象他们处于军事劣势而没有行动自由一样。这条路线要求以色列保持它的军事优势，并不允许有任何以违反以色列谈判条件的方式来取得政治解决的来自外界的干预。特拉维夫成功地阻挠了两个超级大国所作的努力，主要是阻挠了美国反复提出的罗杰斯和平计划，并相信华盛顿的中东政策已经由主动积极变得漠不关心了。一九七二年七月萨达特总统把苏联战斗部队从埃及驱出，而美国却未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这使以色列领导人相信两个超级大国都有效地受到了牵制。以色列坚信，如果没有外国势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规模支援，阿拉伯绝不会进攻她的防御阵地。由于这个在政治判断上的错误，才作了这样的决定：敌对行动尚未到达迫在眉睫的地步，就不动员以色列的预备役。

以色列的国内评论家多次指责说，以色列本该重复六月战争的战术，对展开的阿拉伯军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然而在过去五年间埃及空军的状况已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由于建立了世界上最密集的地面防空系统，同时配以半加固的空军基地，把飞机隐蔽在分散的混凝土机库里，这样结合起来就使以色列先发制人的攻击无法生效。在战争的第一周，以色列企图摧毁停在地面的埃及飞机，可是效果甚差。以色列空军还采用了典型的战术，即把飞机跑道炸得千疮百孔，试图使空军基地无法使用。可是埃及使用了速干水泥，有效地对付了他们所作的努力。简言之，由于以色列空军无力摧毁地面上的叙利亚和埃及的飞机，也无法把他们的基地破坏得无法使用，这就迫使以色列用空战的手段来取得空中优势。

空中作战

空中作战也给以色列空军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新情况。军事行家一般都认为以色列空军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特别在驾驶员的熟练和地面的支援方面。叙利亚和埃及多次企图建立一套可靠的防空系统都被它摧毁了，它毫无疑问地对阿拉伯空军保持着优势。确实如此，就在战争开始几周前，以色列空军曾诱出过两队叙利亚截击机，对它们进行了伏击，一举而击落了十九架。以色列空军有过这样的经验，因此当他们发现苏联提供的防空系统如此有效，同时阿拉伯可以不依赖苏联顾问而操纵得如此熟练，他们不禁大为惊愕。特别是以色列空军的电子干扰设备相对地说来已经陈旧了，它无法干扰受到大吹大擂的萨姆-6导弹以及 ZSU-23-3 和 ZSU-57-2 高射炮系统的雷达搜索和跟踪频率。此外，虚放假目标对光学瞄准和热跟踪的萨姆-7 导弹也不起作用。阿拉伯的导弹操纵人员熟练程度很高，在长时间连续使用的条件下仍然保证全部系统正常运行。三周后，未被摧毁的系统仍然能运行自如地对付以色列空军。甚至在后期，叙利亚和埃及的萨姆导弹发射台不仅能单个地发射导弹，还能成群齐射。导弹火力网的技术使飞机难于躲避，并使电子干扰不得不同时对付的频带有七条之多，从而大大降低了效能。

以色列空军很快就从初期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这很了不起。刚开始时以色列空军沿着运河进行攻击，为的是每次出击可以取得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对付攻击目标。可是由于高度的损耗率，同时又未能给埃及的桥头堡以严重的破坏，就改用了有选择性的战术，即沿着飞行路线直至选定的目标进行饱和轰炸，企图在防空网突破一个缺口。这样的努力也失败了。于是以色列

空军就把它的作战活动局限在埃及的固定防空保护伞以外。十月八日和九日以色列空军被迫对叙利亚防空网进行攻击，它不敢飞越黎巴嫩和约旦从侧翼攻击，深恐扩大冲突。因此它只能正面突击，结果损失了三十架飞机，然而却突破了叙利亚三道防线的第一道，打进了一个楔子。战争末期，有四十个叙利亚萨姆-6导弹发射台仍然在作战。在埃及前线，直到十月十五日夜间接在西岸作战的以军坦克部队摧毁了那里的萨姆导弹发射场和高射炮阵地后，才把埃及防空保护伞打开了缺口。此后在地面部队配合下，以色列空军才能向任何方向发起攻击，对个别发射场进行饱和轰炸，从而自侧翼有步骤地收拾埃及的防空系统。

由于阿拉伯人对自己的防空系统充满信心，因此在萨姆导弹网被突破前，他们一直没有动用空军。他们这样做也是由于在防空火网的包围中难以空战，因为在这包围中很难配合使用雷达制导系统与光学瞄准系统来分辨敌我。也许阿拉伯还估计到，把飞机保留到以色列空军力量削弱后再出动，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当阿拉伯出动飞机后，他们惨败于以色列，飞机损失率高达二十比一。然而阿拉伯在地面支援方面，每个人都表现得勇猛善战、熟练能干，使战争能持续下去。

在地面近战攻击中，当阿拉伯机械化部队在防空保护伞以外作战时，以色列空军就能予以重创。事实上，十月六日到七日叙利亚纵队之所以能被阻挡在离他们的军事目标几英里外，这大概还是要归功于以色列空军。十月七日是关键性的一天，这一天以色列空军出击数百次，有时候飞机返防不到七分钟就又出击了。在十月十四日到十五日的进攻中，以色列空军在对付处于防空射程外的埃及支援纵队时取得了最大的成效。以色列空军在支援作战部队时，由于辨认敌我的困难，作用就不大。赎罪日战争的经验表明，俄国人和阿拉伯人在建筑和使用固定的

防空网方面是很杰出的，然而尽管萨姆-6和萨姆-7导弹以及ZSU高射炮组具有快速运动的能力，他们还是不能为在战场上行动的大部队提供足够的空中保护。可能最简单的理由是：由固定的导弹发射台乱发掩护火网不同于地面作战所要求的有控制的发射。假定确实如此，就意味着，这个不足之处是由于后勤供给和训练上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武器的质量问题。

两个战场上进行空战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战略方面。以色列反复找寻叙利亚和埃及心理上的致命弱点，以便可以摧毁他们的决心。因此它对叙利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轰炸。这个国家经济的基础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可是却看不到军民的士气受到任何不利影响的迹象。如果说轰炸产生了什么影响，那只是更加激励了叙利亚人的决心。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以色列不敢对埃及进行类似的战略轰炸，比方说轰炸尼罗河流域。据推测以色列之所以不作这样的抉择，是由于萨达特在十月十六日宣布了他拥有地对地导弹，可用来对以色列空军的攻击进行报复。他所说的导弹并不是那些已经公开宣布过的埃及所拥有的地对地导弹，而是两个苏联飞毛腿B型地对地导弹营。这两个营的导弹及其操纵人员是于九月十二日起程离开苏联的。他们到达埃及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十月二十二日以色列破坏停火后，莫斯科又增派了两个营。）据西方通讯社猜测，这些导弹很可能既配有核弹头也配有常规弹头。不管是否可靠，以色列担当不起试测苏联意图的风险；即使在轰炸亚历山大港后，特拉维夫遭到的是常规导弹的轰击，那也将是难以接受的后果。

总之，这次空战很可能对其他军事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将来的空中优势必将在空中赢得，而不是在地面上。只有多次的核攻击才能把一个空军基地破坏得在相当时间内无法使用。听

起来也许有些矛盾，因为正是以色列空军在一九六七年证明可以在地面上摧毁对方的飞机，可是后来由于对方的干扰设备，以色列却不能从这种战术中继续得到好处。其他军事强国，特别是苏联，对一九六七年阿拉伯空军失败的原因作了评价之后，大搞一系列措施来确保飞机的安全。然而空军的使用，现在也显然受到了新的限制。比方说，由于敌方有了大量的防空武器和造价低廉的导弹后，要完成一项地面攻击任务需要比以往更多的飞机才能致敌以同等程度的创伤。战斗轰炸机所化费的代价与所取得的成效权衡之下是否得不偿失，这将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由于现代飞机造价昂贵，可能会产生两种情况：一是不使用数量有限的飞机来进行大规模的地面攻击；一是需要使用造价低廉的轻型飞机，从而明显地减少装载弹药的能力。由于防空设施的威胁，还需要使用更为复杂的电子干扰设备，需要更多使用无人驾驶飞机执行侦察和电子支援任务，以及使用射程二十到三十英里的可以不靠近攻击目标的空对地导弹（如美国的近程攻击导弹）。但是迄今尚无一种可靠的干扰设备可用来对付轻便的光学瞄准和热跟踪导弹。这种导弹很快就会使飞机在敌方先遣步兵巡逻队的面前变得脆弱无能。因此将来很可能还是恢复到使用炮兵来执行近距离地面攻击的任务，而将战斗轰炸机留着进行阻拦轰炸和摧毁坚固的目标。

地面作战

埃及方面修筑了庞大的防御工事，它掩护着至少五个师以及支援装备。但由于这些防御工事只是被以军从侧翼包抄攻占的，所以很难对其效能予以确切的评价。双方都低估了运河用来弥补他们防御计划不足之处的价值：埃及人渡河是经过周

密计划又认真演习过的；而以色列人的伺机渡河也是经过策划和进行巧妙的，它导致了埃及第三军团的溃败。一句话，双方的防御工事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军事倾向：阿拉伯人寻求的是经过精密筹划的消耗战，由于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如果初次进攻失败了，也还能顶得住；而以色列人却宁可打运动战，这样可以尽可能地歼灭和制压敌军。有效运用阵地防御已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由于先进武器的造价日益昂贵，对越来越多的小国说来，还是采用这种阵地防御与运动防御结合起来的办法比较适宜。

有防御工事的阵地的使用显示了传统作战兵种——步兵、装甲兵和炮兵所起的作用已有所改变。阿拉伯战术上的主动性迫使以色列在不可思议的程度上不得不按照阿拉伯的方式作战。以色列的过分自信也是阿拉伯最初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以色列的反击，特别是在西奈的反击，是不协调的，是零敲碎打的。这说明了缺乏计划性和对以军的熟练水平过分自信。以军遭到了挫败，头三天在运河沿岸损失的坦克有三百五十辆之多。这立即引起了对这次战争的重新评价，并撤换了几个占据重要职位的指挥官。此后就进行了较有组织的作战，但开始时还是按照埃及的方式进行的。

这个转变的原因是阿拉伯强调了阵地作战，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固定火力的优势而不是速度和机动性。防御阵地外的活动是由步兵进行的，他们携有防护自己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叙利亚和埃及的初攻是由步兵师单独进行的，两国都把各自的两个装甲师留作后备。阿拉伯人对于坦克作为进攻武器使用的概念在埃及十月十四日的进攻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装甲车辆在向前推进的步兵后面等距离拉开，以躲避前进的反坦克导弹部队。以色列不得不用步兵和烟幕来对付，但最后还是能够在

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用密集队形来反击。以步兵作掩护,坦克进行中央突破所化的代价并不很高,在此之后以军装甲部队就包抄了两翼,或者在向前推进的前哨线后面寻找战术上的优势。

阿拉伯以防御方式使用装甲武器这一点在叙利亚前线表现得最充分。十月七日夜間,叙利亚的两个装甲师开赴第一道防线,掩护三个机械化师的撤退,并阻挠以军的挺进。十月九日和十日他们主要在防御阵地上作战,直到十月十一日才开始全面后撤。总的说来,以色列的坦克优于阿拉伯的坦克。美国的M-60坦克在炮火的射程、准确度和穿透力方面比苏联的T-62优越。在开阔地带,叙利亚坦克企图快速靠近,用他们的快速发射炮以弥补其射程和准确度的不足。但以色列的M-60和其他型号的坦克都配备有电子计算测远仪,保证了高的初发命中率。因此,在开阔地带的作战中叙利亚损失甚大。然而每一部队的残余坦克还是能退至就近的防御阵地,坦克的快速运动力丧失了,可是防线的火力却得到了加强。就这样,以色列摧毁了叙利亚的八百五十辆到九百辆坦克,即占它拥有的坦克辆数百分之五十以上,也摧毁了它的飞机架数百分之三十,而自己付出的代价是二百五十辆到三百辆坦克和五十架到六十架飞机。以色列可以宣称在数字上的优胜,但却不能对萨阿沙防御工事发动持续的进攻。

从坦克问世以来,步兵一直处于次要的地位,可是阿拉伯的作战概念恢复了用步兵打头阵的方式,并把坦克主要用来作为防御武器,而很少用以达到扩大战果的目的。以色列无法完全达到它的军事目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阿拉伯使用了阵地防御的办法,以及大国进行了政治干涉。(附带提一笔:双方的炮兵对付有防御工事的阵地时都比较无能为力,可是对付运动中的纵队和固守战壕的步兵时,都能致敌以重创,这就说明了在将来炮兵的作用会稍有改变。)

其他地区

几个外围区域的情况也值得一提。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派遣部队一般都表现得很突出——虽然他们在埃及前线参与作战甚少。他们往往装备不足，有时是零星地投入战斗。在叙利亚前线，他们为牵制住以色列的大规模进犯作出了贡献，在这当中约旦第四十装甲旅继续保持了中东最为训练有素的坦克部队的名声。在这条战线上所表现的指挥和管理水平以及与友邻部队相互配合的程度，说明了要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阿拉伯联合指挥部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在敌方领土和开阔地带空空的直升飞机显得极易遭到攻击。双方都试图用直升飞机空降别动队进行袭击。可是几乎有百分之五十的直升飞机在空中就被击毁了。这种袭击一次也没有成功。这表现出直升飞机在无法有效地利用地形掩护偷袭活动情况下的局限性。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战争的海战。然而以色列海军在抗击叙利亚和埃及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报道共击沉了四十三艘各种级别的船只。叙利亚海军简直被打得瘫痪了，而埃及的海军部队，除协同苏联船只封锁红海外，只能局限在国内港口活动。以色列之所以能取得海军优势主要是因为它拥有射程二十英里的加布里尔地对地导弹。而苏联提供的、装备在阿拉伯战舰上的亚音速冥河式导弹对以色列舰上的高射炮来说是极易击中的目标，它们显然没能给以色列造成任何损伤。据报道加布里尔导弹的命中率达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阿拉伯海军损失中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由它造成的，其余的应归功于以色列空军。在局部地区取得优势后，以色列炮舰就向叙利亚和埃及的港口

及海军设施发起了攻击，并袭击了运河以西的防空系统。

人们公认，以色列横渡西岸这一着所表现的智慧与巧妙，正显示出预期中以军特有的敏捷与大胆。对处于防守地位的埃及人来说，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他们不得不按照以色列的方式来作战。埃及全部损失的九百五十辆坦克中，有近一半是在西岸被击毁的，以色列损失的坦克约为一百辆。对埃及第三军团的包围是战术胜利的产物，可是并不能作为军事教训的一个原因，并据此而轻易地创立出未来理论。

我们可以作出下列的结论。以造价低廉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装备起来的步兵重新得到了历史上原有的重要性。坦克现在必须要适应于对付这种新的反坦克威胁。在合适的地形构筑牢固的防御阵地，配备以密集的反坦克和萨姆地对空导弹，并以炮火支援，就可抗衡飞机—坦克联合作战在机动性上的优势，而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军事理论正是以这个优势为基础的。如果要在地理局限的情况下重新发挥快速装甲部队的重要作用，就必须想出新的方式来突破这种阵地。除非飞机能够冲破固定的防空网，否则利用坦克扩张战果的能力是有限的。最直截了当的解决方式看来就是加倍强调用自动火炮和活动防空设施来为坦克提供保护。可是这种临时的办法只表明了对有关局部战争的整套理论必须细致地加以重新检定。确实如此，阿拉伯之所以会对这次战争的结局感到骄傲，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他们在战术的革新和对苏联装备的有效掌握为这样一个学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即指导局部战争的概念通常并不囿于一般准则，而是应分别根据个别情况加以研究的。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三月号英国《今日世界》杂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材组译)

以色列有一支核威慑力量吗？

〔英〕《外事报道》

下一次中东战争也许正在迅速地逼近，它很可能是以色列所不得不面对的历次生存能力考验中最严峻的一次。原因是由于在一场新的战斗中，美国要向以色列空运战斗机将更加困难。因为葡萄牙新政权已强烈暗示，它可能会拒不让美国使用亚速尔群岛上的拉耶斯空军基地（在去年赎罪日战争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中转站）。假如天平的倾斜度明确地不利于以色列，那末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予以排除。

虽然以色列人仍坚持说，他们并未拥有核武器，也不会首先把核武器引进该地区。但有人猜测说，他们不仅有一个核武器库，而且还准备使用它。西方消息灵通人士声称，以色列已拥有能发射核弹头的导弹，也发明了一种廉价的方法，可从内格夫沙漠的磷酸盐中提取铀。

同时，以色列已花了自上次战争迄今的十三个月时间来吸取它所以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并据此而重新组织了它的常规防御力量。新司令莫迪凯·格尔将军强调的重点是建立能够自力更生和灵活机动的自成一体的大部队。采用这种方针是为了解决以色列长期存在的战略问题——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几支阿拉伯军队同时在三条战线发动进攻的局面。司令部认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本身，不是一支威慑力量；它必须强大到足以既能制止战争，又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以色列人不得不对付必然会发生的金钱和人力有限的问题。即便是这样,在赎罪日战争前,以色列军队连同预备役共有五十多万人,按世界标准来看也是很高的数字。而现在由于能够召集原先被免除兵役的人(年龄较大的人和原先被列为不宜服役的人),军队的人数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但是,这支军队还缺乏指挥战斗的中级军官、技术方面的战场指挥官和飞机驾驶员。

真正的改变涉及到战术问题。以色列的目的在于:即使阿拉伯国家首先进攻,也要保持能够抢先两步的地位。假如现在爆发战争,以色列将把多兵种的师一级的部队投入战斗。它拥有大量的坦克(百人队长式、美国 M-48 和 M-60 以及从阿拉伯国家缴获来经过改装的苏制 T-55 和 T-62)以及配有单人携带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包括天龙式、拖式和萨格式、红眼睛式、斯廷格式和斯特拉式)的步兵部队,并得到配有 155 和 203 毫米重炮的机动炮兵部队的支持,还有以色列的鬼怪式、空中之鹰式、海市蜃楼式和它自己的巴拉克式战斗轰炸机在空中掩护。

以往,不同兵种的部队在各自的指挥下行动,只有在战斗中才相互配合。那种制度已宣告死亡,不再存在了。前线部队将不再需要等待坦克或空中的掩护。如果新制度行得通,军事机关的各个部分都应能各就各位,同时行动起来。这个新概念是从美国军队的实践中模仿来的,但是尚未经受战斗的考验。

在这个总的概念范围内,已经努力增强各兵种的战斗力,具体说明如下:

(1) 空军 一九七三年战争以来,阿拉伯军队已获得了包括米格 23 式和海市蜃楼 F5 式更多更好的飞机。但据以色列方面称,还有米格 25 式以及更好的空对空导弹和技术更先进的

萨姆导弹与雷达系统。以色列空军在一九七三年所遭受的损失已得到补偿,但其实力和去年战前差不多。因此,它现在一定要做比赢得空战还要多的事情。它必须为地面和海上部队提供后勤支援,袭击敌人的运输系统,打击经济目标和清除桥头堡。如果配有武器的眼镜蛇直升飞机(这是一种可以发射火箭、装有重机枪并能携带拖式导弹的带炮飞船)能准时到达,它将能在坦克战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以色列空军还必须摧毁地对地导弹发射台或机动的导弹部队(它们拥有中程的飞毛腿和短程的蛙式导弹)。这是保护平民集居区免受导弹攻击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已同意让以色列拥有美国的长矛式地对地导弹。但是,如果下一次战争在几周内就爆发的话,这些武器或许还不能按时到达,则将用无人驾驶飞机来对付导弹;包括百舌鸟在内的反雷达导弹也将用来对付导弹。但是这样做也还不能完全对付得了萨姆导弹的射程和多样性问题,西方至今还没有搞出一些充分有效的反击措施。

空军司令宾亚明·佩列德将军最近透露,空军正在建立一种最新式的空中情报系统来减少万一爆发战争时将遭受的损失。(传说,以色列正试图购买波音飞机公司生产的空中雷达系统。)

(2) 坦克部队 以色列第一流的坦克战专家、前南线部队司令伊斯雷尔·塔尔将军最近说:“反坦克导弹使得坦克过时的议论,既不符合事实和言之过早,也是一种极不负责的说法。混合机动的装甲部队无疑地是地面战争的核心,而坦克则是其支柱。以色列坦克部队的重要性在将来只会更得到发展。”

以色列决策人物比过去更加强调大规模的装甲战。在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坦克部队是缺乏夜战装备的。嗣后,他们一直

在力图弥补这一缺陷。

(3) 步兵 以色列步兵已经配备了新的小型武器——美国的 M-16 和以色列的加利尔自动步枪，以及手持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中，坦克部队缺乏足够的步兵支持来对付配有导弹的阿拉伯突击队。这个问题据称也已解决了。

(4) 海军 它的首要作用，除在地中海进行日常巡逻外，还要保卫苏伊士湾的东部海岸(包括阿布·鲁台斯油田)及其出海口，并保证从亚喀巴湾到印度洋的海路畅通。以色列的加布里尔导弹改进后的射程、速度和能力均已提高，可以干扰追踪飞机的雷达。

(译自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国《外事报道》
杂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工农兵学员夏正荣
译)

辩证发展的普遍规律

〔苏〕Ф·В·康斯坦丁诺夫等

编者按：一九七二年，以Ф·В·康斯坦丁诺夫为首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了一本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的书。这篇《辩证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书中的一节。这里发表的是这一节的摘要。原来，这一节也同全书一样，被一层又一层的红纸包裹着，一经剥去，放在我们面前的这篇东西的修正主义原形就毕露了。

这篇东西大谈所谓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就是它们的同一性”，大谈什么苏联“不存在对立的方面和倾向向敌对的两极转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否定苏联“社会的激变、暴动”张本，妄图达到镇压苏联人民的反抗，以维护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统治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哲学，不过是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工具罢了。

列宁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谈谈辩证法问题》）否认斗争，否认革命，这是一切反动阶级的老把戏。苏修明明已经把苏联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还要硬着头皮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欺世盗名。但

是，“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苏修叛徒集团敢于站出来驳倒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吗！他们是决不敢站出来、也决驳不倒这个真理的。他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喋喋不休地叨念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从而也没有任何阶级对抗的废话。他们引经据典，装潢门面，但就是不敢提及列宁的这一段尖锐的批判：“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列宁的批判，就象一把刀子，刺中了苏修叛徒的心脏！

任何同类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就是它们的同一性。当然，它们各因其本身的特性而有所区别，但是它们在质上是同一的。既然它们在质上是同一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只能是量的区别。它们可能是多与少的区别，也可能是彼此之间在体积、容量上的区别，等等。换句话说，对象的质的同一性、一致性是了解事物另一方面——量——的前提。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说，量是“攫取质”的量，即对事物的质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引导我们去研究量的范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孤立的质或量，事物的存在既有质，同时也有量。只是为了认识的目的，我们才把质和量人为地区分开来，然而区分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确立

它们的联系。工人运动中的一切改良主义都是建立在片面地夸大发展的不间断性、量的渐进过程的基础上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进行社会革命，只要通过不断地积累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便可以“长入”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与改良主义者相对立，否认量的、不间断的发展形式具有任何意义，只承认社会的激变、暴动。他们断言，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改变社会条件，从而陷入了政治冒险主义，不考虑为革命飞跃所必需的客观条件。

质变形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比在剥削社会中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整个社会都关心实现时机成熟的变动，发展不是自发地而是有计划地、在自觉地为质变作准备的秩序中加以实现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大量出现的是那些从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转化的渐进形式。当然，这并不排斥另外一些飞跃形式，例如在技术发展中，由于巨大的发现、生产发展的新技术的可能性、新的加速发展进程的活动方式等等所引起的、急剧而突然的变化。

矛盾的性质、矛盾展开和发展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在无机界和有机界、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内，都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辩证法并不勉强给各种各样的矛盾提供某种“清单”。它的任务是为尽快地接近各种现象提供一个“战略方针”。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如何，怎样解决这些矛盾，这些问题都由科学家们在相应的知识领域中去说明。同时，认为辩证法的最一般的规律和概念不能发展，不能具体化，认为它们是抽象的，是新事实和新条件所无法攀登的“高峰”，那也是错误的。它在这样一个范畴如矛盾中，就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就要求将这一范畴从本质上加

以具体化。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早已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具有另一种性质，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点。但是，当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付诸实践时，这一问题就具有头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因此，列宁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认为，矛盾概念是没有差别的，把它跟对抗性概念混为一谈。列宁在驳斥布哈林的这种谬论时指出，对抗和矛盾不是同一个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下，对抗消失了，矛盾依然存在。

对抗性矛盾，这是具有根本对立的目的和利益的敌对社会势力、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敌对阶级——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封建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对抗性的典型表现。在划分为敌对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矛盾都具有这样的性质。矛盾的对抗性质决定着矛盾展开、发展的形式，决定着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就是矛盾的深化和尖锐化，它是通过对立方面的激烈冲突，通过对立方面向两极转化而合乎规律地完成的。

非对抗性矛盾，这是由于生活条件所决定而具有共同的根本目的和利益的阶级、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例如，劳动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个别分子之间的矛盾等等，就是这样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矛盾都具有非对抗的性质。这种矛盾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在非对抗性的矛盾中，不存在对立的方面和倾向向敌对的两极转化的客观必然性。整个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使得有可能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活动、通过改变产生矛盾的条件、通过教育工作等等，来逐步地克服这些矛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和克服非对抗性矛盾的本质特征还

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定社会运动的不是自发势力，而是反映社会进步客观要求的人民、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自觉意志和活动。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具备一切可能性，以便及时地察觉已经出现的矛盾并加以克服。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增长的社会发展对于人们自觉活动的依赖性，带来一种表现为主观主义倾向的危险性，这种倾向不承认客观存在的矛盾，忽视有计划地为解决矛盾而准备条件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地制订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不能简单化地理解发展的前进性。跟任何的辩证过程一样，发展的前进性是在矛盾中，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实现的。某些形式的发展中的上升线总是跟另外一些形式的发展中的下降线相一致的。每一个有限的形式，在按上升线发展的同时，又为自我的否定创造了前提。运动的前进性本身是在不同倾向的斗争中实现的，而且只是在发展交叉线的结果上、总体上为自己开辟道路。普遍发展的个别路线可能不是向前的，而是向后的，表现出倒退的、后退运动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简言之，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前进性，把它看作一个平稳流畅的过程，似乎它没有任何偏向与曲折。这一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特别重要，因为在社会发展中，有追求各自利益、为各自目的而斗争的不同阶级和政党在发生作用。

不应该忘记的是，否定的否定规律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对象中发生着各不相同的作用。恩格斯写道：“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辩证地否定旧事物和肯定新事物的特征在于，在社会本身的控制下有计划地实现业已成熟的各项任务。社会主义跟那种把旧事物看作完全反动的、必须加以彻底消灭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干的。尤其是，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只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挽救和保存由以往的发展所积累起来的、具有最重大价值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因此，任何伪装的、在反对“旧事物”的幌子下消灭过去年代中珍贵成果的“文化革命”，是跟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不仅坚决地否定那些在旧的剥削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阻碍社会前进的事物，而且在新的基础上综合着人类的一切成就。

于是，否定的否定规律是这样一个规律：它的作用决定着被否定者和否定者之间的联系和承续性。因此，辩证的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的、“无益的”、把以往的全部发展抛弃掉的否定，而是吸取和保留过去阶段的一切积极的东西、在更高级的基础上重复最新阶段的某些特征，并且整个说来具有前进性质、上升性质的一种发展条件。

(尹大贻，樊莘森译)

实地考察“北方领土”问题

〔日〕井上清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曾多次到我国访问。在这篇文章中，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日、苏之间关于北方领土的争端，揭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作者认为，“日本的固有领土不是属于政府，而是属于日本人民和日本民族的”。日本人民要求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完全是正义的斗争”。文章谈到了“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些重要动向：一切日本的反动势力，包括自由民主党内的青岚会，对“北方领土”问题“却只字不敢提”，似乎同苏修之间有个默契；当前，苏修将日本的“北方领土”作为侵略亚洲的军事基地，但是由于日修等反动势力的从中牵线，很有可能苏修将“北方领土”成为拉日本参加反华包围圈的一个筹码。

今年三月下旬，我很荣幸地受《东风》杂志社的委托，到北海道钏路市去，得到日中友好协会（正统）钏路地区本部理事长吉田正实等各位先生的大力协助，有机会从根室市、纳纱布角以及罗臼镇隔着狭窄的海峡遥望齿舞群岛和国后岛；同时，听取了各该市镇政府的“北方领土”问题的负责人、归还运动团体的积极分子、以及其他人士的许多介绍，收到他们赠送的很多资料；

此外，还同吉田正实先生等“钏路日中友协(正统)”的朋友们一起讨论了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的基本立场和具体做法，得到了许多教益。

下面，我想谈谈这一次新了解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

什么是“北方领土”？

首先，“北方领土”到底是指哪里？这个问题原来是极不明确的。现在，日本政府以及正在进行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的大多数团体用“北方领土”这个词来指齿舞群岛、色丹岛以及国后、择捉二岛(南千岛)；但是有的认为指的是：齿舞、色丹和南北千岛群岛整个地区；此外还有别人把南库页岛也包括进去了。

这种含糊的说法起源于旧金山和会的前二年，即一九四九年的《总理府设置法》的第三条。该条规定了总理府负责处理有关“南方地区”以及“北方地区”(没有用“领土”这个词)的事务。关于“南方地区”，除“北纬二十七度以南的西南诸岛”外，还一一列举了战前属于日本领土而当时被美国军队占领的原冲绳县和小笠原群岛及其他地方。但是，关于“北方地区”却仅仅提到“是指由政令所规定的地区”，没有指出任何具体的地名和经纬度。然而“北方地区”是与“南方地区”相对而言的，从这一点来类推，很清楚，“北方地区”指的是：过去曾经是日本的领土，当时(直到现在)被苏联所占领的“北方地区”，即南库页岛、南北千岛群岛以及齿舞、色丹各岛的全部或者一部分。

规定日本放弃南库页岛和“千岛”领土权的日美和约(第二条C款)生效七年之后，亦即日苏恢复邦交两年零五个月之后的一九五九年三月，政府在政令第三十三号中，才第一次把《总理府设置法》中讲到的“北方地区”的范围规定为“齿舞群岛、色丹

岛、国后岛、择捉岛以及内阁总理大臣所规定的其他北方区域”。对于这个地区的决定，是在政令上表明了日苏谈判中政府的主张，即日美和约所规定放弃的“千岛”只是指北千岛，择捉岛以南的地方并没有放弃，那些地方过去和现在都是日本的领土。

在在野党中，民社党跟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看法在实质上是相同的。该党认为，在《日美和约》中，日本放弃的仅是北千岛，国后、择捉并没有放弃，应该同齿舞、色丹一起在日苏和约中要求归还。关于得抚岛以北的地区，应该同苏联以及其他对日和约缔约国之间通过谈判谋求归还日本。公明党也主张，首先不是划清日本放弃的“千岛”的范围，而应首先通过日、美、苏三国会议，实现归还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并争取使得抚以北地区最后也归还日本。

社会党和日修在以下五个要点上是一致的：①从历史上看，南千岛和北千岛，都是合法的日本领土；②因而最终应归还日本；③为此，必须取消日美安全条约；④反对在取消日美安全条约前要求收回南千岛；⑤当前的目标是，归还齿舞、色丹和缔结日苏和约。两党的分歧不是实质性的，只不过是立论和说法上的不同而已。

四个在野党都没有谈到南库页岛问题。他们至少在目前还没有把这块地方看作是“北方领土”吧。

现在，只是一部份极右的国家主义者把库页岛的南半部也看作应该归还的“北方领土”。

但是，即使是极右分子，例如象自民党的青岚会，他们不仅不提南库页岛问题，就连立即归还南千岛也不敢喊。

反动的民族主义者们，在向民众鼓吹排外主义和军国主义时，过去总是把领土问题作为最好的材料。可是，现在的青岚会却只会拼命地进行反华运动，而对会刺激苏联的千岛问题却只

字不敢提。从这件事上，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右派的真面目。

要求归还千岛的根据

所谓“北方领土”，政府限定为择捉以南的四岛，而一九六九年三月的“北方领土问题各部联络协议会”决定，自一九七〇年度起国土地理院绘制的地图里，把四岛作为北海道的附属岛屿画为日本领土。

政府的这个措施，可以认为是一种不怕触怒苏联的果断的做法，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再次保证以后不再对得抚以北的领土提出要求。

就是政府，它在旧金山和会以及为批准和约而召开的国会上，也清楚地认为条约第二条C款里放弃的“千岛”是整个南北千岛。

在和会上，日本全权代表吉田茂反驳了苏联代表说千岛是日本通过侵略而夺取的讲法，举出起初沙俄也承认择捉、国后两岛是日本的领土，得抚以北是同南库页岛交换的事实。但是吉田茂只字未提因为是有这样来龙去脉的领土，所以现在日本没有理由被迫放弃它们。另外，关于齿舞、色丹，他声明它们是“北海道的一部分”。就是说，全权代表吉田茂虽然没有把齿舞、色丹包括进去，但他不反对把国后、择捉作为“千岛”的一部分而予以放弃。后来，在批准和约的国会上，外务省条约局长也讲明第二条C款是放弃了“包括南千岛和北千岛”在内的整个千岛。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伦敦负责对苏谈判的松本俊一全权代表，根据重光外相的训令，提出了归还南千岛和齿舞、色丹等四岛以及北千岛的归属由国际会议决定的意见。这个时

候日本政府才第一次主张不放弃南千岛，以后一直坚持这一主张。

重光只说我们不能放弃也没有放弃固有领土，而对于没有放弃这一点，他没有进行论证。这种强硬的说法虽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作为一个结论，我也主张即使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这些领土，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要求归还这些固有领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日本的固有领土不是属于政府、而是属于日本人民和日本民族的，即使由于政府软弱无能、由于它出卖祖国、因国际政治的影响，不得已被迫放弃了这些领土，人民也应该要求归还它们，同时必须迫使日本政府坚决要求归还。

另外，无论是苏联，或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日本交战的同盟国中的任何国家，它们在战争中都再三保证决没有扩张领土的意图。特别是日本投降时所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在谈到日本投降后如何处理日本领土时说，开罗宣言之条款必将实施。而开罗宣言不仅规定了朝鲜的独立，把“满洲”、台湾等地归还给中国，并且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和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发表这个宣言的美国、中国、英国这三大同盟国也声明：“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扩展领土之意”。并且，苏联后来也参加了规定实行这个开罗宣言条款的波茨坦公告，所以苏联当然也必须履行有关开罗宣言的上述声明。也就是说苏联也不应该以掠夺日本的固有领土来扩张自己的领土。因此，只要苏联还强占着日本的固有领土，那末日本人民就有权要求归还，直到这一要求得到实现为止。

这样一说，苏联就会提出，是根据雅尔塔协定，苏、美、英三国首脑之间决定把南库页岛和千岛交给苏联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讲，雅尔塔协定只是苏、美、英的秘密协议，不是能够约束日本的东西。另外，从政治上来讲，雅尔塔协定中诸如关于库页岛、

千岛等项，是苏联同美、英帝国主义商定战后瓜分世界的东西，是公然地践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日本人民没有必要去服从这样的协定。

这样，如果站在日本固有领土当然应该归还这种立场上，那末就失去了只要求归还四岛而不要求归还得抚以北的北千岛的理论根据。为什么呢？因为同南千岛是固有领土一样，北千岛也是固有的领土。

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意义

我认为，归还整个千岛这一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但目前大部分实际的具体的运动都集中于要求归还齿舞、色丹、择捉和国后四岛，因为它们有下述正当的理由。所以我认为，我们在确认要求归还整个千岛的大原则后，当前应该从同政府的不同根据出发，努力要求归还四岛。这一点是我这一次在北海道东部旅行中新考虑到的。

站在纳纱布角，遥望前方，齿舞诸岛中的贝壳岛好象就在眼前和鼻子底下。海面距离只有三点七公里，比从明石海峡到淡路岛（四公里）还要近。这个岛上的小小红色灯塔是一九一八年日本政府设立的。它使人感到就象指示前往神户港、大阪港的航标一样。这个岛的对面，可以看到水晶岛（离纳纱布七公里）和它右面的秋勇留岛，它们并排在一起。远方还可以遥望到志发岛。齿舞诸岛原被称为瑤瑤瑁群岛，但由于它是根室半岛齿舞村在海中的飞地，因此就被称为齿舞群岛，这是很有道理的。它无疑地是北海道的附属岛屿而不属于千岛群岛。

贝壳岛的周围是个最好的海带繁殖水域，采集海带对根室地方的渔民是无可替代的生活来源。可是，连这个岛也被苏联

占领。如果去该岛附近采集海带，就会立刻被逮捕，受到审判，被加上侵犯苏联领海和违禁捕鱼的罪名，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九六三年六月，由于已故高碓达之助(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的极大努力，缔结了苏联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贝壳岛周围采集海带的民间协定。所以渔民终于能够安心干活。但是，自战败到那时为止的十八个年头，眼看着亲属和渔民伙伴被苏联监视船抓去，却毫无办法相帮，他们的悲痛、恼恨与愤怒该有多么厉害。这种情况只有亲自到了那里，才会深刻地感受到。

从罗臼镇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后岛，那比从热海、伊东遥望大岛还近，还清楚。这个岛位于根室湾的港口，为根室半岛和知床半岛所环抱，宛如一个内海的岛屿。尽管这个岛早在两百年前，日本人就在这里定居、开垦，但它却被当作外国的领土，日本人连靠近它都不允许，这完全是不能容忍的。

国后和择捉的周围，是世界上一个有名的渔场。但是，这里也不让日本人进去。遭到以“侵犯领海”、“违禁捕鱼”的名目加以扣留的悲剧接连不断。在齿舞以及国后、择捉附近的水域，被苏联扣留的船只和人数，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止，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三艘，一万一千五百八十八人。为了每天的生活，到本来就是自己的海域捕鱼就要被扣留。何止如此，甚至被一阵暴风刮到苏联“领海”，也会被扣留。这样的事情能够置之不理吗？

在罗臼沿海，经常受到从知床半岛群山刮来的一阵猛烈暴风的袭击。遇到这种时候，以前到国后岛避难就可以得救。而现在，这也不行了。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到择捉方面去捕鱼的一队四人乘坐的小渔船，遭到从知床吹下来的强烈阵风的袭击，如果到国后方面去避难，得救的可能性很大，但因为会被苏联逮捕，所以渔夫们不管怎样也要拚命返回罗臼。船逃到了离陆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却在那里，在岸上的人亲眼目睹之下，一只

一只地沉没下去，有八十九人为波涛吞噬，以致死亡或去向不明。对小渔船说来，只要岛屿不归还，就无从保证这种悲剧不再重演。

齿舞、国后和择捉同北海道东部，不仅在地理上非常接近，而且在历史上也是不可分割的。即使国后、择捉在地理学上属于千岛群岛，但是在经济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同北海道东部是一个整体。这两个岛，作为日本人开垦、进入“虾夷地”（北海道）的自然的继续，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就成为很多日本人的定居地，成了日本的领土；明治维新后，它们同北海道以及日本全国的经济与社会联系就逐年密切起来了。

占守岛和它南面的幌筵岛，从一九三〇年起，就成了用固定网捕捞大马哈鱼和鲑鱼的中心。其产量占日本资本经营的北洋渔业全部捕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大马哈鱼与鲑鱼则占捕捞量的一半多。

如前所述，整个千岛无疑地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但在日本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只有择捉和国后两岛，同日本特别是北海道成为不可分离的整体；至于得抚以北，它们同日本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日本人民归还千岛的要求，首先集中在归还国后和择捉上，其客观的根据就在于此。

批判日共修正主义集团

我现在极力主张应该要求归还千岛群岛，以贯彻正当的民族权利。那末，为什么在战败初期不这样主张呢？特别是在召开和会之前进行全面媾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千岛和冲绳作为日本领土，进行与媾和同时收回的斗争呢？我的言行虽然与天下大势无关，但不能不问；当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自居的

共产党也好，高唱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也好，其他任何左翼的组织也好，为什么不去过问苏联占据和占有千岛的问题呢？我不能替他们回答，但按我的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进行穷凶极恶的侵略。从这点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这样考虑的：美帝国主义极端仇视、憎恨苏联，因为实际上存在着不久将面临军事进攻的危险，就苏联而言，为了自卫不得不把防卫前线尽可能设在远离本国的地方。拿千岛来说，如果它是日本领土，就要被美国占领，成为美国进攻苏联的基地，这是很明显的形势，所以苏联不得不凭借雅尔塔协定确保千岛群岛。社会主义苏联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堡垒，它为了保卫自己而不得已需要采取措施，归根到底，也是符合争取摆脱美帝国主义而完全独立的日本人民的利益的。所以，把千岛让社会主义苏联保有，日本在摆脱美帝国主义、取得完全独立以前，本也是应该忍受的。

就是现在我还认为：这种想法，当时在原则上是不错的。尽管如此，我们把苏联保有千岛，严格地认为是保卫社会主义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紧急的临时性的措施，而不是否定日本的千岛领土权。

现在想起来，雅尔塔协定本身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有苏联和美英帝国主义共同分割世界的因素。而斯大林死后，在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大步地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对外则业已暴露于斯大林时代的雅尔塔协定上的帝国主义因素，毫无限制地膨胀起来，不久还以它为主导。一九六八年苏联大军入侵捷克，即已暴露了苏联完全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蜕变为帝国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

既然如此，日本人民忍受苏联占有千岛的根据已经完全消失了。美国同苏联的尖锐对立依然继续，美国侵犯苏联的可能

性依然存在(反之,苏联侵犯美国的可能性也有)。但是,这种对立已经不是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斗争。那是资本家的帝国主义的霸王和社会帝国主义这样一种新型帝国主义之间世界性的对立的争夺。日本人民绝对不能支持哪一方。必须彻底反对他们任何一方。

因此,我们不能允许苏联继续无理地保有千岛,并把该地做为军事基地。即使这些军事基地只是专门用于对抗美国,也是不能容许日本民族的固有领土被用于外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然而,现在的千岛不但是用作苏联同美国争霸的一大军事基地,其实又是镇压日本的基地,也是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日本人民最亲密的、最可信任的真正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积极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的这一国家的基地。

近年来,苏联海军、空军在日本周围是怎样频繁地侦察和示威,苏联的“渔船队”在日本太平洋沿岸南下到遥远的伊豆诸岛海面,在日本海上作威作福地横行无忌,滥肆捕捞,毁坏日本人的渔场,给日本渔民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实际上它们还进行具有军事目的的日本周围海域的调查和电波方面的侦察。这种苏联用来镇压日本、中国、亚洲的海空军基地,就是择捉、国后和色丹。

自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苏联曾经同意让齿舞、色丹或国后的原来居民每年九月前往祭奠祖坟。扫墓团在苏联当局规定的港口停船,人要住在船上,连登陆到附近散步都不允许,何况在岸上住宿。从停泊处到基地的路上,乘的是公共汽车,但是窗户上有厚厚的窗帘,看一眼窗外都不可能。外加每个人还被蒙上了眼睛。到了墓地,只允许拍摄坟墓和祭墓人的照片,拍摄附近的风景是严加禁止的。

苏联为什么做到这种地步，连这些岛屿的样子一点也不让日本人望一下呢？除去为了防止扫墓人得到关于军事设施的一丝启示外，想不出还有其他的理由。而且，就连这种严格监视的有限制的扫墓，从一九七一年起，不论如何请求也完全不准了。

这样，收回社会帝国主义用作镇压日本和中国以及亚洲的战略基地的日本民族固有的各个岛屿，不只是为了贯彻民族的权利，而且是为了日本的安全，为了亚洲的和平，当代日本人不能不完成的义务。尽管实际情况已经如此，但日本社会党、尤其是其中的社会主义协会派和日本共产党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却把苏联当做社会主义国家来宣传，还说什么取消日美安全条约要比千岛问题先解决。

他们提出的这种主张，对进行要求归还两岛的运动其实是什么也没有干。两岛也好，四岛也好，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他们实际上都是反对的，不过是在口头上讲讲归还两岛罢了。

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比社会主义协会尤为恶劣。北海道宫本集团的基层组织说，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是反苏反共，他们挖空心思地要搞垮人民的斗争。而他们的党中央宣传，好象宫本同苏联共产党首脑之间，已经有了秘密的谅解：在日本废除安全条约之后，苏联就会归还全部千岛。他们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六日《赤旗报》发表的《党关于千岛问题的主张和政策》中写道：根据一九五六年日苏联合宣言，立即同苏联缔结和约，实现齿舞、色丹的归还；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就要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同苏联磋商不但把南千岛，而且把全部千岛归还日本。又说，在十年前，即一九五九年的日苏共产党首脑会谈中，宫本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倘若在日本不存在安全条约，成立了民主政府，那么“完全可以期望”苏联在归还全部千岛的问题上“采取新的态度”，如此等等。而且，一九七一年九月，宫本访苏回

国，在会见记者时说，“苏联政府首脑”对宫本谈过，日美安全条约体制取消后，关于国后、择捉的归还问题，“当试作外交问题予以认真考虑”，云云。

不只是这些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而且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宫本集团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书记局长不破(哲三)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还再次吹嘘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七一年宫本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首脑会谈的成果，说：“到现在为止，我党一直提出了分阶段的解决方针：第一，由于缔结和约而归还齿舞、色丹；第二，与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和实现日本的和平、中立化的同时，通过同苏联谈判收回全部千岛群岛。这个方针并非是脱离现实的计划，而是合情合理的、由同苏联谈判的实际情况证实了的极其现实的方针。”

假如粗心大意地读这些会见记者时的谈话和正式报告，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宫本同苏联首脑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在宫本的谈话里没有讲到，关于千岛问题，苏联首脑答应宫本一定会交还。情况只不过是宫本方面得到了似乎“苏联会善意地研究我党主张”的感觉。在日修和苏修的头目们的密室会谈中，不论宫本感觉到什么都随他的便；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好象是说连苏联也答应照日修的路线去解决千岛问题，还有象它那么恶劣的骗人的鬼话吗！

结 束 语

关于千岛问题，当前我们必须警惕的是社会主义协会派和日修的上述归还两岛就缔结和约的主张和行动。政府系统搞的运动要求归还四岛的论据，由于是随意曲解条约，所以我们不能支持；但是，从请求收复北海道附属岛屿委员会到促进收复北方

领土同盟，战败后一贯进行斗争、要求收回四岛的人民运动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宫本他们是为了破坏人民的正义斗争，才提出什么归还两岛论。这不仅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美化为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欺骗日本人民，还会把日本编进苏联包围中国的圈子里去。

苏联也许会象一九五六年他们一度答应过的那样，肯以归还齿舞、色丹两岛为条件，缔结日苏和约。苏联大概是这样打算：只要紧紧抓住国后、择捉，而齿舞群岛与色丹岛如能高价出售给日本的话，就卖给日本也成。

“高价出售”指的是：在政治上，把日本拉入苏联所策划的包围社会主义中国的圈子，使它同意所谓“亚洲安全条约”；在经济上，要日本全面地合作开发西伯利亚（这本身就具有苏联为了进攻中国，建立军事补给和运输线的巨大政治与军事意义）。假使是用这两个政治与经济条件来交换，那末苏联也许会归还齿舞和色丹。在日本垄断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当中，也有想做成这笔交易的动向。日共修正主义集团和社会主义协会，是这个反革命、反人民的交易的积极鼓吹者。

如果搞成这种交易，日本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同伙，变成包围中国这个圈子中的重要部分，那末，慢说齿舞、色丹全部千岛，就连包括这些岛屿在内的整个日本，都将沦落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附属国的地位。宫本等人的路线，是这样地和苏联做交易，把日本出卖给苏联，人民是绝对不能允许它的。

因为这是最根本的一点，所以我特地再重申一次：恢复民族的合法的固有领土，这是要求归还千岛、齿舞的斗争的唯一理由和目标，除此之外任何理由和目标都不需要。而且，必须先正确地认识：苏联已经完全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保有千岛并使其军事基地化，成为对日本的直接压迫，成为苏联进攻社会主义中

国、镇压亚洲的一个大根据地。只有这种认识，才能够戳穿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之流的欺骗。

在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收复被攫夺的民族固有领土的斗争中，岂能踌躇不前！这个斗争丝毫不是象宫本他们所说的那样，是日美安全条约存在的时候不能干的。安全条约是把日本同美帝国主义捆在一起、美日共同侵略亚洲的条约，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它。我们也同样坚决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恢复我们的民族权利而斗争。两个斗争是不矛盾的。这是日本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两大任务。

而且，因为苏联保有千岛等地并将其作为基地，成为美帝国主义坚持安全条约的重要根据，所以恢复千岛等地的斗争，也是消除安全条约继续存在的重要根据、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与此相反，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它本身不会即刻成为收复千岛等地的斗争。不但如此，看一看日本和亚洲的政治状况，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败后，日中邦交恢复了，美中也接近了，集中表现着日美安全条约的进攻的侵略性的远东条款，正逐渐失去意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日本安全和亚洲和平不断增加的威胁这一面，比起日美安全条约给予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的威胁，不但更危险，也更严重。这个威胁的基地就是千岛和齿舞。因而我要说：如想当解放日本人民的先锋的人，在当前形势下，收回千岛和齿舞的斗争要比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还要重视才对。我要说，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运动等群众运动，也不能回避收复被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的日本民族固有领土的斗争。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六、七月号日本《东风月刊》）

上海外国语学院日阿语系工农兵学员、上海复旦大学日本史组译）

康德在苏联大走鸿运

据苏联《哲学问题》杂志报道，一九七四年三四月间，苏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博物馆等，纷纷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康德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的活动，并声称庆祝康德诞辰“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专门成立了组织委员会，一些所谓康德哲学问题的专家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苏联哲学协会、苏联科学院哲学和法律分院、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等联合举行了各种关于康德哲学的报告会。四月份，还在加里宁格勒举行了关于康德哲学的大学生理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莫斯科、列宁格勒等许多城市的大学哲学系学生和研究生。

除了报告会以外，苏共加里宁格勒委员会等单位还在加里宁格勒（此地原是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康德的诞生地——整理者注）修建了康德纪念大厦和康德的墓，编纂和复制康德生活和活动地方的简明纪念册，发行纪念章。加里宁格勒大学哲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还组织了康德书房展览室。陈列物品中收集了康德在哥尼斯堡生活的许多资料和影印本，他的遗作和一九七四年以来苏联出版的康德哲学著作。还陈放了康德以及和他在哥尼斯堡大学工作过的费希特、赫尔姆霍茨、雅各宾等人的塑像。

另外，苏修还准备出版康德著作六卷集和过去没有翻译过的书信，以及《康德哲学和现时代》、《康德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等书；在哲学刊物上也发表了大量关于康德的文章和评论。

苏修不仅在国内搞了名目繁多的庆祝活动，在国外也大肆活动。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苏联哲学研究所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哲学研究所一起组织了有关康德哲学的国际讨论会。苏联哲学家代表团

还出席了在西德美因兹召开的康德庆祝会。

苏修为什么今天对康德哲学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如此兴师动众地去大搞庆祝活动?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奥伊则尔曼等人回答了这个问题:“苏维埃研究工作者对康德遗作的兴趣不单单是尊重过去”,而是为了“在概括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详细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迫切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思想敌人的理论斗争。”

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论哲学的创始人,是一个二元论者。但是,奥伊则尔曼却说:“康德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来源”,“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者之一”,“康德哲学中有许多重要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格里尼辛说:“在康德那里,我们看到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已经解决的许多深刻的推测和对待问题的态度。”

他们还在康德哲学中发现了“人道主义”的内容。库雷克说,康德不仅是解释星云的创新者,而且是提出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创新者。今天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现实性。必须详细地研究康德著作中有关人道主义和人类学问题的地位,因为在康德的三个《批判》组成的统一体系中,人的问题是这个体系的核心。

依·斯·恩达列耶夫认为康德是“永久和平”的倡导者。他说,康德早在二百多年前就作出了规定,或者死亡、或者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政治争执的手段,二者必居其一。

(孔幼贞整理)

苏修打着研究汉学的幌子猖狂反华

据苏联《亚非民族》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五期报道，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到三十一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举行了《中国社会和国家历史问题》的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亚细亚等地的“汉学家”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会上，有八十多人作了报告或参加了讨论。

这是一次打着研究汉学幌子的反华大杂烩。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Л·И·杰留辛在讨论会开幕词中，首先对我国批林批孔运动进行攻击。他说：“目前中国又在进行思想运动。运动过程中尖锐的政治斗争，将采取批判或颂扬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的形式。深刻地了解历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现象的实质。”在杰留辛的带动下，会上大肆尊儒反法，对我评法批儒进行攻击。东方学研究所的Р·В·越特金在《关于中国的新思想运动》的报告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对儒家学说的指责又来一次镇压反对分子，并燃起反苏主义。”该所的Л·С·瓦西里耶夫在发言时，反对苏联过去汉学书籍中流行的法家作为有产上层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的观点。他认为：“法家首先维护中央集权官僚国家的利益。法家也好，儒家也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力求达到的是同一个目的——就是想把国家机构用他们理想的形式巩固下来。目的的共同性促使两方面的学者在汉代儒家学说的范围里综合在一起。孔子学说应该同后来的儒家学说区别开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Ю·Л·克罗里在报告中说：“法家学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传统的暂时的停顿。西汉的国家学说综合了儒法的某些特点，以阴阳原则为基础，同时利用法家学说作为强大国家机构的基本理论，以儒家学说作为对法家强硬方针的抗衡。”列宁格勒分所Л·И·缅希科夫别有用

心地鼓吹所谓研究古代中国思想流派必须严格遵守历史主义的原则,说什么“企图以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去对待它们,只可能导致歪曲它们的涵义和实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Л·С·波列洛莫夫,对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和期间关于儒家学说的辩论给予了所谓评价:“这次辩论的参加者企图把从远古到今天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彻底的研究;在谈论过去事件的话后面隐藏着今天的现实问题;在批孔的借口下,指责毛泽东的政治上的敌人。”

会上,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历史和政策作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А·Н·加尔多诺娃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和政治条件问题》的报告中,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形式诬蔑为是一种独特的形式。Т·Н·阿加多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及其后果(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报告中,把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无产阶级基础的衰弱性和工人阶级中散布了国民党播下的民族改良主义”。同时,她还认为:“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错误已经逐渐克服,关于‘王明—博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观点,只不过是毛派的臆造。”

(潘芳整理)

编 后

本刊从第二期开始，更名为《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这一期，继续集中摘译了有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材料。美国人马登的《变化中的经济学：经济学在恢复青春》，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再也无路可走了，只好乞灵于所谓“人道主义”，妄想用这层薄薄的面纱，遮掩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此外，国外反映苏美两霸相互争夺的文章和材料甚多，这一期先摘译了一批分析苏美两霸军事上对峙、在中东的活动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资产阶级的，但在对当前国际局势是紧张还是缓和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却都被迫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苏美两霸的争夺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奇袭珍珠港》，讲的是三十五年前的旧事，但颇能发人深醒；当代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不也是在和平谈判的烟幕后面，大肆扩充军备、准备象袭击珍珠港那样，发动对别国的突然袭击吗！读了这些材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教导。

这一期新辟了一个书评的栏目，对朱可夫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发表了一篇评论。今后，将继续有选择地对翻译出版、内部发行的外国哲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出版物发表评论。